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长沙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印刷厂印刷

1975年7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20,000 页:—1 210 册 印数:5,700

定价:0.50元

總 則 凡 例

一、本選輯總印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並推動史料工作的開展。選輯的資料，大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個人的一定局限性，所述史事可能不盡詳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選輯只在一定範圍內發行，供歷史研究工作者和有關部門參考。

二、選輯所載資料，包括從戊戌變法以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休戚，只要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均予選入。

三、歡迎讀者對所載資料提出質疑、補充和訂正。

四、編者對來稿可予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五四运动亲历记·····	夏明钢(1)
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	蒋竹如(20)
回忆《新湖南》·····	龙伯坚(30)
新民学会点滴回忆·····	周敦祥(36)
衡阳五四运动的片断回忆·····	屈子忱(38)
五四运动后湖南第一师范的教育改革·····	程星龄(43)
教育改革后的一师点滴·····	李绍邨(54)
湖南五四运动二三事·····	陈漱渝(59)
片断的回忆·····	王肇勛(71)
留法勤工俭学杂忆·····	郭方瑞(73)
留法、比的片断回忆·····	林叔英(82)
驱逐张敬尧运动·····	肖仲祁(88)
湖南学界驱张运动前后·····	唐耀章(92)
驱张运动在衡阳·····	丑伦杰(101)
驱张之役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战斗经过·····	谢慕韩(104)
关于张敬尧·····	许和钧(112)
回忆父亲杨昌济先生·····	杨开智(118)
回忆杨昌济先生·····	郭之奇(128)
杨昌济先生在湖南商专·····	李凤池(130)
我们所知道的杨度·····	杨友鸾 杨友鹄 杨友龙 杨友麒(137)
朱师晦的《癸卯日记》·····	袁鹤皋(141)

柳直荀烈士在湖南·····	李维汉 (147)
回忆柳直荀同学·····	袁鹤泉 (155)
回忆大革命时期的柳直荀同志·····	陈新远 (161)
留法老学生之自述·····	徐特立 (172)
反曦同志牺牲的经过·····	袁福生 (176)
罗宗翰先生生平简略·····	李维汉 易北望 (178)

五四运动亲历记

夏明翰*

五四运动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对于这个运动，毛泽东同志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我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并且指出，它“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毛泽东同志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我曾亲身参与这一运动，觉得有责任就自己所知，将事实一一叙述出来，但为个人的见闻所限，自然难以写得全面正确。

一、五四运动时期北京知识界的思想潮流

五四时期北京知识界思想文化活动的中心是北京大学。但北京大学在一九一七年以前胡仁源任校长时，可以说一点新鲜气息也没有，只是美言日读死书。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成功以后，六月间始受到启发。当时有人写过“革命如西方，踏出了人类幸福的曙光”的诗句，表现了对十月革命的憧憬。与此同时，西欧工人阶级在左翼社会主义党人季卜克内门等的领导下，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纷纷提出“争取民主自由”、“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 本文作者夏明翰，原名夏乔椿。

的口号。列宁也发出“全世界人类不分种族肤色，团结起来，维护和平”的号召。这些革命思想口号，日渐传播到东方来，因而促进了北京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周国大等人的觉醒，并纷纷举行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和约”、“平等”、“博爱”、“民生”、“自由”、“社会解放”、“民主”、“共和”、“人权”、“打破”、“男女平等”；在言论上主张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罢工自由；在文学方面，主张“白话文代替文言”，“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白话文统治，坚壁清野”等。其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尽管有反对力量，而“五四运动”却冲破封建的藩篱，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外，其他各种主义思想、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也得以传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每周评论》创刊后停刊，这改刊为《新青年》。就中在北京出版颇著名的有《新青年》、《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几种，其另途者有《东方杂志》。此为五四运动前后北京知识界思想活动的一概情况。

在五四运动前后思想、新文化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中，除了一部分，即以胡适为代表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以外，应当特别提到的是蔡元培。如上所说，在胡仁源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北京知识界是“寂寞”的，“暗淡无光”。而从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从那时起，北京知识界的思想活动，大大地活跃起来。记得当北洋军阀政府邀请胡从欧洲回国时，蔡先生曾经提出办学的三个条件：第一，提高大学校长的地位，由聘任改为聘任；第二，大学独立，由教育部指定经费来源，划归大学自己经管，其他方面不得过问；第三，大学校内一切学术活动完全自由，政府不得借故干涉。为了保证这一点能够实现，大学得自设校警，经

持校内秩序。这三个条件为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璋所接受。范源璋才疏学浅，前任北大校长。蔡先生接任北大校长后，即着手贯彻三原则（即所谓三民主义大学之方针），即聘请李大钊、陈独秀、周树人、钱玄同、梁漱溟、李维宁、李锐等，广泛罗致各色各样的人物为教授，提倡学术上的自由争论。当时北大作为外先遣队蒞后，参加其左翼国民党，从事反右，民国思想与封建思想的斗争，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很快发生，在协约国的压力之下，北京政府被迫同意人民团体开联席会议，会上蔡先生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大演说词。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进步的表现。后来五四运动的发展，直接助力于北京知识界的思想解放，也助力于蔡先生的易帜出洋转。

二、五四运动的前奏——

北京四大学校学生的请愿和罢课斗争。

一九一八年五月，北京四大学校的学生，为了抗议段祺瑞政府所借对德宣战，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缔结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约起，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所谓四大学校，即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及北京农商专门学校等四个高等学校。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借口对德宣战，对内一个劲儿镇压国民党争夺政权，非法解散国会，造成南北隔绝，独揽最高权力，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国际帝国主义企图扼杀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于摇篮中，组织十四国联军，护送白俄，进行对俄的抄掠。远东方面，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出兵西伯利亚。我国的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起来，签订所谓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约，并向日本举行大宗借款，即臭名昭彰的西原借款，用以讨伐南方。全国人民对于段政府这种出卖民族利益、卖权辱国的行为，

莫不切齿痛恨，群起而攻之。北京学生激于爱国热忱，纷纷集会讨论如何制止军阀政府屈从外寇的对策，恰好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我国内奸对我进行侵略，相率离日回国，并派代表赴各地活动，唤起国人，共挽国难。北京大学学生应留日归国学生代表阮湘、王俊之请，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日晚在北大理科厅内开全体学生大会，并邀北京其他高等学校学生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翌日上午九时齐集新华门前，向总统冯国璋请愿。这里须加补述的：当时有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学生张传琦（现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于五月九日下午在工场实习时，痛国是之日非，切指立誓，表明他对段政府卖国罪行的坚决反对。五月十一日上午八时，也是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里，当全体同学在物理实验室里集合，准备会同北大同学前往总统府请愿时，这个学校的学生夏秀峰跳上讲台，情绪激昂，讲了几句话，便抽出衣袋中的小刀，在左食指上削了几下，立时血流如注，即用血写了“此条约取消之日，为我辈生还之时”一语，以鼓励同学奋可前进。这两个削指写血书的事件，激发了工专全体同学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大家的斗志。到总统府请愿时，工专学生去的最为踊跃。此次四大学校学生的请愿行动，除了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表明人民的爱国意志以外，并未获得任何结果，但仍有其重要的意义：第一，它使学生受到一次斗争的锻炼，为五四运动作了组织工作和领导骨干的准备。自这次请愿以后，北京学生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己有组织起来的必要。经过短时间的酝酿，随即成立了北京学生爱国会。参加爱国会的，共有十六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学生爱国会虽然只存在几个月，到一九一八年秋后便结束了，但它确为五四运动作了一些前期的组织工作，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员也多数是从学生爱国会的骨干中产生的。第二，这次请愿的行动相

当和平和有秩序，对军阀政府起了一定的麻痹作用，使它后来在五四这一天戒备不足，为学生的革命行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下面再谈谈国民杂志社与五四运动的关系。

北京学生爱国会成立后，在学生内部作了一些宣传鼓动工作。但是大家感到光是北京有组织还是不够，应该把这种组织扩大全国各地，以便在行动的时候，彼此能够互相呼应和支援。于是趁着暑假期间，分派同学至上海、天津、南京等处进行联系，希望这些地方也把学生爱国会组织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在上海组织全国学生爱国总会。但因当时全国各地的学生还不是和北京学生一样有组织起来的要求，因而北京学生在上海等地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把全国学生组织起来的计划，终未实现。但北京大多数学生并不因此灰心。他们继续奋斗，邀集同志创办了国民杂志社，出版《国民》月刊（现在还存有一九一八年十月号一期，陈列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可供参证）。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学生，我所能记忆的有：北京大学的易克崧、许德珩、邓康（即邓中夏）、段锡朋、周长宪、杨志曾、陈锡、黄建中等；高等师范学校的熊梦飞、匡济（即匡日休，后号互生）、俞劲、周惠群等；工业专门学校的肖镇湘、方乘、夏秀峰、张传琦等。还有其他学校的一些学生。这一批学生团结在《国民》杂志社里历时一年多，中间经过五四运动这个大风暴。他们在五四运动中起到了出色的领导骨干的作用。由此可见，《国民》杂志社与五四运动是有其不可分割的关系的。

三、五四运动的大略经过

1.五四前夕北京学生运动的酝酿

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阴谋通过巴黎

和会使其对我国山东的侵略成为合法化。这批历史事实，已属众所周知，无须赘述。

当时由于我国政府腐败，内战频仍，国势孱弱，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把我国放在眼里，加以政府内部有亲日卖国贼的活动，日本帝国主义又与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勾结，得到他们的支持，我国在巴黎和会上交涉失败已成为无可挽回之局，和约只待各国代表签字，即成定论。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心鼎沸。各政党和人民团体，纷纷自动集会，商讨对策。北京学生尤其愤慨万分。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各按其自己的条件，举行了大小集会，讨论巴黎传来的不利于我国的消息。有的主张仿照去年的办法，集合全城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向军阀政府请愿；有的主张向英美法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发通电，请求它们主持正义；也有主张仿照留日学生怒送袁宗祥（我国驻日公使）回国的办法，到卖国贼曹汝霖等人的住处示威，把卖国贼痛骂一顿。当时议论纷纷，各有道理。其时青年救国会的学生组织了宣传队，上街演讲，奔走民众，反对日本侵略我国。另一系领导下的国民外交协会，也拟于五月七日（即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反对签订包括山东条款在内的凡尔赛和约。北京学生为了避免与中国政治史上臭名昭著的进步系混在一起，特提前于五月三日晚十时集会于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商讨如何组织这一反日爱国运动。到会学生人人义愤填膺，大声疾呼，一致主张一面电请巴黎和会我国首席代表陆徵祥（外交总长），责成他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一面号召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于次日（五月四日）下午一时在天安门集合，开北京学生全体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并赴国民外交协会各使馆“请愿”，要求各国驻华公使转告他们的政府。

正义。这里需要说明的，即到现在为止，并无学生提出要到前门楼胡同去打曹、章、陆卖国贼的计划。正因为事先没有这种计划，北京学生才能在五四这天无阻碍地集合于天安门。如果事先有此计划，势必先泄风声，军阀政府定会采取预防措施，学生的行动就会受到阻碍。

2. 天安门大会与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的“请愿”

五月四日下午一时左右，北京学生按照先晚在北大开会的决定，到天安门集合。到会的人非常踊跃，总数约有万人左右。国立北京八大学校的学生大都参加了。各私立高等学校，各公、私立中学，以及各部办的专科学校，如俄文专科学校、交通邮电专科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等，均有学生参加。会场设有议置讲台。学生们就以天安门的石狮子作讲台。演讲者站在石狮子头上讲话，情绪激昂，言词锋利，富有煽动力量。当时京师警察厅派了警察到场，名为维持秩序，实则前来监视。前清遗下尚未撤废的“步兵統領衙門”的头子李长泰，也在这时领着一队服装褴褛、士气萎靡的士兵前来干涉，说了一些“你们组众集会，妨碍治安，应即解散”的胡言乱语。当有学生把李长泰怒斥一顿，说：“我们在这里开会救国，秩序很好，你到这里来捣乱，才真是妨碍治安。你给我们滚出去！”李长泰受了群众这番正义的斥责，只好灰溜溜地率队离开，群众大会也就顺利地开了下去。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有北大、高师、工专、俄专等校的学生代表。讲演完毕后，按照预定计划，大家整队前往各国公使馆“请愿”。队伍从天安门出发，经中华门绕前门楼到东交民巷西口，便遇到守卫的美国兵的阻拦，不得前进。（东交民巷为各国驻华使馆所在地，根据“辛丑条约”，各国在这里驻兵的议利，全以由外兵分段把守，我国任何武装人员都被禁止通行，即使是和平居民，也都不许整队进

去。这是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最使国人痛心的事情。)学生要求派代表进去,也遭拒绝,上“请愿”书也不收受。原先有些人对美国抱有幻想,至此才看出他们是一丘之貉。漫长的队伍被阻在东交民巷西口约半小时以上,没有任何结果。群众愤怒万分,异口同声喊出“到赵家楼胡同找曹汝霖等卖国贼算账去!”于是大家高呼口号,向赵家楼胡同进发。

3. 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

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分东西两院,东院为西式楼房,西院为中式平房,共一张大门进出。这时大门关得紧紧的,用铁杠杠了,学生无法进去,便在门外大声怒骂,并将写着“打倒卖国贼”等标语的小旗帜扔进屋去。这些都不能触动曹汝霖等卖国贼的一根毫毛。那末怎么办呢?群众自然有办法的。前面说过,五月三日晚上在北大法科开大会时,虽然群情激愤,也只决定要到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家门前去游行示威,并无人公开提出要对他们动武。可是学生中确也有人暗地作了一些采取激烈行动的准备。记得五月四日清晨四时左右,天还没有大亮,高等师范学生匡济,就到北京工专学生夏秀峰宿舍里找夏(夏住在北京西城大觉胡同十号榆园),告诉夏一件这样的事:他(匡)和北京高师几个学生组织了各校一批同学,原来打算在进步系的国民外交协会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请曹汝霖等出席受质询时,将曹等当场打死一两个,以快人心;但现在的情况变了,北京学生今天来个示威游行,一定会把卖国贼吓住,再不敢于五月七日到中央公园去出席会议,他们原来的计划须提前于今天执行,无论到那一个卖国贼的家里去(因此时还不知道一定是到曹汝霖家里去),就在那里动手,能打倒一个卖国贼,就是好的。夏领会并同意了他的意见,即请匡去约其他同学,以免在这里多谈,泄

露机密（因与夏同住的还有其他几个学生），匡并告夏，他已到北大约了陈锡，还拟去法专邀约谢濂。陈、谢二人，都是匡的宝庆同乡，匡认为是靠得住的。五四那天，当学生群众到达曹汝霖家门前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匡济从西院窗口将铁栅扭弯了两根（匡在少年时就练就了一手好内工，他只要用手一捏，就能够把弯的铁门扣捏直，其气力之大有如此者），打开了一个缺口，他从缺口爬进去，撵开守卫的警察，将大门打开，群众便蜂拥而入。当章宗祥化装偕同另一日人夺门而出，行至东院门口时，有人从袖中取出照片对照一下，断定其中一个不是日本人，而是章宗祥。这时群众一涌上前，把章扭倒，大打起来。由于同行的日人全力掩护，群众又系初上战场，不明情势，唯恐伤及日人，惹起外交纠纷，致章未受重伤。群众散了，章爬起来就走，又被发觉，再次挨打，他装死躺下，群众方才罢手。当东院这边两次轰动起来痛打章宗祥的时候，西院学生中有人点火烧屋，顷刻之间，浓烟上冲，透出屋瓦。群众见屋内已经着火，于是纷纷散去，章所以未被打死，西院房屋过早着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等到大部分群众远离赵家楼胡同之后，警察才赶到现场，拦截了三十几个学生，作为这次“造乱”的“首要人犯”，将他们逮捕起来。

从以上事实看来，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这一壮举，不仅为军阀政府所未料及，即在学生群众中，也不是全体都有思想准备的，就是说，是在一部分学生有准备，一部分学生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次学生的革命行动，充分表现了群众的伟大力量。至于它的巨大深远的历史意义，人们在当时是没有意识到的。

4. 北京学生的政治要求与学生联合会的组织

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在赵家楼胡同惩罚了曹汝霖、章宗祥之

后，除了被警察捕去少数人以外，其余都回到了学校。因时间已晚，没有仔细清查人数，虽知有同学被捕，但被捕的是那些学校的同学，有多少人，都不清楚。第二天各校经过认真的清查，才把情况摸清，被捕同学共计三十二人，其中北大同学占了一半。此时又风闻军阀政府将把被捕同学交检察机关起诉，并拟判处徒刑，同学们无不切齿痛恨。于是各大中学校无形中把课停了，集中力量营救被捕同学。在营救被捕学生的运动中出力最大的，首推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北大教职员及学生。当学生未被营救出狱以前，蔡先生和北大许多教职员日以继夜地到处奔走，希望被捕同学早日恢复自由。直到五月六日深夜，蔡先生与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达成协议，吴担保在七日上午七时以前释放被捕学生；蔡先生担保学生不去参加七日进步系领导下的国民外交协会在中央公园召开的国民大会。双方履行协议。五月七日上午七时以前，被捕同学全部获释。五四学生游行示威这件事的本身，至此告一段落。

现在续说五四学生运动如何向前发展。五月四日北京学生虽然给了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以初步的惩罚。但他们仍然窃居高位，一旦再有机会，仍可窃权弄柄，卖国求荣，给国家民族造成严重的损害，这是学生和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北京各校学生紧接五四游行示威以后，于五月五日上午集会于北大理科，筹商今后进行的方策。讨论结果，除了努力营救被捕同学以外，决定向军阀政府提出如下的一些政治主张和要求：（一）坚决拒绝在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条款上签字；（二）严厉惩办曹、章、陆等卖国贼；（三）外交公开，坚决反对秘密外交；（四）人民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学生组织学生会，政府不得干涉；（五）男女公民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一律平等，全国各公私立学校对妇女开放，实

行男女同学；(六)反对旧礼教，废止祀孔等制度，采用白话文，废止文言文。这六条政治主张和要求，是从学生代表的无数意见中经过详细讨论归纳出来的，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意识，为大多数群众所拥护。学生代表们还考虑到自己如不组织起来，便不能促进这些主张和要求的圆满实现。他们自五月五日起，日夜不停地开会，一面继续讨论向军阀政府提出的主张和要求，并研究如何才能促其实现；一面推出段锡朋(北大代表)、翟秋白(原来不是这个名字，但已忘记，只好写今名，他是俄文专科学校的代表)、夏秀峰(工专代表)等三人为起草人，草拟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章程。章程草案于五月六日脱稿，经过一整天的讨论即被通过。学生组织正式定名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作为北京学生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学生联合会组织分两大部分：一为评议会，由中等以上学校每校选出学生代表二人(北大八人)组成，所有学生联合会的重要事宜，均须经评议会决定，方得执行。一为干事会，即执行机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干事会代行其职务。北京学生联合会评议会的主席，亦由北大学生出席评议会的代表担任。各校学生会，也都设评议会和干事会。学生会实行集体领导，不采会长制。各校评议会设评议员若干名，一般以班为单位，每班选出代表一至二人参加；干事会各股主任为当然评议员，并以总务股主任为评议会主席，均由选举产生。当时北京大学学生在学生联合会评议会和干事会任重要职务的，有以下一些人：易克崧、段锡朋、许德珩、周守忠、张国焘、陈宝骅、方宗(还有一位，忘记名)等八人为北大学生出席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易克崧为干事会总务股主任，邓康为宣传股主任，罗家伦为外交股主任，杨斯年为文书股主任，康白情为交际股主任，陈惕为庶务股主任。

5. 北京学生大罢课与挽留蔡元培先生

上面说过，被捕学生经蔡元培先生和其他各方面尽力援救，已于五月七日上午七时以前全部获释。这时忽然传来消息，说蔡元培先生出走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事件发生后，北京有势力的反动集团，主要是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丑类以及知识界中一些落后分子，以为这次运动，是蔡元培先生等指使学生干出来的。他们对蔡先生恼恨达于极点，必欲去之而甘心。据说从五月四日晚上起，到五月七日晨，蔡先生接到的匿名恐吓信不下百余封。蔡先生因为尚未把被捕学生营救出来，才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坚守岗位，进行斗争。待到吴炳湘担保释放被捕学生之后，蔡先生便急流勇退，买了一张三等车票，离开北京到杭州去了。临行前，在北京《晨报》登了一个启事，全文已记不清，只记得其中有“吾老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之句。当时许多学生读了这个启事，都十分激动，竟有痛哭流涕者。蔡先生这种不避艰险，不畏强暴，保护青年的高尚品格，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北京学联（即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简称，以下仿此）得到蔡元培先生离京回杭的消息，立即断定，这是军阀政府对蔡先生施加压力的结果，全体代表一致反对军阀政府这种卑鄙行径，要求挽留蔡先生回任北大校长；并把它列为政治要求的主要条款，迫使军阀政府接受。此事经学联数度与政府交涉，均遭到顽固的拒绝。学联遂于五月十日作出决定：从五月十一日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举行总罢课（在这以前已有一些高等学校如北大等处在停课状态中），并布置各校组织讲演队，上街讲演。其办法是：每校按学生人数多少，组织若干队（每校至少五队），每队又分成若干组，每组五至十人，学生人数太少的学校可以不分组。每日每校派一队以上的学生出动讲演，以唤起民众，共同救

国。本来，在学生运动初期，也有学生上街讲演，不过出动人数有限，影响也不大。这次不然，全城几十个大中学校的学生都出动了，每日有几十组多到几百组学生在街头讲演，弄得满城风雨，人心鼎沸，致使军阀政府惊慌失措，坐卧不宁。

6. 袁锡涛、姚憾吾的出面“调停”

北京军阀政府既害怕学生罢课和上街讲演，又不愿接受学生的要求，实行武力镇压，又怕把事态扩大，便企图用欺骗手腕来达到消弭学生运动的目的，于是演出了“调停”的一幕。它（军阀政府）指使袁锡涛（教育部次长，其时教育总长为傅增湘，五四事件爆发后辞职，由袁代理部务）、姚憾吾（私立中国大学校长）等出面，到学联来进行所谓“调停”。本来调停人还有范源濂，但范知趣未来。袁、姚等人无非是用各种花言巧语，骗取学生取消讲演，恢复上课，一句话，就是不让学生有任何举动。对于学生提出的政治要求，则多方搪塞，说些冠冕堂皇的空话，甚至公然为军阀政府辩护，对学生施加压力，说什么，政府爱国不敢后人，绝不断送国家的权利；挽留蔡子民先生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政府对蔡先生倚畀方殷，没有不挽留之理；至于罢免曹、章、陆，属于政府的职权范围，学生不应加以干涉云云。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不是很清楚吗？北京学联最初为了表示接受调停的诚意，决定于五月十七日起暂停讲演，静候调停。经与袁、姚多次周旋，袁、姚亦曾列席学联评议会的一两次会议，进行折冲，学联决定把自己的要求缩减为三条，即：（一）对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条款不予签字；（二）罢免曹、章、陆（原来提的是严厉惩办卖国贼曹、章、陆）；（三）挽留蔡元培先生（要求由政府派职位相当的代表会同学联的代表和北大师生的代表一同前往杭州欢迎蔡先生回校）。其余有关集会结社自由，男女平等，推行白话文等

项，作为次要项目，暂时不提。这三条仍然遭到军阀政府的拒绝。袁、姚反而向学联提出：要学生立即恢复上课，否则，他们就不再担任调停了。学联当然不能答应。至此，袁、姚“调停”的把戏，便以未获任何结果而收场。

7. “调停”无结果，军阀政府下戒严令，镇压学生

北京学生的政治要求既遭到军阀政府的拒绝，学生是否继续罢课，在学生内部，是有分歧的。这里不妨追述一下斗争的经过。当袁、姚等到学联来进行“调停”时，他们是软硬兼施。特别是袁锡涛，在施用软化学生的手段时，在评议会上讲话，装腔作势，说得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冀图使人相信，似乎他是一个最关心学生利益的头等好心肠的人；另一方面，他又威吓学生说：如果不恢复上课，政府为维持治安计，将要下戒严令，严惩妨碍治安的坏人，此时如果学生牵连进去，受到政府的惩罚，他就爱莫能助了。经他这一威吓，评议会在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开会时，有若干学校的代表就表现动摇踌躇，不敢拿出积极的主张来，甚至有反对继续罢课的。既然评议会中意见不能统一，学联只好作出决定：各校代表把袁等要求学生复课的意见带回学校去，于当晚（即五月二十六日晚）召开各校学生全体大会，进行讨论。各校开会的结果，绝大多数学生主张继续罢课，坚持到底。北京大学绝大多数同学，也坚持这个主张。但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等少数几个人却另有所图。他们在大会上散发“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传单，要求同学们“一面恢复上课，一面力争外交的胜利”。北大广大学生群众的斗志坚强，不为他们的妖言所惑，他们瓦解学生爱国运动的阴谋不仅未能得逞，而且激起了群众的公愤，北大全体学生大会作出决定，赞成该校出席学联的代表向学联评议会建议，把罗、傅、康开除

出学联干事会。据说北大学生山东同乡会当晚也召开了会议，将傅斯年打了一顿。二十七日下午学联评议会开会，听取各校代表带来各校全体学生大会的意见，当即一致通过决议：继续罢课，坚持与军阀政府作斗争，务必迫使军阀政府接受学生的三项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同时，接受北大学生代表的提议，将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三人开除出学联干事会。在学联评议会开会时，袁锡涛、姚憾吾等又跑来探听学联的态度。当他们知道学生的意志坚定，学联决定继续罢课之后，于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夹着尾巴悄然离开学联。继之而来的是北京学生与军阀政府之间的一场更加激烈的斗争。

二十七日下午，袁、姚二人离开学联以后，评议会继续开会，除了维持原决议继续罢课以外，还决定（一）恢复讲演，唤起民众和学生一道对军阀政府进行斗争；（二）立即派代表与北京商界联系，定于二十八日下午在北大法科礼堂开商学恳亲会，邀请商界代表及知名人士出席会议，商谈共同救国事宜；（三）选派代表赴全国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南京、广州以及沿铁路线工人聚集较多的唐山、长辛店、济南等地去活动，促使这些地区的工商学各界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为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作有力的声援。就在同一天（二十七日），军阀政府也作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准备。各重要学校如北大、高师、工专等校门内外，均派有成队的武装警察驻守。他们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并且架起帐篷，作出长期驻扎的姿态。二十八日下午各校学生代表作为商学恳亲会的主人大多数都到了北大法科礼堂，商界也来了一些代表。此时，驻在北大法科的几个警察头目，头戴金边警帽，身穿白色制服，腰系拖地指挥刀，在会场内踱来踱去，口中喃喃叫嚷：“今天戒严，不准开会，开会咱们就要抓人！”杀气腾腾地监视着到会的

人。商学界的代表们坐在铺着白布的U字形长条桌边，一面喝茶抽烟吃点心，一面闲谈着。过了半个多钟头，还不见一度在会场里出现过的学联主席（北大学生代表）段锡朋出席主持会议。“主席失踪了吗？刚才还在这里，为何就不见了呢？”许多学生代表这样的想着，问着。只得改推法专学生代表刘奇为临时主席，出来主持会议。临时主席说了一套开场白，就请商界代表发言。商界代表在武装警察的监视之下，除说了几句“同学们爱国，心肠是好的”之外，未敢多说半句。会议便草草结束。商学总亲会既然没有产生积极的结果，学生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爱国主张，必须另想办法在社会上进行活动。由于军警对学生的压迫步步加紧，政府戒严令已下，作为学生首脑机关的北京学联，已被打入地下，不能公开活动，而且学联主席段锡朋已不知去向，群龙无首，怎么办呢？这时北大学生会总务股主任，亦即北京学联总务股主任易克巖，感到局势危殆，挺身而出，毅然把学联主席的职务担当起来。易担任学联主席后，即于当晚（二十八日晚）假北大理科后院的化学实验室，召开学联评议会的秘密会议，重新估量了斗争的形势和学联本身以及全国各个方面的力量，决定采取更加踏实的斗争方法，把恢复讲演一事，逐校作了具体的布置；又对派到外地去求援的代表人选，进行了一番审查和调整。我记得清楚的是派许德珩和另一位同学（忘其名），于当晚出发去上海。去其他地方的代表，已记不起了。在北京恢复讲演的日期，则定在六月一日。这是因为估计到了那个时候，派到上海、天津、南京等地的代表已在各地展开活动，各地工商学各界的群众可能已发动起来，可与北京学生的行动遥相呼应，在全国造成声势，予军阀政府以有力的回击。在学联的领导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果于六月一日分批出动讲演。这一天出动的人数较少，政府尚不明

底细，故未发生捕人的事。是日晚间学联评议会开会研究情况，决定督促各校增派学生出动讲演，并责成各校出席评议会的代表，每日分批带队出发，以资表率。这样一来，六月二日出发讲演的学生增加到八百余人。军阀政府本已下了戒严令，遂以学生街上讲演，妨碍治安为借口，下令逮捕讲演的学生。当天出发讲演的八百多名学生几乎全数被捕，由武装警察监禁于北大法科各教室里。六月三日出动讲演的人数增至一千余人，亦几乎全数被捕监禁在北大理科各教室里。军阀政府扬言：“学生恃其人数众多，政府无监狱可关。现在就以学校代监狱，北大关了不够，关到高师，高师不够，关到高工……北京有这么多学校，都给关上学生，看他们闹到哪里去！”军阀政府对学生实行镇压，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必然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把运动推向更高的高潮。

8. 六月三日全国罢工、罢市、罢课，支援北京学生运动

六月三日，北京军阀政府仍在继续大规模逮捕上街讲演的学生。六月四日，北京学生亦复出动了一千多人在街头讲演。但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从这一天（六月四日）起，军阀政府基本上停止了逮捕学生。这是因为从六月三日起全国许多地方，首先是上海，接着是天津、南京、武汉、长沙、唐山等地的工人、店员、学生以及铁路员工先后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罢工、罢市、罢课，支援北京学生，使军阀政府开始认识到，对学生实行镇压，不能解决问题，任事态这样发展下去，对他们也很不妙，所以才停止逮捕学生。但已被逮捕由军警看守在北大法科和理科的学生，仍未释放。北京学生方面，在六月二日前后就已从派到各地去联络的代表的报告中得知，全国工人、商、学界已经行动起来支援他们的消息。例如：学联在六月一日晚便接到派往上海去的代

表许德珩发来的急电，说他在上海市民大会上放了一炮，把上海工商学界都鼓动起来了，日内可能有行动表现。（许德珩来电并说段锡朋到了上海，请加派他为赴沪代表。北京学联至此才知道段锡朋的下落，自然有所不满，但为了尊重许代表的意见，仍加派段为赴沪代表。）其他各地传来的消息，也都很好，有些地方已开始实行罢课。到了六月三日，罢工、罢市、罢课的浪潮，果然从上海开始，迅速扩展到天津、南京、武汉、长沙、无锡、唐山、济南等地，有力地支援了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甚至北京银行公会也于六月四日向政府提出劝告说：如果不设法赶快平息全国的三罢浪潮，银行业将无法坚持下去，势必被迫停业，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样一来，北京政府遂于六月四日晚间撤销戒严令，下令释放被捕的全体学生，并于五日清晨撤去驻在各学校的军警。

9. 五四运动的胜利

北京军阀政府虽于六月四日下令释放被捕学生，但对学联提出的最低限度的三项要求（即巴黎和约中有关山东条款不得签字，罢免曹、章、陆，挽留蔡元培），尚无明确表示。因此，原来被打入地下的北京学联，又恢复公开活动，为实现三项要求进行斗争。同时，被监禁在北大法科的八百余名学生，也以在狱学生联合会的名义（他们在被监禁的第一天就成立了这个组织，作为在狱学生进行斗争的领导机关）发表声明：除了必须实现学联提出的三项要求以外，政府还须向在狱学生道歉，承认自己当初逮捕学生，是滥用职权的非法行为。六月五日监守学生的军警撤退后，在狱学生就立即组织自己的纠察队，设立门卫，禁止出入，以待政府表明态度。全国各地也继续坚持罢工、罢市、罢课。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之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六月八日派国务院参议曾毓进为代表，到北大法科，当着关着的八百多名学生的面，

宣布承认学联的三项要求(后来被迫履行)，并向在狱学生正式表示歉意。于是，在狱学生便在全体同学和无数市民敲锣打鼓，列队欢迎的热烈情况下，整队出狱，回到各自的学校。至此，震撼全国的五四运动，便以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结束。

写于一九六一年秋

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

蒋竹如

当五四运动在北京象火山一样爆发的时候，处在军阀张敬尧残酷统治下的湖南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新闻全被封锁。当时长沙《大公报》的新闻稿往往被检查员临时抽去，又不准报纸开天窗，编者只好临时拼凑稿件来填补。五四运动爆发一星期之久了，湖南学生还不能从报刊上得到一点关于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只能零星地从校外听到一些风声。省会长沙笼罩着一片阴森的气氛。直到五月中旬，我们才陆续从报刊上看到了有关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一鳞半爪的报道，但仍不知道运动进展的真实情况。

我当时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并已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学联派来了两个代表——邓仲澐和×××（现已记不起姓名），要湖南学生起来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两代表暂住在长沙小学何叔衡那里。我们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报馆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推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二十五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我和陈书农很早就到了楚怡小学。会后，

各校推举的学生代表也陆续来了，其中有湖南商专的易礼容、彭璜，湖南工专的柳敏，湖南法专的夏正猷、黎宗烈，明德中学的唐耀章，雅礼学校的李振南，周南女校的魏璧、劳启荣，楚怡工业学校的朱后郑，长沙师范的缪瑞祥、高标，妙高峰中学的何培元等，共计二十多人。毛泽东同志介绍双方面的代表见面后，就请北京来的两位代表报告五四运动发生的经过情况。接着，两代表相继发言，汇报北京学生和市民群众游行示威的经过和继续罢课的目的。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拒签巴黎和会通过对德和约。大家聚精会神地听到两代表介绍天安门前五千群众集会的热烈情况，都很激动兴奋；听到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莫不击掌称快，连说“烧得好！”“打得好！”两代表报告完毕，毛泽东同志便提出罢课的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一致主张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随即作出决议：一、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发动罢课和统一各校学生行动的领导机构；二、到会代表散会回校后，抓紧传达北京两代表的报告内容和会议的决议事项；三、全省学联成立后，立即实行罢课。会上还酝酿讨论了全省学联的章程，主要内容是：设正副会长各一人，分评议、干事两部，各设部长一人，评议员和干事各若干人，评议员由各校派出的代表一人充当，干事部分设总务、交际、社会服务、编辑四股，各设股长一人。两天以后，各校学生代表都正式推举出来了，章程也草拟好并油印出来了。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各校代表齐集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首先逐条讨论通过了章程，然后进行选举。选举结果：法专代表夏正猷、商专代表彭璜分别当选为正副会长，商专代表易礼容当选为评议部长（干事部长姓名记不起了）。同时

通过了罢课宣言。

学生联合会的会长是彭光球，副会长是黎宗烈，它的办事人员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新民学会是长沙进步青年组织，领导着学联的各项活动。所以学联是长沙进步青年实际上的实际领导者。

学联成立后，曾将章程、宣言、宣言书，送到长沙《大公报》和其他报纸，请予登载，但《大公报》只将宣言作为“来件”登出外，其余都被检查员扣留了。

学联成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发动罢课实行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当时长沙各校学生的思想并不一致，大多数学生是极力主张罢课的；一部分学生模棱两可，采取徘徊观望的态度；少数学生是反对罢课的。学联开了好几次会动员酝酿，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直到六月二日召开全市学生大会，才通过决议：定于六月三日举行总罢课，并发布宣言。宣言声称：“……夫求学，以卫国也。国如不存，学于何有？我湖南学生出于爱国之感发，鉴于时势之要求，决议自六月三日起，全体罢课，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

六月三日，大多数学校罢课了，只有明德、法专和几个女学校没有罢课。法专代表黎宗烈、邱惟勤对罢课坚持甚力，带领部分同学手持木棒站岗，不许上课，终于达到了罢课的目的。经过毛泽东同志的耐心说服，明德也随即罢课了。法专代表夏正斌因为学联会长，而自己的学校不能带头实行学联的决议，引起了各校学生的不满，遭到攻击，他不久便辞职了。学联改选彭瑛为会长，湘雅代表屈元岳为副会长，长郡代表彭光球为评议部部长。在这次改选中，我被选为干事部部长。这时，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各省重要城市工商学界，纷纷举行罢工、罢市、罢课，

到处游行示威，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高潮。

在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威胁之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免去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电令在巴黎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拒签和约，以缓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强大压力。

在五卅运动期间，学联除领导各校学生举行罢课以外，同时开展了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日爱国运动。为此，曾经在各校学生中组织成许多讲演队、检查队和戏剧队，每天轮流在街头和混江码头进行活动。当时，群众反日爱国情绪高涨，日商藏生昌公司的轮船，无人乘坐，常常空船往返。尽管该公司再三宣布减价甚至不收船费，赠送香烟、毛巾，还是无人问津。只有张敬尧的部队不听学生的劝告，去坐日本的船。不但如此，他们还当街打骂讲演员。由于他们的这种行动，引起日本轮船上的水手也猖狂起来了。有一次，一个日本水手居然上岸来打讲演员。我们把这件事控诉到法院，法院慑于群众的威力，不得不判处日水手三个月徒刑，从此，那些日本水手才不敢再行凶打人了。

检查队负责检查各商店的日货，这项工作是和长沙国货维持会共同进行的。双方通力合作，一经检查出来，就限令商家把日货卖完，以后不得再贩日货。虽然严厉检查，并举行过一次焚毁日货的示威游行，但是少数奸商利令智昏，偷运日货事情仍时有发生。其中坡子街华太长号的老板最狡猾，他经常哄骗检查员，口头说得很奸，“只等拍卖完毕，决不再进日货。”暗地里却囤积日货，并把日货贴上国货标签，冒充国货出售。因此，引起学生的极大愤慨。学联评议部专为此事开了一次大会，商讨对付办法。大家主张将华太长，以示惩罚，平反长彭瑞和少数人不同意这样做。我和评议部长彭瑞球为惩罚奸商，平息公愤，发动长彭，

法专、一师等校学生四百余人，把华太长捣毁了，并在店门口贴上公告，揭发华太长贩卖日货的罪行。事后，华太长老板串通苏杭同业公会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学联置之不理；事情闹到张敬尧那里去了，他也知道公愤难遏，没有理会。这件事一时轰动长沙全城，奸商们虽然利欲薰心，但也不得不稍稍敛迹起来。

戏剧队专演反日爱国内容的新戏，以唤起群众的觉醒。当时演得最多的一个剧本是“亡国泪”，描写朝鲜亡国的凄惨和日人统治朝鲜的残酷。这种戏剧宣传活动，不仅行之于长沙市，而且扩大到外县。

学联在开展上述种种活动之外，还掀起了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运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日，学联发行的《救国周刊》在长沙出刊了。除登载有关反日爱国活动的新闻报道外，并著文抨击旧礼教，宣扬新文化。为了巩固群众的革命热情，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在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下，学联通过决议，创办《湘江评论》，推毛泽东同志负责主编。《湘江评论》创刊号于七月十四日出版，好些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一手写成的。他那时在修业小学教三班历史课，常在深夜为刊物写稿，每期稿件都由我去接取付印。第一、二期各印二千份，三期三千份，四期五千份。除留少部份赠阅，交换和保存外，大部分由学联组成的卖报小组拿到街头叫卖，每份售价双铜元一枚。

《湘江评论》是当时长沙出版的各种刊物中思想性最高、战斗力最强的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博得好评。北京《每周评论》著文介绍，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是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这篇长篇论文，就是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由于《湘江评论》宣传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

想，使得张敬尧大为震惊，坐立不安。于是，又拿出他那套查禁封锁的老办法来了。八月中旬，第五期刚刚印好，还未来得及发行，张敬尧派来了军警，闯进商专，封闭了学联和《湘江评论》。我们事先得到了风声，把学联的文件、印章和来卖完的各期《湘江评论》，一篮一篓地转移到河西的湖南大学筹备处去了。学联虽被封闭了，但我们并未为军阀张敬尧的淫威所吓倒。从此以后，毛泽东同志和学联其他负责人搬到湖大筹备处，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进行揭露和抨击。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三届学联成立了，以重新组织的方式恢复活动，并发表了一篇重组宣言。宣言指责张敬尧一类军阀“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这个宣言，实际上是代表全省人民的一篇驱张宣言书。

重新恢复的学联，选举法专代表徐庆誉为会长，一师代表张国基为副会长。评议、干事两部人员继续留任。毛泽东同志象往常一样，和学联的主要干部研究形势，商讨工作方法。自学联恢复后，仍和国货维持会保持联系，一道进行抵制日货的工作，但彼此之间不协调，时常发生磨擦。原因是学生爱国心切，对贩卖日货的奸商积极查禁，雷厉风行，而国货维持会部分人员却阳奉阴违，有的甚至与奸商伙通一气，受贿舞弊情事，时有发生，激起学生的强烈不满。学联恢复后半个月，就查获了日货不少。为了坚持抵制日货运动，提高群众的爱国热情，学联不顾张敬尧的威胁迫害，于十二月二日，通知各校和各界在教育会坪再次举行焚毁日货示威大会。这天，好几处学生纠察队拖出大批日货到教育会坪集中焚毁，许多店员工人及工厂工人也参加了。群众正在开会讲演时，张敬尧为讨好日人计，便命他的儿子张继忠率领

军队把守教育会坪，阻止焚烧日货。同时又命张敬尧前来向学生训话。张敬尧面目狰狞、怒气冲天地对学生破口大骂：“你们为什么不在学校里读书？到这里来干啥？有书不读，胡作乱为，简直是土匪！你们这些男土匪、女土匪，扰乱秩序，破坏治安，我就要用对付土匪的办法来对付你们！”学生听了这些诬蔑的话，气得忍无可忍，马上就有好几个人从队伍中跑出来反驳。有的说：“不要信口诬蔑。我们是爱国学生，决不做无耻的卖国的土匪！”有的说：“奸商不爱国，甘心为日本人尽忠效力，可耻可恨！希望军人不要与奸商一鼻孔出气！”这些话刺伤了张敬尧，他命令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用枪托毒打学生，打伤十几个人，内有一人重伤，几乎送了性命。在主席台上的徐庆誉等人，都被捆绑起来，拖到内面打了一顿，才放出来。这次日货没有烧成，学生反遭毒打，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从此爆发起来了。

十二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同志和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等都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里开会，我也参加了。毛泽东同志是会议主持人，对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决议发动各校学生长期罢课，组织驱张请愿代表团，分赴北京、衡阳、常德三地活动，利用各方面力量驱逐张敬尧。会后，毛泽东同志嘱我立即去学联布置全市学生罢课运动，尽先组织赴京代表团。我到学联没有找到徐庆誉、张国基，便和评议部长彭光球商量好，马上发出通知，请各校学联代表于四日上午到学联开会。届时，各校代表到齐了，正副会长及各部负责人都到了。会上，我提出了枫树亭的决议。接着彭光球发言，他慷慨陈辞，赞成罢课。随后各校代表相继发言，意见有分歧，但绝大多数是赞成罢课的。最后通过决议：一、组织驱张学生请愿代表团赴北京请愿，要求撤惩张敬尧；二、各校在十二月六日一律罢课，同学自动回家，不许走漏消息；三、长

期罢课，张敬尧不离湖南，学生不回校；四、各校学联代表向学交当局交涉退还伙食费，作为学生回家旅费。

我回到第一师范，当晚即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通过学联的决议。并由大会推举我和钟秀两人为赴京请愿代表团代表。会后，我向一师当局交涉，退出学生入学时所交押金，作为罢课后回家的旅费。十二月六日，一师学生全体罢课，各人捆好行李回家去了。其他学校学生，绝大多数也都罢课回家了。张敬尧对学生的行动是很注意的，防范严密。学联怕走漏消息，影响代表行动，便通知各校参加请愿的代表，于七日下午起分批出发，尽快离开长沙。

先是，在学联决定长期罢课的那天晚上，派了易礼容代表先赴汉口明德大学商借两间房子，作为代表团在汉口停留的地方。因为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布置后方工作和组织赴衡阳、常德的请愿代表团，不能同我们去京的代表一道行动，我们需要在汉口等地，这是他亲自布置的。

我们自长沙出发前，毛泽东同志还邀集大家谈了一次话，主要是如何检点行动，避开张敬尧的耳目。因此，我们分作好几批出发，每批二三人或三四人不等，彼此不打招呼。我们到汉口后住在明德大学，和旅鄂湘籍学生取得了联系，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随后，毛泽东同志来了，于十二月十七日继续乘车北上。到京后，全体代表住在马神庙北京大学寄宿舍，毛泽东同志和由沪来京的傅熊湘等，则住在相隔不远的毗卢寺。

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首先和北大学生以及北京学联取得了紧密联系，他们表示极力支持；其次，联系旅京湖南学生联合会，联系了国会中的留湘议员如谷定一、罗正钧、陈其采等。得到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在第三方面，也获得了若干援助。

我们在北京湖南会馆开了一次同乡大会，但开得不大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次开会的目的，是想要求在京湘籍名流上绅同伸义愤，大家签名上书请愿，以壮声势。结果真正有力量说话的人到得不多，既不愿上台讲话，也不想签名。经过大家包围劝说，才勉强签了名。我们在京一连向总统府进行七次请愿，都无具体结果。有几次无人接见，只递上了呈文。有一次冒着大雪到了怀仁堂，坐了很久的冷板凳，国务总理靳云鹏才派了一个秘书出来接见，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答应转达上去。结果也是石沉大海，渺无消息。但是张敬尧的臭名，已因我们的宣传传播开了。不久，代表团派遣彭光球代表转赴衡阳，加强赴衡阳代表团的的活动，要求吴佩孚早日撤军。彭去衡月余，吴部撤防仍无动静。于是，旅京湖南学联特派代表罗敦伟赴衡见吴。我们代表团派我一道同去。农历庚申年元旦，我和罗乘车到株洲，下车后准备搭帆船往衡阳。穿过株洲街心时，家家关门闭户，景象萧条，爆竹无声，彩灯息影，来来往往吆喝叫嚣的，尽是一些凶狠的军人，昔日繁华市容，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我们踏雪走到江边，约莫走了三里多路，才找到一只小篷船。逆水行舟，农历正月初五才到衡阳。

我们于到衡阳的第二天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吴佩孚，要求会见。吴随即派了人来，约定会见日期。见吴时，我们利用吴与张敬尧的矛盾，说了一些刺激的话，要求吴早日撤军，不再为媚日卖国的张敬尧保镖。他回答说：“我早有意撤兵。现在计划已定，舟车俱备，只等上峰批准，即行开拔。”我们问他：“假如上面不准呢？”他说：“那也要走，我不再为张敬尧守门了。”我们说了一些恭维他的话，他很高兴。辞出时，吴命左右拿出他所写的《蓬菜诗稿》两本分赠我们。之后，罗敦伟回北京，我就留在驻衡代表团工作。

两个月后，吴佩孚开始撤军了。我们代表团转赴郴州，要求谭延闿早日进军，驱逐张敬尧。其时谭早已得到消息，有所布置。过了四五天，湘军接管了吴军防地，直接和张敬尧的军队开火了。

张敬尧自吴军北撤后，势力孤单，兵无斗志，已成强弩之末。湘军乘胜前进，一战克复宝庆，再战克复护湘关，三战收复长沙，张敬尧狼狈出走。我们代表团随着湘军的进展，在榴花时节一帆风顺地回到了长沙。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原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史研究馆供稿）

回 忆《新 湖 南》

龙 伯 坚

六十年前，五四运动的革命惊雷，冲破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五四运动的洪流滥觞于古都北京，它以不可遏阻之势奔腾澎湃，过黄河而到长江。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湖南的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她既受到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又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革命形势。湖南的五四运动，是与毛泽东同志早期的革命活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领导、编辑的进步报刊，在这场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

五四时期，全国各地以推动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为宗旨的刊物，在湖南广为流行。湖南人民不仅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而且冲破种种障碍，自己出版了一批周刊。仅长沙各学校就发行了若干种周刊，如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的《湘江评论》、周南女校出版的《女界钟》、明德学校出版的《明德周报》、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出版的《岳麓周刊》、甲种工业学校出版的《甲工周报》等等。这些刊物收费低廉，一般人都能购买；一周内轮流出版，读者每天都有报读；经常由学生亲送上门，方便群众。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的《新湖南》，就是五四时期湖南进步刊物中的一种。为了对各校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刊物加

强领导，毛泽东同志倡议成立学生周报联合会，会址设在楚怡小学。毛泽东同志的战友何叔衡同志当时在楚怡小学教书，因此楚怡小学成了当时湖南学生运动的据点之一。学生周报联合会由《湘江评论》主编毛泽东、《岳麓周刊》主编曹典琦（后改名曹伯韩）、《甲工周刊》主编舒秋梁、《明德周刊》主编唐耀章和我共六人组成，不设会长，另设总干事一名，负责保管档案、通讯联络、主持会议和其它日常工作。我当时是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学生代表，被推为学生周报联合会总干事。当时出版的学生周报可能还不止这几种，有许多周报只出版一期就停刊了，所以他们也没有来得及参加学生周报联合会，只有上述这六种周报参加了学生周报联合会。

《新湖南》周刊的刊名是典琦起的。其由来是：辛亥革命以前，湖南有位著名人物叫杨守仁，号笃生，后改名杨毓麟，是同盟会会员。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著有一本鼓吹革命的小册子，名曰《新湖南》，书中有“在天心阁横自由钟”这句话，我们当时深受其影响。一九一一年黄花岗起义失败了，杨毓麟在英国归国后，一气之下，投海自尽。《新湖南》的刊名脱胎于《新湖南》这本小册子。《新湖南》分月刊、周刊两种，月刊是装订成本的杂志，周刊是四开报纸。月刊和周刊虽然同名，但实际上各不相干。

《新湖南》月刊是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创刊的，由我和苏远校编辑，发刊词由苏远校撰写。该刊第一期封底虽有第二期篇目预告，但实际上仅出一期，第二期未出。我在该刊第一期发表过《遗产制度》、《释气》两篇文章，当时用的名字是龙敏强。《新湖南》月刊的宗旨是提倡“六三主义”，即提倡新道德，提倡改造家庭制度，提倡男女平等，提倡工读主义，提倡平民教育，提倡道德修养等项。这一系列主张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但并没有因

出民主主义的范畴。

《新湖南》周刊的前身是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救国报》。该刊由我主编，内容主要是讨论反帝反封建。仅出了两期，即改名为《新湖南》周刊。《新湖南》周刊共出九期，第一、二期由我担任主编，湘雅同学李振翩、张维担任编辑委员。由长沙西门织机巷温鄂印书馆承印，每期印一千份，每份售钱一枚铜元。除在省内发行外，还远销北京、江浙一带。周刊的经费是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从伙食费中节省出来的。五四运动之前，学生吃饭每顿每桌有六碗菜；五四运动之后，学生主动提出减少两碗菜，用节余的钱充当进行学生运动和出版刊物的经费。仅从这一件事情，就可看出当时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很高的。

《新湖南》周刊出完两期之后，我便建议由毛泽东同志接编。为此，我曾与李振翩、张维一道走访过他。我们三人中，李振翩以前没见过毛泽东同志，我和张维是在湖南学生联合会跟毛泽东同志结识的。该会成立于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第一任会长是张维，毛泽东同志的战友柳直荀也是该会负责人之一。毛泽东同志任该会文牍股干事，所以学生联合会出版的《湘江评论》由他主编。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文章极为佩服。当时《湘江评论》又遭皖系军阀张敬尧查封，毛泽东同志一时没有发表文章的舆论阵地，所以我认为由他接编《新湖南》周刊是最合适的。

关于我跟张维、李振翩会见毛泽东同志的情况，前几年，美国耶鲁大学赵浩生教授走访李振翩之后，曾作如下报道：“一天，龙伯坚好象突然发现救星似地放下笔，叫喊起来：‘去走访毛润之！’龙伯坚和张维是早已熟悉毛泽东的，李老只是读过毛泽东的文章。……这次会见对他们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他们三人同毛主席约定在图书馆见面。说是报纸阅览室，实际上是一间破烂

不堪的屋子，里面放着一张长桌，几张板凳。进入屋内时，看见毛泽东一个人全神贯注地阅读报纸。当他们一踏进这间屋子，毛泽东放下报纸，微笑着站起来迎接他们。那天，毛泽东穿着一件很干净的中国长袍。他瘦削而魁梧，长发、宽额头，一双温和而富有理智的眼睛，神态和蔼，具有吸引人的力量。……毛泽东答应任《新湖南》的总编辑。”^①

毛泽东同志接编《新湖南》期间，我们跟他几乎天天见面。每当他来到我们宿舍写文章时，总是很快聚集了很多前来向他求教的同学。毛泽东同志谈笑风生，才智过人，下笔万言，能够一边侃侃而谈，一边挥笔疾书。他那时常用一种红格稿纸，毛笔楷书，一笔不苟。《新湖南》从第三期开始，就继承了《湘江评论》的战斗传统，对于皖系军阀张敬尧督湘期间的虐政更多所抨击。毛泽东同志每期都为《新湖南》写很多篇论文，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犀利透辟的新文风，反映当时革命人民的思想意志和五四运动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

自第七期开始，《新湖南》周刊进行革新。其革新宣言写道：“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虑。……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此宣言曾在上海《新青年》杂志上作为广告刊登）。第七期以后的内容，真正实践了革新宣言宣布的四大宗旨。她继承五四运动的

① 赵浩生：“三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走访毛主席的旧友李振翩先生，此文原载于美国报纸，后由日本从英文译成日文在日本《世界周报》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八号发表，后又由中国从日文译成中文。在外文出版局研究室编辑组编印的《编译参考》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上发表。

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由于革新后的《新湖南》周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因而更为张敬尧所忌恨。出完第九期之后，她也跟《湘江评论》一样被查封了。张敬尧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湖南人民更广泛更剧烈的反抗。这年冬天，毛泽东同志为领导驱逐张敬尧的运动，又去了北京。

毛泽东同志接编的《新湖南》周刊，虽然仅出了自第三期至第九期共七期，但在社会上却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有的文章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也发行了一种《新湖南》周刊，实在很有价值……这真是湖南教育上的曙光了。”^①有的文章说：“湘雅医学发行底《新湖南》，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底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②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一期，根据北京《国民公报》，《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刊登的有关报道，对《新湖南》等湖南的进步刊物进行介绍，特别指出革新后的《新湖南》周刊，“其中精彩的真是不少。”

由于《新湖南》周刊继承了《湘江评论》的战斗精神，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在毛泽东同志早年革命活动和湖南的五四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九四九年湖南解放后，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定名为《新湖南报》，毛泽东同志亲笔书写了报名。因为当时各省省报的名称均在“日报”二字前冠以省名，唯独湖南是例外，我以为这个报名与“五四”时期的《新湖南》周刊有关联，便于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写信询问毛主席，并请求毛主席将从前在延安送我的旧闻重读一遍。次年三月十四日，毛主席在百忙中写信作答。略称：“……《新

① H·C，〈湖南省教育前途之一忧一喜〉，《晨报》1919年11月8日。

② 韶卿，〈长沙特约通信〉，《晨报》1919年11月25日。

湖南>报名是湖南同志们起的，与从前报名偶合，引起你的高兴，我亦与有荣幸。旧词无足取，不必重写。……”

一九五〇年夏，我到北京开会，受到毛主席的单独接见，毛主席向陪我前来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同志介绍说：“这是我从前在湖南从事革命工作的老同志。”毛主席一一询问了五四时期旧友的情况。毛主席的记忆力最强。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对于唐朝韩愈（昌黎）的一些主要文章能背诵如流。这次会面时，他还对我说，仍然能背诵好多篇韩昌黎的文章。这次谈话给我以极大的教育。

最后，请允许我以四首小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一）六十年来迹已陈，相从犹有旧时人。

能开弱国翻身例，四海弥天拜后尘。

（二）缔造艰难仗导师，志坚曷远有先知。

长征两万五千里，血泪山河铸史诗。

（三）壮怀伟语笔生花，余事辞章亦大家。

文武能兼谁比得，天公抖擞换中华。

（四）惊雷霹雳震环球，开国雄才史莫侔。

弱草怪尘原一瞬，交游光宠亦名留。

一九七九年三月，北京。

新民学会点滴回忆

周敦祥

一九一八年春，毛泽东同志邀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在长沙成立了一个崭新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刚成立时的章程规定了她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后来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为会员所一致通过的宗旨，就是毛泽东同志平日的主张，反映出新民学会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反对旧势力，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研究新思想、新文化，努力为挽救国家、改造社会而奋斗。

五四运动时期，我正在长沙周南女校读书。当时我校有好几位教师参加了新民学会，现在记得起姓名的有陶毅、钟楚生、陈启民等。学生入会的有魏璧、劳启荣、贺延祐和我。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新民学会在周南女校召开会员大会，决议学会设“评议”、“执行”二部，我和魏璧、蒋竹如等当选为评议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会后还摄影留念。

在少数接受新思潮同学的影响下，周南女校学生决定创办《女界钟》周刊，讨论有关妇女教育、妇女解放和妇女劳动等问题。我被推举担任这个周刊的总编辑。当时感到担子重，有些胆怯。毛泽东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几次恳切地鼓励我不要怕，要大胆做去。他亲自写了好几篇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交给《女界钟》发表，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中旬，长沙城里发生一件新娘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顿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资料，震撼了整个社会。自杀的新娘是个女学生，名叫赵五贞。她极不满意父母的包办婚姻，而又无力反抗，因此在出嫁之日愤不欲生，于花轿中用剃刀割颈自杀。第二天长沙大小报纸都报道了这件新闻，有的还写了评论，更加引起社会上的重视。

对赵五贞之死，毛泽东同志指示我在《女界钟》上出特刊，宣传青年恋爱自由，反对父母包办婚姻。毛泽东同志并在特刊上批评过赵五贞的父母包办婚姻的错误。《女界钟》对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的风习礼教，抨击不遗余力。并具体提出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反对一夫多妻制，反对蓄婢；要求男女教育平等，要求妇女经济独立，要求婚姻自由，男女社交公开。我们写了许多文章进行宣传，以唤起妇女的觉醒。

《女界钟》是当时湖南妇女界唯一的刊物，发行数达到四千多份，风行一时，影响不小。不幸的是，只出了四期，就被军阀张敬尧强令封闭了。

衡阳五四运动的片断回忆

屈子健

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学生运动蓬勃兴起。长沙和衡阳成了全省学生运动最活跃的地区。在长沙的学生运动中起先锋和骨干作用的是第一师范，在衡阳则是第三师范。

一九一二年，我任教衡州府中，在第三师范兼课。一九一六年起，专任三师教员。五四时期衡阳的学生运动，我曾亲历。现就回忆所及，述其片断。

(一)

三师教员中有个蒋啸青，耒阳人，和我是优级师范同学，这时我们又在三师同事。他教博物，我教数学。蒋和我接受新思想较早，远在清末和民国初年，我们就经常阅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和《小说月报》等新的刊物。到了五四运动前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如《新青年》、《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等相继出版，我们更是如获至宝，除自己悉心阅读外，并介绍给一些学生阅读。当时和我们接近、一同阅读新书刊的学生有蒋先云、黄静源、贺恕等。蒋等还在校内组织“心社”，出版油印刊物《先锋》，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这些同志从那时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认定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们都成了共产党员，为革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不

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九二〇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专门销售进步书报。三师成立了新书报贩卖社，由贺恕任经理，与文化书社挂勾，经销书报数十种，国内省内出版的都有。销售对象主要是三师和衡阳其他学校的学生和教员。三师学生还到邻近的几个县去推销新书报，受到青年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经常供不应求。

三师教员组织了星期讲演会，轮流派人到各中等学校去讲演。办法是事前与各学校当局联系，取得他们的同意，约定时间，由他们召集学生听讲。各学校当局对这种讲演，有的衷心欢迎，有的虽不愿意，但迫于五四运动造成的声势，也只好勉强接受。担任讲演较多的是蒋鼎青和我两人。我们先后去讲演过的，有第三女子师范、第三甲等工业学校、衡阳县立中学和成章、道南、大同、新民等私立中学。讲演的内容为：俄国十月革命介绍，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为什么要进行文学革命，等等。每次讲一个题目，听讲的同学非常踊跃。

新书报贩卖社业务的开展，星期讲演会的举办，对于新思潮、新文化在衡阳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

一九一九年五月下旬，毛泽东同志等在长沙发起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不久，在毛泽东同志的推动和帮助下，湘南学生联合会也成立了。三师学生蒋先云、黄静源和第三甲等工业学校学生夏明翰等成了湘南学联的领导骨干。蒋鼎青和我被聘为常导员。我们仅列席过学联的几次会议，很少参与具体工作。

湘南学联成立后，立即开展活动，主要是组织各校学生进行反日爱国斗争，声援各界民众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宣传

的方式，除上街讲演、印发传单外，还演话剧。学校也有学生参加宣传，而以三师学生为最多。出动讲演的学生人数多达数千人。他们讲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听众无不动容。演话剧通常都在醴陵寺坪里（该处设有戏台），内容多是宣传亡国的痛苦和揭露军阀卖国贼的罪行，剧本有采用现成的，也有自己临时编写的。每次演出，观众都很踊跃，扶老携幼，人山人海，收到了较大的宣传效果。

学联还联合商会及其他群众团体组织国货维持会（当时全国都有这个组织），我被推为会长。商会会长黄代杰（一家百货店的老板），是一个颇具爱国思想的资本家，对此举甚为赞助。会内常设办事人员二十余人，每人每月发给津贴十至二十元，所需经费最初由商会提供，后来查获日货没收充公的渐多，便由日货变价开支。国货维持会每天派人赴各个码头和可疑的商店检查，查获日货不少。这样，虽然不能完全杜绝狡猾商人偷贩日货的行为，也使他们多少有所收敛。后来国货维持会结束时，尚有余款数千元，经大家同意，拨出一千元，交我创办新民中学。

一九二〇年春，以何叔衡为首的驱张代表团来到衡阳进行活动，湘南学联积极配合。驱张代表团发行《驱张日报》，具体工作都由学联担任。向吴佩孚请愿，亦有学联代表参加，我也去过一次。开始吴的态度不明朗，后来才逐渐明朗起来，终于率部北撤。驱张运动因而得以顺利进行，取得最后胜利。

（三）

张敬尧统治湖南时期，第三师范校长为颜昌晓。驱张胜利后，改任颜方珪为校长，我当了教务主任。经我提议，辞退了一批思想陈旧的教员，聘进了一批新教员。辞退的教员有贺广成、夏松

林等人。新聘的教员有陈书农、黄和钧、何伯言、彭粹夫等人。这时，校内空气比较自由活跃。我们向学生中提倡新文学，改易他们做白话文，还把《新青年》上的文章作教材，自印讲义。这些做法，在当时的衡阳，是开风气之先的。

(三)

一九一九年湘南学联成立之前，三师进步学生蒋先云等就与在长沙的毛泽东同志保持通信联系。毛泽东同志把《湘江评论》每一期都寄给他们。一九二一年春，蒋先云等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将“心社”全体成员转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与此同时，省立第三中学、第三中等工业学校、第三女子师范等学校，也都建立了团的组织。一九二二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展了黑明翰、蒋先云、黄静源等一批先进青年入党，并在第三师范建立了湘南地区第一个党文部。蒋啸青也在这时入了党。

这年暑假，我率领衡阳教育参观团到江苏参观，路过长沙时，见了毛泽东同志。他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去看陈独秀。我在上海见到了陈，向他谈了一些衡阳教育界的情况。他听说三师缺少英文教员，便把一个名叫张秋人的同志介绍给我。我回衡阳经过长沙时，带着陈的复信和张一道去见了毛泽东同志，回到三师后，便聘请张为英文教员。张秋人被派到三师来，是把加强衡阳地区党的领导的任务交给了他。他的具体活动，我不大了解。所看到的，是他与校内外的进步学生和教员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对学生的革命行动予以坚决的支持，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四)

一九二三年上学期，三师发生一次大的风潮。起因是当时位

校长的刘志远，串通事务主任，克扣学生的伙食费，贪污肥私。事被揭露，学生提出抗议。学校当局实行高压，开除三个学生，学生愤而罢课。当局变本加厉，又开除五十人。于是事态进一步扩大，罢课持续多日。学生请愿发通电，要求撤换校长。刘志远则认为这次事件是我和蒋啸青、张秋人等怂恿学生搞起来的，是共产党的阴谋，目的在夺取学校的领导权，也向省里告我们的状。后经颜方璠（当时任省参议员）等出面调停，风潮虽告平息，我们几个人却难于继续留在三师，便一个个辞职走了。我离开三师后，以谢晋的关系到谭延闿的讨贼军（讨伐赵恒惕）总司令部任职。张秋人回江苏原籍。蒋啸青一度去广州，旋又返衡阳，在三女师任教员，兼做党的工作，北伐胜利后当过三师校长，并参加衡阳党的领导工作，“马日事变”后流亡武汉、上海等地，后来回到耒阳，参加湘南暴动，任县苏维埃主席，失败被捕，英勇牺牲。回忆故人，不胜伤感！

一九七九年三月

五四运动后湖南第一师范 的教育改革

程星龄

五四运动时期，湖南第一师范曾是湖南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一九二〇年，在易培基接任校长后，一师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通过这次教育改革，使一师的面貌为之一新，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方面发挥了更加显著的作用，博得了省内外进步人士的高度评价。

一师教育改革前夕，一九一九年冬到一九二〇年夏，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下，湖南人民以学生和教育界人士为主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驱张（敬尧）运动，一师学生联络长沙各学校的学生举行总罢课，配合谭延闿、赵恒惕的反张军事行动，一举赶走了张敬尧。一师学生在驱张运动中受到了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为教育改革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驱张后，谭延闿继任督军兼省长，易培基任省长公署秘书长兼一师校长，就为一师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易培基当时是一个具有一定民主倾向的官僚。他拥护新文化。但在某些问题上，却是相当保守的，例如他学习文言文，从不用语体文写书信和文章，从不浏览新书刊，可引为憾。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易先后任国民政府农矿部长、上海劳动大学校长、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我在他下面工作过，

还在他家里寄住过，对他是比较了解的。他之所以能够主持一师的教育改革，我以为除了他本人具有一定的民主倾向这个基本条件以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形势的推动。一师那次教育改革，发生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知识界除了少数极端顽固分子以外，多数人是随大流的。官僚中也有一些人一贯善于投机，谭延闿就是一个典型。易培基作为谭的幕僚，在政治作风上受过谭的熏陶，遇事不能不唯谭的马首是瞻，他审察时势，对新的潮流采取迎合的态度，是很自然的。其次，毛泽东同志等一师的进步教员和学生，对易在一师进行教育改革，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易原是一师的国文教员，教过毛泽东同志所在的第八班，他对毛泽东同志非常器重，二人过从甚密。一九三〇（或一九三一）年间，有一次我和几个一师同学在易家吃晚饭，饭后闲谈，谈到一师的一些人物，易说：“毛泽东不仅是一师杰出的学生，而且是当代杰出的英才。”一九一九年秋，毛泽东同志已从一师毕业，任一师附小主事。其时易任谭延闿的秘书长。毛泽东同志自己并通过别人直接间接怂恿易兼任一师校长，随后又推动他进行教育改革。易为了博得进步学生和教员的好感，替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也就摆出一副进步的姿态了。

一师旧有的教职员，多系湖南优级师范出身，长期以来，他们把一师作为把持湖南教育的基地，守旧势力，极为雄厚。如果不利用易的政治地位和力量，这次一师的教育改革恐怕是不能实现的。

易接任一师校长一职，举行开学典礼，谭延闿曾亲来参加，发表讲话。他首先讲了一师的历史，易培基曾到自己当过师范学堂监督，极力守旧，不愿有所改革。多少年来，学校的名称虽然不断

改变，甚至校址也已改建，面貌一新，但教学内容和方法，却仍是旧的一套，这正是我们国家长期落后、贫困的根源之一。谭的讲话大有不胜今昔之感。最后，他对易所宣布的改革主旨和措施大加赞扬，表示极力支持。

易接任校长后，任匡日休(邵阳人，号务逊，后改名互生)为教务主任。易本人很少在学校，日常校务全由匡负责处理。匡是刚从北京高师毕业的，是五四运动中的有名闯将，为人谦逊勤劳，勇于任事，为全校师生所爱戴。一师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都是由匡负责执行的。匡在一师任职时间不很长，离开一师后，在上海创办了有名的立达学园。

这次教育改革具体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首先，在人事方面。在改革前，如上所述，一师的教职员大多数是湖南优级师范毕业生，思想比较陈腐。易接任校长后，把原有的教职员全部撤换，一个不留。先后延聘了一班参加过五四运动或受过五四运动熏陶的新人物，其中大部分是刚从北京高师毕业的，如匡日休、周谷城、舒新城、徐钰礼、文剑如(即文亚文)、徐德麟、刘鸣剑、朱思德、熊梦飞、吴相如(即吴晦华)、孙俊工、彭静仁、王凤喈等；还从浙江师范(当时也是有名的进步学校)聘来了夏丐尊、沈仲九(即沈铭训)；还有湖北中华大学毕业的余家菊、陈启天；还有李达、李维汉、陈昌(即陈章甫)、田汉、辛树帜、陈鹿苹、赵景深、汪馥泉、王鲁彦、陈奎生、王人福、张铁民、樊树芬、赵悲谟、吴芳吉、魏先朴等人；还聘过一位美国女教员教英文。传说还延聘过陈独秀，陈当然不会离开北大到一师来。这些新聘来的教师，就其业务水平来说，绝大部分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其中如李达、周谷城、田汉、辛树帜、舒新城、汪馥泉、赵景琛、夏丐尊等，后来都成为有名的专家。就其思想状况来说，多数人在当时是在

比先前好多了，每周可吃到一两次红烧肉和其他荤菜。有时甚至还有节余，叫伙食尾子，分给同学们。大家都很满意。

第三，出现了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学风。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在学校的人事彻底更动和管理制度彻底改革的基础上，同学们开始组织各种团体。团体和团体之间，个人和个人之间，常就政治和学术问题，各抒己见，展开辩论，从而在学校内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学风。在这次教育改革前不久，一九一八年上期，毛泽东同志亲自发起组织了著名的“新民学会”。它的成员不限于一师的师生，但以一师的师生为多。到了教育改革以后，一师学生参加的更多，学会更加活跃。一师的教育改革，促进了学生的思想解放，又有“新民学会”这么一个开路先锋，于是有更多的学生团体出现。其中肖述凡领导的“崇新学社”就是较大的一个，拥有社员二百多人，成员思想倾向社会主义。与“崇新学社”相类似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有“明社”和“O(阿)社”，人数较少，成员思想倾向无政府主义。此外还有一些学术色彩较浓的组织，如美术研究会、儿童文学研究会、小学教育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博物研究会、英语研究会等等，几乎每门课程都有它的研究会，名目繁多，已记不全。各个团体经常出小字报，也有以个人名义出的小字报，贴在学校前面的走廊上，琳琅满目。小字报的内容，大都是就一些政治问题开展辩论，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绝大多数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少数倾向无政府主义。至于国家主义，在当时还看不出苗头。这些学生团体，还编印定期或不定期的油印刊物，例如“崇新学社”办的“野火”就是那些刊物中比较出色的一种。还有不少的学生经常在长沙各报发表文章。当日《大公报》和《国民日报》的副刊，经常是由一师学生投稿。《湖南通俗日报》也经常采用一师学生的

文稿。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小字报，特别是通过向各报投稿，一师学生在发扬五四精神、宣传反帝反封建、传播新文化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第四，彻底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这是当日教育的一个主要环节。教材方面，清除了颂扬封建主义的教材，采用反帝反封建的教材。一师很少采用一般的教科书，多是由教师自己编写讲义。废除了以灌输封建道德教条为内容的“修身”课程。国文课的改革是教育的一个突出环节。教育改革前，教的都是文言文，并且随教师之所好，有的喜欢汉魏文，有的附和桐城派，还有专教四六骈体文的，也有爱好梁启超的“新民”文体的，就称之为“新人物”。在教育改革中，彻底废弃了文言文，改用语体文（当时称为白话文），教材主要选自当时流行甚广的《新青年》，有时也选用《国民日报》副刊《觉悟》中的文章。教学方法，废除了以前由教师逐字逐句讲解的纯粹注入式，改为由教师先就本文的大意加以阐述和引伸，然后采用提问方式，由同学们各抒己见，自由讨论，有时还进行启发，引起争辩，显得生动活泼。有的学力较浅，或者思想陈腐的教师，就在辩论中塌了台。例如教国文的名牌教师傅君剑就是在与学生争论中塌台的。有个教历史的刘朴，教得太不好，一个小时没教完就被冲走了。还有吴芳吉教国文，在同学生肖述凡辩论中被诘问得哑口无言，不好下台。其实，同学们对老师并不是存心捣蛋，而是要求真才实学。例如有位教数学的陈鹿苹，到一师教课时才二十三岁，由于学有根底，讲授得法，尽管对学生要求很严，同学们都虚心接受他的教育。我所在的第十五班的国文老师夏可尊，极力提倡发挥学生自己的思想，反对专门替古文作注释，把作注释的教学方法讥之为留声机。我班有个同学叫王功炯，读古文很用功，背得烂熟，作起文章来

总是引经据典，略加连贯，即能成篇，教改前一向博得老师的赞扬，经常得百分。到了夏丏尊教学时，王生抄书的习惯难于改变，尽管抄的不是古文而是语体文，但夏认为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何必多此一举，每每诱导王生重作。另外有个同学名叫陈润棠，往时作文，总是本着自己的思想来写，不爱引述经典词句，老师批评他的作文“空泛无据”，不善读书，不能替古人“立言”，仅给以及格分数。其所以给予及格，说是文字还通顺。到了夏教学时，对陈生的作文，却加以赞扬，说是思想性很强，每每用以示范。夏教国文，非常注意文法和修辞。这是我所经历的几个国文教师所未有过的。当时，一般国文老师改作文卷，圈圈点点之后，认为较好的文章，便加上一个千篇一律空洞无物的总批语，从来不加眉批。听说有个教四六骈文的教员叫汪根甲，由于兼课太多，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改作文卷，竟由他的姨太太先把学生的作文卷圈点一番，然后由他加上总评。由于汪根本没有对过作文卷的内容，每每闹出总评与文章内容无关甚至矛盾的笑话。夏改作文卷，非常认真。对文法上的错误，总是划上一条直线，在直线旁边加上改正的字句。属于修辞方面的，则用勾去的记号。这里又分两种：一种是勾去赘字、赘词、赘句；一种是勾去不恰当的字、词、句，改用更为恰当的字、词、句，并经常加上批语。夏还间常挑选作文卷在文法或修辞方面存在较大的毛病具有典型性的例子，写在黑板上，加以讲解。这样的教学方法，大大加速了学生在语文学上的进步。夏离开一师后，在上海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其中专辟了“文章病院”一栏，颇受中学师生的欢迎。

教育改革前，一师的体育课开“起来”比较陈旧的。主要只有游戏操，徒手操（又名柔术）和器械操几种。教游戏操

的是张葆初(传说此人后来流浪在上海),改徒手操的是陆健(江苏武进人,民国初年的日本留学生),教兵式操的先后有徐凯、雷明亮等(都是退伍的中下级军官)。球类则仅有足球一种。教育改革后,先后延聘了北京高师毕业的朱恩德,东南大学毕业的陈奎生以及王人丽(专教游戏操)等担任体育教师。增设了单杠、双杠、木马等器械操和田径、篮球、排球等项目。这时一师才算有了现代的正式体育课。毛泽东同志在一师求学期间,曾组织同学开展游泳活动。他毕业离校后,游泳活动仍继续进行。虽然这不是正式的体育课,但对于锻炼学生的体魄却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师在教育改革中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一师的图书馆,除旧书收藏颇为丰富外,对五四运动以后的新书刊,包括各地方的进步报纸,也不遗余力地加以搜集。其中毛泽东同志赠送了不少新书。毛泽东同志最爱好搜购新书,自己阅读后,就赠给图书馆。这是当日长沙任何学校望尘莫及的。借书不限日期,也不限数量,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可以互相借阅,给予了同学们加版自学以很大的方便。另一种现象是,教育改革前,教师们特别是有些“名教师”一般都不在学校住宿,师生之间,除上课外,很少接触。教育改革后,绝大多数的教师在学校住宿,师生之间,接触频繁。晚餐后,同学们都喜欢和老师一道沿着铁路两旁散步,三五成群,谈笑风生。晚上,同学们也喜欢聚集在老师房间里谈论。教我们这班国文的夏丏尊,于古典文有根基,对新文学理论,也有一定的造诣,还精通日文,研究过佛学。我很钦佩他的学问渊博,品德高尚,经常偕同其他同学陪他散步,晚间也常和其他同学在他的房间里谈论。图书馆的完善,师生之间的接触频繁,配合着各学科研究会的自由讨论,再加上优秀教师的循循……,使同学们在努力自学和个性解放方面得到极大的帮助。不少的同

学就其所爱好的学科，进行深入钻研，终于成为对某一学科有较高造诣的专才。这不仅在教育改革前的一师很少有过，在当时长沙其他学校也是罕见的。

第五，招生方面的改革。首先是以极大的魄力，开创了中等学校男女同学的新风。在一师教育改革前，湖南全省乃至全国的中等学校都不是男女同校。教育改革后的一九二一年，第二十一班开始招收旁听女生，易培基曾把任的两个女儿送到一师，作为倡导。此事曾引起了湖南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上的很大震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四精神在学校的影响的不断扩大，中等学校男女同学的风气，终于为社会所接受，形成一种制度。其次，一师招收学生，历来是按各县的人口多寡来分配招收名额的，例如我所在的第十五班，醴陵县人口较少，就只额定招收两名，长沙县人口多，就额定招收四名，从不招收省外更不必说国外的学生。教育改革后，打破了这个老框框。一九二二年二部师范（招收旧制四年毕业的中学生再在一师进修一年，称之为二部师范）就招收了三名湖北学生。一九二二年第二十二班还招收了一名由博参的朝鲜人。这些来自省外乃至国外的学生，都是有着一定的抱负，羡慕一师的名声，通过进步的教师介绍而来的，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和保护。

第六，其他方面。一师的教育改革，除表现在上述各个方面外，还有几点应当提及，也是值得赞扬的。（一）演话剧。在今日，学生演话剧，乃是极为平常的事。可是在旧社会，戏剧演员被称为“优”，并且“娼”“优”并列，列入“贱人”。封建科举时代，凡属“娼”“优”的子孙皆“不得入贡”，不准许步入考场。辛亥革命后，这种恶习，虽已有所改变，但以学生的身份演话剧（当时称之为文明戏），毕竟仍被认为是一种耻战。教育改革

后，一师的师生先后演出了《卓文君》、《湘累》、《孔雀东南飞》、《夜未央》等剧，剧情都是反对封建礼教的，必然受到一班道学先生的非议和抨击。（二）创办工人学校。教育改革前，一九一七年一师校友会办了一个工人识字班，仅招收一师的工友。教育改革后，一九二〇年下期，在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和主持下，改名为工人夜校。又增设了平民夜校，仍由校友会主办，除一师工友外，还广泛吸收一师附近的几个工厂如黑铅炼厂、电灯厂、造币厂的工人。工人夜校和平民夜校的教学内容，不限于识字，而是着重政治教育，对学员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同志还商得易培基的同意，由一师的经费内每学期拨 500 元补助工人夜校，这样就使夜校得以长期维持下去。（三）延聘国内外“名流”来一师讲演。先后聘请了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国内的恽代英、章太炎、章士钊、江亢虎、张继等到一师讲学。其中除恽代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外，其余的人尽管讲的内容不一定符合五四精神、甚至是反动的，但敞开了学术交流的大门，扩大了师生们的眼界。当时一师师生中比较进步的分子是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的。例如章士钊的讲话，就曾遭到过《野火》的抨击。（四）教育改革前，一师不允许学生干与校外的事。教育改革后，一师学生利用在省的各县同乡会，传播进步思潮，并推动他们采取一些改革措施。当时湖南六十个县，大多数在省会都有同乡会的组织。这些同乡会都拥有多少不等的资产，向为士绅们所控制。这时，由一师学生发起，联络其他学校的同学，纷纷把各县同乡会的经济管理权从各县旅省的士绅手里夺到学生手里，利用同乡会拥有的资财，有的拿来创办学校，有的拿来补助贫苦学生，有的用作学生到外地参观的费用，更多的是用来创办同乡会会刊。学生们在会刊上揭露和抨击有些县官与土劣的罪恶，搞得那些县官和土劣们非常窘迫，莫

可奈何。

一师教育改革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这次改革不可避免地影响湖南其他的学校，许多学校追随一师之后，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虽然其深度和广度都远不及一师。由于一师毕业生分散在城乡各小学服务，因而促进了各地小学教育的改革。例如语体文的迅速推广，管理制度的逐步改善，特别是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广泛传播，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一师教育改革的深远影响，还不止此，从一师培育出来的大量革命人材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到这种影响是多么巨大。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前夕和大革命中，有不少的一师学生投入黄埔军校。一师的师生中涌现出不少的共产党员。我记得的，就有李浚泉（即李一我）、邹耀南、袁铸仁（以上是十五班的）、邓仲禹、郭亮、陆沉、欧阳栋、夏曦、谢南岭、陈作为、陈清河、刘寿祺、刘宜民、袁月斋、唐兰芬、向五九、毛达恂、袁裕（袁国平）、袁也烈（袁焰烈）、陈绍秩、袁焕、尹澍涛等，还有在教育改革前的老一辈的师生包括在附小任职的，如徐特立、方维夏、蔡和森、罗学瓚、李维汉、肖三（即肖植蕃）、陈昌、何叔衡、谢觉哉等。在一个时期内出了这么多的人材，在其他学校是少见的。

以上所述，限于一师教育改革前后的情况，其他方面很少涉及。我是一九二一年冬在一师毕业的，一九二二年考入了北大。一师教育改革后，我在一师的时间只有一年半。此后，一师的新文化、新学风和社会活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本文所述，主要是我的亲身经历，对于后来发展的情况，也根据现在长沙的一师同学提供的材料，略有叙述。遗漏和错误一定很多，尚希有关同志和读者赐予补正。

一九四九年三月

教育改革后的一师点滴

李绍邨

程星龄同志写的《五四运动后湖南第一师范的教育改革》一文，对一师那次教育改革的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我的这篇短文，仅就教育改革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间一师的若干情况，作一点补充。

一九二一年七月，毛泽东和何叔衡两同志于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回到一师，毛泽东同志担任附小主事兼师范部第二十二班的国文教师。何叔衡同志担任附小教师。此外，共产党人在一师当教师的，还有李达、李维汉、陈昌、张石樵、樊树芬，在附小当教师的还有谢觉哉。他们联合党外的进步教师，领导学生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继续展开进攻，使一师的新学风与新文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一师校长易培基采取不同政治信仰，只要学有专长的原则，聘请许多知名教师到一师任教。除上述共产党人之外，国民党人有熊梦飞、王凤喈、吴晗华、孙良工，无政府主义者有沈仲九，无党派人士有徐特立（当时徐老尚未参加中国共产党）、周谷城、陈奎生、汪馥泉、徐钰礼、辛树帜、徐履祥、王武。后来，田汉、吴芳吉、刘宏度、曾星笠、赵景琛、赵惠谟、陈润泉、陈鹿苹、魏树桓、黄士衡、杨伯森也到一师担任教学工作。教师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教学问题，可以各抒己见，互相争论。有

些教师向学生作学术报告，学生对老师的报告也可以提意见，可以和老师讨论。一师当年的师资队伍，真是人才济济，盛极一时。就其政治思想状况来说，多数人在当时都是倾向进步的（后来有分化）。一师学生中后来人才辈出，是与他们的教导分不开的。

一师对学生不收学费，也不收膳费，伙食由学校供给，每学期还有书籍费发给学生。一般穷苦而又惜殷向学的学生，都想进一师。进一师，要经过两次考试。一次是县考，由县里依照定额加倍录取，再送到一师参加复试，择优录取。学生入学后，绝大多数都能勤奋学习。有些还根据自己的爱好，参加有关学会。当年一师的学会有：中国文学研究会、英文学会、数理学会、史地学会、博物学会、美术学会、小学教育研究会等。中国文学研究会、史地学会、小学教育研究会分别为长沙的《国民日报》、《大公报》和《湖南通俗日报》提供稿件，编辑副刊，影响甚广。英文学会每周举行英语演说会，并将演说的稿子，择优缮正张贴，以供众览。数理学会和博物学会经常举行学术讨论会，由会员报告学习心得，授课教师参加辅导。美术研究会曾多次举行绘画展览，博得师生员工和校外观众的好评。后来各个学会又组织学会联合会，以加强各个学会之间的联系，协商解决共同有关的问题。有些喜欢文学的学生还演话剧，先后演出过郭沫若的《卓文君》和《湘累》，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里，这些演出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学生通过教师的课堂讲授，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通过各种课外活动，学业成绩一般都提高得较快。一师、一中、明德中学、岳云中学和妙高峰中学曾联合举行演说比赛、英语演说比赛和辩论比赛。三项比赛都是一师的学生取得第一名，这绝不是偶然的。

除了上述的各个学会之外，学生还成立了一个名叫“崇

新学社”的兼有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团体。其领导人是共产党人傅述凡等。参加的学生估计约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它社员的宗旨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问题和研究学问。并通过社员带动学生群众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活动。

为了反对封建礼教，扩大教育效果，一师从一九二一年开始招收女生。这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新生事物。社会上的顽固派群起反对。校长易培基顶住了这股逆流，首先把他的女儿易漱萍送到学校学习。先后招收的女生，约有三四十名。解放以后担任全国民主妇联秘书长的曹孟君，就是一师第二十一班的学生。

为了提高学生的水平，一师还利用优越的师资条件，开了一些新课程。如李达教的经济学，田汉教的中国文学史，刘宏度教的宋词，曾星笠教的文字学，魏先朴教的论理学，赵惠藻教的心理学，黄士衡教的社会学，杨伯森教的人生哲学。又为鼓励学生自学，语文、历史两科曾试行道尔顿制，由教师指定学生的精读书和浏览书，规定学习进度，让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精读书上，写出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送请教师评阅；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进行辅导。这是当年一师的又一新鲜事物。别的学校都没有实行过这种新从美国介绍来的教学制度。

当年一师图书馆搜集的图书和期刊不少，颇能满足师生的需要。图书方面，以线装书最多。教师周谷成最喜欢借线装书，往往一次就借去几十本。俄国文学方面的书也不少，如《甲必丹之女》、《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夜未央》……。鲁迅的《呐喊》和《中国小说史略》也都有。教师汪馥泉曾经把《狂人日记》选作教材。一时《呐喊》被全部借光。期刊方面，如《新潮》、《语丝》、《莽原》、《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世界》、《少年中国》、《学艺》、《孤军》……都放在阅览室由学生自

由取阅。

前面提到，一师学生在五四思潮的影响下，在进步教师的教育启发下，不少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起了开路人的作用。一师学生中先后参加共产党的颇多，无法一一列举，这里只举几个比较突出的人物：

郭亮 长沙县人。在长郡中学毕业后，进一师二部师范（当年一师招收旧制中学毕业的学生进校学习一年师范课程，号称二部师范）。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经常约集设在一师附近的造币厂、黑铅炼厂和玻璃厂等工厂的工人到一师礼堂开会，把马克思的像高挂在礼堂的讲台上，他向工人作报告，领导工人唱《国际歌》，歌声雄壮，全校可闻。他在一师毕业后，全力从事革命活动，曾担任省总工会委员长，成为我国工人运动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不幸于一九二八年被反动军阀何键杀害。

夏曦 益阳县人，一师十六班学生。也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参加共产党的。他擅长演说，富于组织才能，曾是全省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作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一九三四年在红军长征途中牺牲。

肖述凡 宁乡人，一师第三十二班学生，会讲会写，分析问题的能力很强。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培养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是一师“崇新学社”的负责人之一，作过共青团省委书记。他在一师和教师江馥泉办过一个刊物，名叫《野火》，烧过鼎鼎大名的章士钊，因为章在一师讲演时反对做白话文。他说，现在有些人做白话文，说月是月儿，花是花儿，外国人叫乎扶作‘士迪克’，并不说‘士迪克儿’”。这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公然反对一师提倡白话文。过了几天，《野火》“出茅”死了。这一期《野火》出刊后，

全校师生都以先睹为快。第二期《野火》是烧南社湖南分社的领导人傅熊湘。傅是当年长沙有名的国文教师。《野火》烧他的原因，我现在记不清楚。好象也是因为他反对做白话文。肖述凡于一九二七年病故，这是党的一大损失。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师有些学生到广州去进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政治，参加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其中有袁裕和袁焕。袁裕（即袁国平），邵阳人。在黄埔军校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在皖南事变中牺牲。袁焕，武冈人。在黄埔军校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死在牢里。

由于一师经过教育改革，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培养革命人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社会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曾有侨胞林芳声、李金煌、李炳奎、李炳辉、黄怀信不远万里，从南洋回到祖国，请求到一师学习。韩国人博参，因从事革命活动，韩国政府要逮捕他，他逃到中国后，也来到一师学习，编在第二十二班。

全国解放后，毛主席回忆当年一师的情况，思念一师的老朋友和学生，曾对周世钊先生说过：“一师是个好学校。”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湖南五四运动二三事^{*}

陈漱渝

一、新民学会成立会

新民学会是五四运动以前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建立的一个革命团体。它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领导五四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湖南能成为国内革命运动的策源地之一，是与新民学会的活动分不开的。

新民学会究竟成立于何时？参加成立会的有哪些人？成立会的情况如何？以前出版的有关著作中，对上述问题的说法不尽准确。如李锐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说：“1918年4月18日，一个礼拜天，在长沙岳麓山荣湾市蔡和森同志的家，开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这天到会的共有十三人，除毛泽东同志外，有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瓚诸同志。”（第72页）这段文字中，除新民学会的成立地点和出席人数正确外，其他情况都与事实略有出入。

新民学会成员、成立会参加者肖三同志在成立会召开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三月初四日 四月十四号（日）晴

* 本文是作者经过调查访问，并参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写成的。

新民学会今日成立，开成立会在对河荣湾寺侧刘家台子蔡君林彬（按：即蔡和森）寓，到会者：二兄（按：指肖子升）及余，何叔衡、陈赞周、毛润芝、邹彝鼎、张昆弟、蔡林彬、邹蕴真、陈书农、周明绶、叶兆植（以上第一师范），罗璈阶（长裕中学毕业），诸君。未及到者，陈章甫（按：即陈昌），熊煜甫，周世钊、罗学瓚、李和笙、曾以鲁、傅昌钰，（现在日本东京高工），彭道良诸君，以上皆基本会员……。

由此可知，新民学会发起于一九一七年秋，成立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不是四月十八日。陈昌、罗学瓚同志虽然都是新民学会的组织者和重要成员，但并未出席新民学会成立会。

又，周世钊同志在《湘江的怒吼》一文中，说新民学会成立会“开了一天”，通过了会员道德上、生活上的几条戒律：“不嫖，不赌，不娶妾，不贪污等”；“推选了五个评议会干事，毛泽东同志被推为评议会副总干事。”但据肖三同志的日记记载：“关于本会之戒律，所定者为一不虚伪，二不懒惰（此项余所主张加入者），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二兄被举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蔡君家备午饭，自上午十一时到齐，议事至下午五时后始闭会……”由此可见，成立会只开了半天，不是“开了一天”。规定的戒律有五条，周世钊同志只回忆对了两条。成立会上推举了三名干事，不是五名干事。毛泽东同志的职称是“干事”，不是“副总干事”。周世钊同志当时未能亲自参加这次成立会，肖三同志则亲自参加了会议，并于当天留下了日记。所以肖三同志的日记比其他回忆材料更为准确。

五四时期长沙的周刊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席卷着古老的长沙城。为了传播新思潮，更好地团结教育群众，长沙各大中小学进步师生纷纷编辑期刊，特别是编辑周刊，以致当时有的文章，把长沙城形容为“周刊的世界”。

在这些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周刊中，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是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和他一度接编的《新湖南》。此外，还有雅礼学校出版的《救国周报》，周南女校出版的《女界钟》，明德学校出版的《明德周报》，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出版的《岳麓周刊》，岳云中学出版的《岳云周刊》，甲种工业学校出版的《工学周刊》，楚怡学校出版的《体育周刊》，长郡中学出版的《长郡周刊》等。

编辑上述周刊的学校，有的原来就比较开明，如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热心研究和革新教育。在他的提倡鼓励下，该校学生思想比较活跃，出现了向警予同志这样的妇女运动先驱。该校的学生团体除创办平民女学以教育贫苦妇女外，又发行週刊《女界钟》，讨论“妇女解放”“妇女劳动”诸问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的学校原先则比较趋于保守，如以施行俄国式教育著称的长郡中学，校长彭国筠阻挠学生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禁止学生阅读新书报，作文也规定写《烈女赞》《某烈女传书后》等一类陈腐不堪的命题。但是，时代的潮流是不可遏阻的。长郡学生终于冲破了校方的阻挠，创办了平民半日学校以普及教育，同时发行《长郡周刊》，其宗旨是：“一、愿为本世纪的新出版物。二、介绍世界的新思潮。三、批评社会的新事业。四、研究人类的新学术。五、倡导世界的新文明。”（《长郡周刊》第一期，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最令人高兴的是，不但长沙的大中学生积极创办周刊，长沙的小学生也办起了白话周刊。当时，长沙第一高小校长狄昂人，大力提倡用白话文和注音字母教学。他把长沙城分为三个区：北区以明德学校小学部为中心，中区以楚怡学校小学部为中心，南区以长沙第一高等小学为中心，组织小学教师到各中心点研究教学。由于小学开始废除了旧式国文教科书，小学生思想得到了解放，表达能力也迅速提高。长沙第一高小、楚怡小学、长沙师范附小等校的小学生就办了周刊。

为了使周刊能更迅速，更广泛地跟群众见面，各校出版的周刊多由学生亲自递送，售价亦甚低廉，一般每期刊收铜元一到三枚，有的甚至免费赠送。周刊的经费，有的来自学生募捐所得，有的来自学生节省下来的伙食费。各周刊之间还互相协商，规定好轮流出版的日期，以便让读者每天都有报读。为了对这些周刊加强领导，在毛泽东同志的倡议下，湖南学联还专门成立了湖南学生周报联合会。

长沙的这些周刊社，有的不仅编辑刊物，而且还代销全国各地的进步刊物。如楚怡学校和育英学校的周刊社，就设有代售处出售各种新书报。在这里读者可以买到《新青年》《新潮》《星期评论》《时事新报》《晨报》《少年中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新思潮在湖南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与《新湖南》周刊

五四时期，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接编过一种《新湖南》周刊，该刊是继《湘江评论》之后的又一个著名刊物。它的出版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湖南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湖南》周刊原是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出版的一种刊物，龙伯

坚主编，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张维、李振翩等，由长沙湘鄂印书馆印刷，每条约发行一千份，刊名脱胎杨笃生（守仁）的一本书——《新湖南》。该书出版于一九一〇年，线装一册，其中有“在天星阁撞自由钟”的句子，意思是号召湖南人民认清大局的危迫，积极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改造旧湖南，建设新湖南。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应，所以《新湖南》周刊沿用了这一很有群众性和号召力的名称。

《新湖南》周刊出至第六期后，由毛泽东同志接编。因为一九一九年八月上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在付印过程中被军阀张敬尧查封。为了给毛泽东同志继续提供舆论阵地，《新湖南》周刊的原编辑主动邀请他接编。毛泽东同志欣然接受了这一要求。于是，从第七期起，《新湖南》周刊就成为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毛泽东同志在该刊刷新宣言中说：“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第七期上，刊登了《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工读问题》等文章，使读者耳目为之一新。（《长沙社会面面观》，《新青年》七卷一号。）

毛泽东同志接编的《新湖南》周刊共出几期，历来说法不一：该刊原主编龙伯坚说共出九期，即毛泽东同志接编了三期后停刊。周世钊同志说：“张敬尧对于反对他的报刊是不许其存在的。所以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新湖南》还不到四期，就被迫停刊。虽然只是短短的四期，但已替《新湖南》添加了不少的光采……”（《湘江的怒吼》，收入《“五四”运动在湖南》及《光辉的五四》两书）“还不到四期”和“只是短短的四期”，行文似有矛盾。《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在介绍该刊时，说“《新湖南》周刊出版到十期左右，

终于被军阀政府封禁了。”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三日，北京《晨报》刊登一篇署名“H·C”的《长沙特约通信》，说：“《新湖南》系湘雅学生所发行，自第七期后加入校外编辑，已有起色，至十二期发行后又因意见不合停办矣。”这样，关于《新湖南》的总期数就有了九期、十期、十期左右、十二期等几种说法。因解放后一直未找到《新湖南》周刊的原刊，一时对上述各种说法的正误尚难于判断。不过，我以为当时报刊的介绍，恐怕要比几十年后的回忆更接近于历史的本未面貌。

《新湖南》周刊主要在湖南发行，但其影响虽然已波及全国，甚至远及海外。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晨报》刊登的《长沙特约通讯》说：“……‘湘雅医学发行底《新湖南》，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底‘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同年十一月八日《晨报》刊登的《湘省教育底一忧一喜》中，说《新湖南》周刊“很有实在的价值”。它的发行，是湖南教育上的一线曙光。旅欧华人团体创办的《旅欧周刊》也介绍说：“……湘雅学校发行之《新湖南》，为《湘江评论》之化身，内容极为完美。”（《国内新闻·湖南之新思潮》，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旅欧周刊特刊》。）

湖南俄罗斯研究会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湖南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和较重要的地区之一。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即五四运动爆发六星期后，湖南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就组织了一个名为健学会的学术团体。该会宣言：盖自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渐入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不可遏抑……国人当及时研究，导之正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湖南《大公报》）毛泽东同志对健学会的活动曾多方推动和尽力赞助，使之在传播新思潮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的

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健学会成员的思想状况较为复杂，其中虽有徐特立、何叔衡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但也混进了主张“防止过激主义”的不良分子。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该会成立之后并未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情况真正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介绍。

在湖南，较早和较正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情况的团体，是俄罗斯研究会。

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于何时？长期以来，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八月（如《湖南省志》第一卷第410页），一说成立于同年九月（如《“五四”运动在湖南》第62页）。

事实上，俄罗斯研究会的筹备会是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召开的，会场设在长沙县知事公署，与会者二十余人。会上，报告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实情况，介绍了列宁领导下的劳农政府对华新政策，批驳了布尔什维克“均产共妻”等谣言，并推举彭璜、毛泽东、包道平、何叔衡四人为筹备员，规定了该会三项会务：

一、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杂志。

二、遇有机缘及必要时，得派员赴俄国从事实地调查。

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长沙发起俄罗斯研究会》。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上海《民国日报》）。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正式召开成立会。会上推举了总务干事、书记干事、会议干事各一人。毛泽东同志任书记干事，负责记录及文书事务。同时议决，除会员个人进行研究外，每星期六下午可自愿去长沙潮宗街五十六号的会所集体讨论。集中个人和集体的研究成果，发行一种《俄罗斯丛刊》。为

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该会还决定派代表赴京与俄代表接洽，并在船山学社开设俄文班，聘上海之俄人来湘教授。（《湖南之俄罗斯研究会》，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民国日报》）。

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后，该会会员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不少介绍俄国政治、经济方面情况的文章，指出十月革命给俄国带来了“人人享权利，个个尽义务”和“贵则皆贵，富则皆富”的“黄金时代”。毛泽东同志还将《共产党》月刊（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上的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推荐到湖南《大公报》发表。伟大的人民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任弼时同志，也在这一时期经毛泽东同志的慎重介绍，第一批去苏俄留学。

五四时期毛泽东同志的一篇佚文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一卷二期上，有一篇毛泽东同志的早期论文——《学生之工作》。文章前言写道：“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按：一九一八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对于学校的办法，曾草就一计划书，今抄出计划书内‘学生之工作’一章于此，以求同志的教谏。我觉得在岳麓山建设新村，似可成为一问题，倘有同志，对于此问题有详细规划，或有何种实际的进行，实在欢迎希望的很。”

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北京之游”，是在一九一八年九月间，目

的是帮助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一九一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在上海送别第一批留法的友人后回到长沙。他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显然草成于同年四月至十一月之间，而《学生之工作》一文，则是该计划书中的一章。

毛泽东同志当时认为：“兴办学校，不过施行教育之一端，而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而止，其一端则有家庭，一端则有社会。”“创建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毛泽东同志设想：“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毛泽东同志当时设计的新社会中，有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读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在学校中，学生用六分之二的时间睡眠，六分之一的时间游息，六分之二的时间读书，六分之一的时间工作。读书实行自习、教授相结合、自学与听课的时间各占一半。工作内容包括种园、种田、种树、畜牧、种桑、养鸡、养鱼……目的是使教学与生产、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学生把学校当做家庭。在合并各人私有财产的基础上成立工读同志会，会下设生产、消费、储蓄诸部。学生离校，可取走个人应得财产之一部分，而仍留存其余的部分，以便使学生与学校保持长久的联系。

《学生之工作》一文，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同志五四时期宏大的抱负、除旧布新的精神和对新社会的热切憧憬。他关于学生宜加强自学，教学应联系社会实际，联系生产劳动等思想，冲决了旧教育思想的网罗，至今仍闪耀着不灭的思想光辉。但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〇年二月第二次“北京之游”以前，还没有在理论上及在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跟当时其他最先进的知

识分子一样，虽然在政治上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目标，但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杂质。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日本的“新村运动”，美国的“工读主义”，都强烈地吸引着他。他当时的思想中既有十月革命的影响，也有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成份。《学生之工作》一文表现了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探求真理，追求光明的进取精神，也更为具体地反映出他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发展历程。

袁舜英女士事件

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一九二〇年，长沙发生了两件震撼全城的事件：一件是这年六月二十一日清晨，长沙师范学生王纯武与李宗秧到县城隍庙捣毁偶像，被一百多名迷信的市民抓住，扔进火堆活活烧死了；另一件是同年十月十九日，周南女校学生袁舜英因受丈夫欺凌，投水自尽。前者死于神权，后者死于夫权，充分说明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何等顽固，何等凶残！

袁舜英出身于贫寒的农家，幼年失学。根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亲戚的劝合，与李震鹏结婚。李震鹏是基督徒，雅礼学校四年级大学生兼周南女校英文教习，家里开了三升布铺，有一千石租的水田。因为袁舜英文化不高，容貌中姿，而且缠足，李震鹏对她十分歧视，直呼其为dog（狗）。袁读书如领悟较慢，李辄鞭笞之。由于夫妻感情不好，李与袁结婚四年，同居时间仅两三个月。一九二〇年，李震鹏假借表兄妹名义，让袁舜英入周南学校五年级读书，并威胁她说：“你要努力求知识，不然即离婚。”袁舜英入学后，孜孜勤学，和顺稳健，深受同学好评。为了不遭李震鹏的嫌弃，袁舜英先把巴巴头改为辮子，后又把辮子盘在头顶。这年十月，袁舜英因生病，请假回乡探望。返校后，

正值李在教室，且已下课。袁进教室对李说：“下了课，请你等等再走，我有话同你商量。”不料李震鹏认为袁的做法暴露了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特别是这个“乡里大娘样子”的妻子在学生面前丢了他的脸，便勃然大怒，禁止袁今后再跟他直接联系。事后，李还用雅礼大学的三张信笺给袁舜英写了一封信。原文是：

英鉴：敬启者。你以后有事可写信把我。请你告诉朱超女士：凡话可告诉我，就可告诉朱超女士，由朱君再告我。你今日从家里来，你有甚么出色的事，跑到讲堂里来？你晓得一些学生在那里，我如何同你说话。你失了我的面子。你总不知事，你晓得那个是先生，那个是学生。你下次要再如此，就请你下乡，或者我就辞职不教了。我在省里朋友太多，事情也多。你有事可请别人间接就好，直接与我说，我实在不喜欢。你要若干钱，请你写信告我，也不是到讲堂里来有拿的。你有多话说，也可以写信，也不能到讲堂里来的。你进周南，我已说清，能改良就好，不能改良，顶好就回家去。算了。此间近好

你的口弟写 十月十八日

（据原信影印件抄录，文句不通处，未作改动。）

袁舜英读信后，悲愤交加。第二天深夜，她跳进周南女校的池塘，结束她年轻而悲惨的一生。

袁舜英的死耗，在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少数报纸认为袁的做法是“轻生”的表现，太不值得，如当时《大公报》的报道就题为《女生轻生之惨闻》，但大多数报纸却认为袁舜英是被冷酷的旧社会逼死的。它说明婚姻不自由，教育不平等，经济不独立，

给广大妇女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十月三十一日，《长沙》周刊出版了两期袁舜英女士自杀问题专号，刊登了二十余篇诗文，指出除袁舜英外，“其余湖南人为经济制度所逼，婚姻制度所逼，家庭制度所逼，及一切恶的环境所困厄，想死而不得死，将死而犹未死，与已死而不得死者，恐怕还有无量数。”文章号召湖南人民“一切不顾，一切不怕，不单只空谈，而且要准备实力，猛力打冲锋，猛力破除魔障”，“改造湖南的旧社会”，“建设湖南的新社会”，不让死者白白地送了性命。（文隼：《一九二〇年长沙的两件大事》，《长沙》周刊第六期）。

片 断 的 回 忆

王 肇 勋

湖南地当南北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连年北来南去，或南下北逃，所过之处，遭受浩劫，十室九空。张敬尧于一九一七年春入湘，霸占长沙一带，吴佩孚坐镇衡阳，谭延闿、赵恒惕驻守郴州，冯玉祥则观望于常德，各据一方，分割统治。特别是张敬尧自赣调来湘凶军张宗昌部，经浏阳东北入长沙，沿途烧劫奸淫，残民以逞，怨声载道。时人痛恨张敬尧，谓之“张毒”。张敬尧摧残教育事业，我亦因此失学两年半。

一九一九年秋，我考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当时湘雅校址暂借用长沙潮宗街模范监狱署旧址，因陋就简，规模粗具。有次路过督军公署（又一村旧抚台衙门）前的三角空地时，忽闻杀声震天，目睹推出十余人砍头示众，并未张贴罪状。但见人头落地，血流成渠，无辜就戮，凄惨已极。数日后，路过南阳街，又见张敬尧之弟张敬汤出巡，两侧卫队簇拥，鸣枪伤人，商店闭户，俨如大敌临门，行人趋避。

其时抗日呼声，不绝于耳，禁售仇货（张敬尧钳制舆论，检查极严，有时报上不准称仇货、日货，而称“某货”），雷厉风行。省学联不顾张敬尧的恐吓，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举行焚毁日货示威大会。学生纠察队查获获的大宗日货堆满教

育会坪，准备焚毁，我亦随队参加。同仇敌忾，民情愤激。可惜当场被如狼似虎的武装军警驱散了，忍无可忍，徒呼奈何！

张敬尧肆意搜括民财，甘心媚外，据说已将对河银盆岭第一纱厂及水口山铅锌矿相继盗卖与外商，丧心病狂，断送主权。时值五四运动之后，学潮勃兴，此起彼伏，罢课请愿，游行示威，一浪高过一浪，闹得满城风雨。在毛泽东同志的推动下，省学联领导各校学生组织演讲队，走上街头宣传，我亦几次参加，散发传单，揭露“张毒”祸湘罪恶，号召展开驱张运动。湘雅学生会活动分子高尧朗、张维等均曾参加驱张请愿团的活动，在外奔走呼号。

一九二〇年五月，吴佩孚乘驱张之际举兵北撤。六月，在省内外一致声讨的形势下，张敬尧仓皇出走，长沙城厢枪声四起，秩序混乱，沿江道上，伤亡甚多。我和二三同学，挂上红十字袖章，抬担架救护伤亡。我们名曰救死扶伤，实系收拾死亡尸体，供尔后解剖教学实习之用。大家奔走一天，收集尸体数具。此一实际收获，曾博得学校当局的赞许。

事情过去六十年了。当时认识肤浅，唯具一分爱国心情，不愿作帝国主义的奴隶；更恨军阀专横，民不聊生，国无宁日，遂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愿竭绵薄之力。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策动学界驱张运动获得成功，这一初期革命实践，给当日某些人认为“驱张运动是小事”以有力的回击。

一九七九年四月

留法勤工俭学杂忆

郭方瑞

从一九一九年起至一九二〇年年底止，由国内各地放洋西渡，以及由日本转往法国勤工俭学的，共有一千五六百人。其中以四川、湖南两省为最多，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他如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等省，仅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一)

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求学时代，与湖南各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优秀青年学生都有联系，在学生群众中有崇高的信誉。每当他在学生联合会上发出号召，各校学生随即响应。他当时极力鼓励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因此，湖南学生受其影响很大，到法国去的特别踊跃。例如，徐特立先生曾在第一师范、长郡中学、修业中学等校教了十多年书，当时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也决心放弃教学工作，同青年们一道赴法勤工俭学，给知识界以莫大的鼓舞。蔡和森是全家参加勤工俭学的典范。他的母亲葛健豪虽年龄较大，还是老当益壮，不怕困难，远涉重洋，妹妹蔡畅和爱人向警予，也是女中豪杰，相率联袂同行，对湖南女学生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向警予、蔡畅等在长沙提倡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并拟定组织

章程在报上登载，开了女界出国留学的先声，对提倡男女平等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时女界赴法勤工俭学的，以稻田师范、周南女校的学生居多，计有魏璧、舒之悦、危新琼、范新顺、熊作莹、熊作璘等约二十人。

北洋军阀张敬尧督湘，横蛮无理地摧残教育，对进步学生运动极端压迫，凡是在学校内外做过反日爱国斗争的青年学生，都成为他打击镇压的对象。在此情况下，大家不能安心求学，有些人就趁机赴法勤工俭学，以避凶焰。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人数较多，这也是原因之一。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所以湖南赴法勤工俭学人数近五百，仅次于五百多人的四川。如果不是湘省当局的百般阻挠，可能还会超过四川，居全国首位。

(二)

我原名国宾，于一九一八年秋在长沙兑泽中学毕业后，闲居家中，正在考虑升学问题。忽接在北京高师读书的皮龙和在法文专修馆肄业的廖廷钰联名从北京来信，并附寄法华教育会招生简章，劝我先去北京学习法文，然后赴法勤工俭学。接信后，我立即筹措路费，并邀在第一师范肄业的杨峰琳同行，于同年除夕到达北京。

一九一九年，在北京、保定和法华教育会负责人李石曾的家乡河北高阳县布里村开办的法文补习班，通称留法预备班。在这里补习的绝大多数青年学生爱国心切，每天除学习法语外，对国家大事非常关心。特别是四川、湖南两省同学，愤于家乡遭受北洋军阀的摧残蹂躏，爱乡爱国情绪更为高涨。

同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五千多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游行队伍由皇城出发，走向天安门，转东交民巷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时，曹畏罪躲避，将铁门紧闭，学生以砖头石块掷击门窗，火烧曹宅，痛殴章宗祥。这天，学生被捕去三十多人，被打伤数百人。留法预备班学生参加了示威游行，被逮捕和殴伤的达数十人，记得其中湖南人有方敦元、鲁其昌等。

五四以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生，纷纷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掀起了罢课的高潮，时间长达两个多月。留法预备班受了这一影响，也无形停顿了，同学们各自筹措旅费，争取提前放洋。大家认为，与其在国内学习法文一年，倒不如去法国学习三个月。还有各省没有参加预备班的学生，迳往上海请求寰球学生会代办出国手续。从五四以后到一九二〇年年底，不论哪国邮船由上海开往欧洲的，都有人数不等的勤工俭学学生放洋。记得那时长沙某学校国文教员曾在报上登载七绝一首，欢送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诗云：“诸君有志赋同仇，去国原为救国谋。热血一腔忘道远，孤帆冲破海天秋。”

(三)

在留法预备班，湖南沅江县人有李绳彝、李国英、傅章暘、廖廷钰、方敦元、刘乙青、杨峰琳和我共八人。除李绳彝由日本转往法国、廖廷钰自筹旅费先期启程外，其余六人仍留预备班补习。因旅费无着，推我为代表，向沅江县教育局请领津贴。结果各得补助费二百元，才能成行。临行，刘乙青因病未去，皮作琼中途加入，和我们一起，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同舟西渡。

我们乘法国邮船Sphind号，该船载重一万二千吨，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赔偿给法国的。启程前夕，孙中山先生假上海南洋公学举行欢送会，勉励学生从事工业救国，寰球学生会也举行

茶会欢送。这次同船赴法的勤工俭学学生共有百余人，除少数女生如湖南的危新琼、范新顺等乘坐三等舱外，男生则一律坐四等舱，实际是等外舱，与法国水兵同住一个舱内。从上海起航，大致日行四五百海里，沿途经过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科伦坡等地时，当地华侨商会都热情迎送接待，我们感到分外亲切。大家推举四川同学何鲁之和湖南同学汪士楷等负责办理与侨商团体的交际事务，他们办事认真，有条不紊。

船过印度洋时，接到李石曾回国途中发来无线电报，询问船上有无他的儿子同行，并嘱我们到地中海时，应电告巴黎华法教育会，通知船到马赛日期，以便派人前来接待。十月底，我们平安到达马赛，华法教育会派李光汉、李璜、彭襄等前来，引导我们登陆。当天，在马赛借营房住宿，吃黑面包充饥，饮自来水解渴。大家感到生活不习惯，思想上顿起变化，认为法国标榜自由、平等、博爱，完全是骗人的把戏，瞻念前途，不寒而慄。曾记得有同学写感怀诗：“听到胡笳心便惊，天涯沦落眼谁青？”这种情景，虽距今四十多年，犹历历在目。

在马赛稍作勾留，翌晨以团体票乘三等车，经过十余小时，到达巴黎。华法教育会在巴黎西郊，地方不大，我们有一百多人，无法居住，只好借帐篷作临时住所，过野外宿营生活。但比在马赛住营房要好些，晚间可装临时电灯，伙食也可自由处理了。

(四)

我们初到巴黎，恍若武陵人误入桃花源，别有天地。但生活语言多不习惯，必须在附近找学校补习法语，熟悉生活习惯。华法教育会介绍我们男同学到蒙达尼公学（由巴黎乘火车一小时即到），女生则到另一学校补习。因当时法国中等学校男女分校，所

以我们男女同学并未同校学习。初到法国，没有工作，每月学膳费均由华法教育会借贷，俟将来有工资收入时分期归还。

我在蒙达尼公学补习四五个月后，对法国的生活风俗逐渐习惯，法语也可以单独会话，即想到工厂里去作工。于是，商请华法教育会代找工作。

一九二〇年春假过后，华法教育会派人来校，传达该会已在法国南方斐密里钢铁厂找到了几十个工作位置，同学们自量经济困难不能维持下去的，这是一个好机会，愿去的先试用三个月，然后根据工作能力确定工资，待遇从优。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很愿意报名参加。我们经介绍到厂后，检查了身体，按个人志愿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筛砂车间做学徒，同伴有周照林、皮作琼、杨峰琳等三人。在试用期间，每天六个法郎，仅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我在厂里做了三个月后，技术比较熟练了，而工资并未增加，仍是六个法郎一天。多次请求厂方履行前约，厂方答复继续做三个月后再决定。到期再度要求，还是渺无音信。我将上述情况向华法教育会报告，也同样无结果。在此情况下，只好自找门路。正在思想混乱的时候，和我同住的黑人朋友（阿尔及利亚人）介绍我到另一个铁工厂工作，每天劳动八小时，可得十五个法郎。我在这里做了四个多月的工，积蓄了几百法郎，因在高炉下烧火，劳动强度很大，身体难以支持，决定回巴黎去找华法教育会另谋出路。

（五）

一九二一年二月，我离开斐密里回巴黎，同行者有杨峰琳、皮作琼等十余人，在巴黎华法教育会寄住。这时，由法国各地工

厂或学校陆续来到巴黎的勤工俭学学生已有两百多人，大家都以失业失学，生活无法维持，正想向各方乞援求助。有一天，遇着徐特立先生，说：“接到湖南朋友的信，谭延闿已拨款五万元救济湖南学生，交蔡元培带来法国。湖南同学可打听蔡元培的住址，领取此款。”听到这个好消息，大家喜出望外，一方面打听蔡元培的行踪，同时推定林祖烈、谭德和、方敦元和我为临时代表，进行接洽。

我们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打听到蔡元培借考察教育名义来到欧洲，已有两个月了。他行踪无定，有时去日内瓦，有时来巴黎，住在巴黎大酒店。有一天，我们几个人想尽办法才在巴黎大酒店见到他，一见面就询问谭延闿托带的五万元救济款的下落。蔡面有难色地答复说，要问随从的李秘书。后由李秘书接谈，他故意刁难，坚持要找妥人才能交款。经过许多曲折，方允许由徐特立、汤松（湖南商专校长，这时在巴黎考察教育）和我们共同负责，把五万元折成六十万法郎，转存中法实业银行。徐、汤两位同我们到酒店签字取款，转存银行。我们随即召集在巴黎的同学开会，研究分配方案。会上，推举徐特立先生主持，我和谭德和、方敦元、林祖烈等协助分款，原则是：凡在一九一九年元月以后到法国的湖南人，不论在校读书或在工厂里做工，都可分得这笔救济款。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统计人数有四百八十余人，每人可以分得一千三百多法郎。徐特立先生声明自己不分，表现出大公无私的精神。

（六）

湖南学生得到有救济的消息，陆续来巴黎领款的有几百人。其他各省学生，也因工厂里工资太低不能维持生活，或在学校里

与华法教育会声明脱离经济关系，不能继续补习下去，向领事馆借生活费的，约有一两百人。总领事廖世功与公使陈篆，向来仇视勤工俭学生，他们致电北洋军阀政府，捏造事实，诬蔑学生玷辱国体，铤而走险。同时通知巴黎警察机关，请维护领事馆、公使馆的安全，监视这些学生的行动。陈篆等还电请北京政府指令各省政府，制止勤工俭学生赴法。

各地在学校里补习的勤工俭学生以生活无着，要求领事馆借贷五个法郎一天，以三个月为期。登记要求借贷的两百多人，推出代表向公使馆面陈苦衷。而陈篆居心险恶，竟先通知了巴黎警察局，警局派了大批警察隐藏在使馆内。届时，他穿着燕尾服站在使馆侧边一个小坪里的石级上，接见请愿学生，刚说出“诸君思求学，我很赞成”，警察便一拥而出，用木棒乱打一顿。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抵抗，一哄而散。事后派代表与警察论理，才了解到陈篆无中生有，制造谣言，诬蔑同学们要举行游行示威，扰乱社会秩序。请愿得到如此结局，大家对陈篆更加痛恨。

(七)

在学生向公使馆请求救济的同时，据国内报刊报道：北京政府用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选派两百多学生到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有如火上加油。因为一个官费生的费用，可以维持三个俭学生，政府既说经费困难，为什么又选派这样多的学生来法学习？大家对于政府的无理歧视，怒不可遏，留在巴黎的同学开会，决定增派代表，加强斗争。一面理直气壮地向领事馆、公使馆严词质问；一面组织同学两百余人，先到里昂大学预备补习，等到秋季开学时，同场应试，争取凭成绩入学。另外，

推选代表八人留在巴黎，担负与各方面的交涉事务。我记得李富春同志当时是被推举留在巴黎的代表之一。

大家向领事馆、公使馆接洽，请借旅费去里昂，原先预料是不易做到的。谁知事出意外，两馆负责人不仅愿借旅费，并表示同情我们的主张。随即派副领事李俊到车站代为登记去里昂的车票，并发给旅费。仅仅一两天时间，到车站集合等候的就有两百多人，大家兴高采烈，满以为这次可以达到求学目的了，谁知又中了陈箴的调虎离山计。他电请北京政府拨发遣散费，另外致电里昂市警察局，派武装警察到中法大学，把这批学生押到马赛上船，强迫遣送回国。被押送到马赛的同学们急电在巴黎的同学救援。留在巴黎的同学接电后，群情愤慨，往使馆质问陈箴。他反说同学们破坏了社会治安，这是里昂市政府应有的措施，已无挽救余地。留巴黎代表决定用无线电与被遣送回国的同学联系，共商进行办法。同时呼吁国内各报馆和各留学生团体主持正义，予以声援，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和声援。当被遣送回国的同学到达上海时，北京政府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在北京西山成立中法大学分校，收容回国同学。

这时，留下来未回国的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已有一两年时间，语言风俗比较习惯，有能力自谋生活出路，不一定要华法教育会推荐，也不必依赖公使馆的补助救济了。大家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按照个人的经济状况和工作能力，决定去向，自找出路。

（八）

我不久即找到巴黎东郊的一个硬纸盒厂工作，每天有八九个法郎的收入，工资虽不高，也还轻松愉快。在这里工作了半年时间，直到一九二二年春，才离开巴黎，邀同同学赵卓雍等四五人，

以毛遂自荐的方法，找到法国西部厄斐尔大旅社充当服务员。后来找关系进了比利时的一个矿冶学校，再转到鲁文大学。一九二五年夏毕业后，在巴黎郊区一个汽车制造厂工作。翌年春，接到早先回国的林祖烈来电，邀约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我接电后即束装启程回国，到广州后，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

一九六三年二月

（原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留法、比的片断回忆

林 叔 英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有一些青年，涌到法国勤工俭学。我于一九一九年九月随同徐特立先生及何光祚、熊信吾、黄坚等十八人，由上海搭法轮波多斯号前往法国。这次旅行，我们的舱位是在船头甲板上，每人一张靠椅，就算是铺位。上面虽有一块帆布，但挡不住风吹雨打，日晒夜露。经历了整整五十天的旅程（因船上起火在西贡停留十五天）。我们因受徐老的鼓励，并为他的那种吃苦耐劳精神所感动，大家都不以为苦。我到法国后，补习了几个月法文，即到工厂做工约三年，一九二三年转到比国进沙城大学读书。下面是我的亲身经历，记忆犹新，特写出以作参考。

（一）反对金佛郎借款

一九二一年春，北洋军阀政府派内务总长朱启钤以特使名义到法国，企图向法国借一万万金佛郎，购买军火，扩大内战。事先，由驻法公使陈箴，向法国有关方面作了初步接洽。这个消息被法方当事人透露出来，风声渐渐传遍中外人士。旅居巴黎的华侨团体，以学生会为首，发动召集各界紧急会议。一面通知在巴黎附近工厂、学校的工人、学生，即日在哲人厅开群众大会，一致起来反对这笔丧权辱国、祸国殃民的借款；同时要朱、陈到会说明真象。这天，到会的有五六百人。会场布置也很周密，电话派有专人看管，出进两门都有人把守，只许进，不许出。记得同

我一起守门的一位，是豆腐公司的工人，他还身带手枪。因为以前有过几次学生运动，都被陈箴勾结法帝国主义加以破坏，并受到极端的凌辱，此次的严密布置，是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届时朱、陈均避不到会，只派一个使馆秘书王某代表出席。主席谢东发当场宣布这一卖国借款，是为了军阀继续内战，并从中取利以饱私囊，而不惜以海关邮政作为担保，其利息之高，条件之苛刻，莫此为甚；如借款成为事实，则经济损失，主权沦丧，后患不堪设想，中国人民誓死反对到底。主席说到这里，群众叫打之声四起，有的喊“打倒军阀！”有的喊“揍死卖国贼！”全场轰动，愤怒之情不可遏止。大家要王某上台报告真象，他讲话圆滑，吞吞吐吐，支吾其词，更使群众愤恨。勤工俭学学生四川吴学海、湖南陈煜等数人拥上台去，将他拖下来；另一个人将椅子甩去，把王某的右额打了一个窟窿，顿时血流满面。幸大会主席及时劝止，才免于一顿毒打。王某用许多条小白布手巾包扎伤口后，继续报告。他的态度也比较老实了，招认借款一事，与外边所传说的相同，不过尚在洽谈中。他保证以后使馆不与闻其事，并随时反映情况，否则听凭大众处理。大会马上通过旅法华侨告法国人士及国内同胞书。后来听说朱启铃闻风逃出了法国。陈箴则更加仇恨爱国学生，尤其是这一运动的推动者陈毅和谢东发（巴黎大学法律系学生）。谢的母亲是法国人，这次借款的消息，就是他从法方当事人得到而传出来的。

（二）陈箴驱逐留法勤工俭学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很多青年想到外国学点科学技术，在勤工俭学运动浪潮推动下，一九一九年，国内有成千的勤工俭学生涌到法国。法政府于一九二〇年与中国代表李石曾、吴稚晖

等协议：将庚子赔款拨出一小部分，在里昂办一所中法大学，招收部分留法学生。我们想将来学校开办，在法的勤工俭学生，首先入校当无问题。哪知由国内达官贵人选派了二百多人来法入学，勤工俭学生竟无一人可以染指。经调查后，才知道李、吴等觉得勤工俭学生不合他们的口味，难以利用，不愿收容。而当时的驻法公使陈篆，对勤工俭学生本已怀有仇恨。这一变动，他主张最力。我们派代表质问陈篆，要他说明原因，他约定某日在使馆花园内向群众答复。届时，我们一百多人到花园内等候，陈来到花园就站在石凳上，仅说出“各位同学”几个字，就把手一招，大队法警从四面拥入，将陈保护出园后，逢人便打，我当时就挨了两棒一脚。我们没有准备，也万料不到自己的公使会这样下毒手，收买外国人毒打本国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就是这个丧心病狂的陈篆，变本加厉，几天后又勾结法帝国主义出动宪警几百人，在里昂包围学生的聚居处，一夜之间，逮捕了二百多人，押解上火车到马赛，再押解上船，遣送回国。如蔡和森、罗学瓚、李肇禧等，都是在这一次被押解回国的。

（三）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运动

鸦片战争后，我国和各国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连比利时这个小国也不例外，它在中国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享有许多特权。中比不平等条约将于一九二五年期满，比国政府为了继续维护它在华的特权，想把有效期延长。一九二四年春，由比国的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交涉；同时，由其外交大臣召见中国驻比国公使王景岐，进行磋商和威胁利诱。这一消息为留比学生获悉，立即通知在比同学开会反对。几天后，我们邀集了六十七人包围公使馆，并把使馆传达（比利时人）加以监视，前后

门电话均派人把守，要质问王景岐。王拒不接见，仅派一学习员出来答话，说王公使有病，有话可由他传达。我们见王景岐不出来，异常愤怒。我实在忍耐不住了，跑上去给了他一个耳光，他就抱头而去。王景岐见情形不对，不出来不行，才勉强出来站在一张会议桌上，说外面谣传的都是事实。他看到学生们怒不可遏，也装腔作势地说：“各位同学，今天你们这样爱国的行动很使我感动，景岐也是中国国民的一分子，绝不愿媚外求荣，丧权辱国。”最后，我们警告他，如果胆敢与比国订立不平等条约，或签字延长原约，将受到学生们的惩罚；要他随时与我们联系，反映比方动态。他满口答应了。同年冬，条约期满日近，比国压力更大。留比学生怕力量太小，马上联系旅欧各团体，扩大组织，统一行动。为此，在比京还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联络之用。当时，留法学生会派来的代表是陕西李文伯，留德学生派来的是贵州张太岭。我们举行游行示威，有一百多人参加。推派吴抢一、李文伯二人为代表，并携带中国留学生反对中比条约继续延长的声明，往见比外交大臣Vandaele，又印发了告中国同胞书。当我们游行时，街上观看的人很多，交通为之阻塞，汽车、电车也受阻停驶。忽然赶来大批警察，将我们的队伍冲散了，并捕去十几人，其中有广东林圣端、杨一香，四川邓矩芳，湖南余平、杨自福，江苏黄聚等人。比国警察局以学生阻碍交通、破坏秩序的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诉。我们延请了比京著名律师做辩护人。当开庭时，辩护人说：在德国统治时期，比国青年为了争取独立自由，也常在街上游行示威，付出了很多代价，才有今日的比利时；今天这些中国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寄以同情。阻碍交通、破坏秩序的罪名，念为初犯，请予以从宽处理。结果法官宣判警告处分，无罪开释。这一次行动，终于制止了中比不平等

条约的继续签订。

日前，湖南大学讲师姜治方来我家谈及，他在一九三七年以前任驻比公使馆秘书时，曾在档案内看到关于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的文件，中有王景岐与北京外交部往来电报及当时学生油印的告同胞书。北京政府要王在原约基础上加以修改，继续签约，王则主张废约，并因此被调职。

(四) 在比领护照的一幕

我在比国时，常常在街上遇见卖青田石的浙江青田人，和卖纸花的湖北天门女人，因为他们的护照已经过期，常被警局拘押处罚或驱逐。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换新的护照？他们说：领护照时，经办人要法郎，少则三、五百，多则上千，我们无钱付出这笔大款子，只好碰运气混日子，实在要抓，也没办法。

一九二三年暑假，同学周敦宪因事去法，我同他去领馆换取护照，经办人罗怀说要交二百五十法郎印花及工本费。我很惊奇地问他：“从前只收五十法郎，现在为何要这样多，是不是工本涨价了？”他说：“没有。”我又问：“是不是加手续费？”他又说：“没有。”我们请他说出加费的理由，他面红耳赤地无以可答。因为他起初听了周的宁波土话，以为周是青田人，可以随便敲竹杠。我们逼着他讲理由，他说不出，就恼羞成怒地将桌子一拍，说：“要办就是这样！”说罢，起身就走。周将他拦住，他抓住周要打。我们也不客气，接了他一顿。后来出来一位秘书，向我们道歉，才饶了他。这些人平日任意敲诈勒索，于此可见一斑。

(五) 回国时的受骗

由法国马赛塔轮启程回国，坐起码的四等舱，船票也要一千

多法郎，我们勤工俭学生，要筹措这笔路费，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巴黎听说，国民党支部能介绍在船上做临时工，只要付四百法郎伙食费，可免船票。一九二七年八月，我与湖南人方正、林曙秋，四川人耿道弘，陕西人李文伯，江西人吴诚等，来到马赛，会见了支部负责人广东陈某，他马上答应帮忙，并要每人先付四百法郎伙食费。过几天，他带我们到波多斯号船上，会见了中国工头张某，船上勤杂人员，除少数安南人，其余都是广东和福建的，约二百人左右，都归张某指挥。开船的前一天，他把我分配在头、二等舱餐厅当侍者，要我穿黑上衣白衬衫，打黑横领结，手挽白餐巾，替头、二等舱客人端菜倒茶，并嘱咐要特别注意礼貌，恭恭敬敬，小心谨慎。晚上见习一次，明早开船就上班工作。我想，这种工作简直就是奴隶，并且还要做出一副奴才相，去讨好有钱的人，我就不愿干。我向工头张某说：“请换其他工作，洗碗擦地板都可以。”他说：“派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不能由你不干。”我说：“我付了你伙食钱，又没拿你的工资，怎么非干不可？”他恶狠狠地说：“你们的工资，老早一次付给你们介绍了，你不干就把你揍死，把尸体丢到地中海去。”这时，我才知道我们做了猪仔，被马赛国民党支部陈某骗了。次晨，工头非要我上班不可，其势汹汹。我看情形严重，于船开动时，急搭临时吊梯跳到趸船上，到支部找到陈某，痛骂他的不法行为，并要发他的通告。他害怕起来，同我讲好话，并答应下班船一定好好替我安排，旅馆伙食费由他负责。十五天后，我就乘船回到了上海。在船上，我说我没有出，工作也由我自由选择了。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原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驱逐张敬尧运动

肖仲祁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把持政权，想用武力统一西南，初任傅良佐、周肇祥为湖南督军和省长，湘西人士反对。王汝贤、范国璋是北洋直系部队，早驻湖南，皆反对皖系，通电主张停战。傅、周仓皇出走。驻在衡山一带的湘军乘势急进，夺回岳州，王、范被迫出省。段祺瑞得日本借款三亿多日币，出卖特权多种（如铁路建筑管理权、矿山森林开采权、电信金融税捐的控制权，以及由日本军官训练军队的特权等等），以三十万元悬赏攻取岳州，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张敬尧以其弟张敬汤一旅扩充为一师，驻防省城；以其义子张继忠率部驻防新化一带，均无恶不作。

张敬尧贪虐成性。他开办裕湘银行，定资本一千万元，勒令商人凑集股本，为他个人敛财机构，一时称为“祸湘”银行。又以收回市面上的滥票为名，设惠民局发行彩票二百万元。又以清理湖田换给契照，并发行银元、铜元票币。由于他采取上述种种办法大肆搜刮财货，以致币值逐渐低落，工商业萎缩停歇，人民生活日益困苦，罢工罢市络绎不绝。他还肆意摧残教育，纵容军队强占学校房屋，影响青年失学的多。因清理湖田，业主怨恨，堤垸失修，加以连年水灾，秋收歉薄，难民聚集省城，不计其数。其时赈灾会拨出银元放赈，他以三元纸币折合银元一元（市上纸币每元只值两角零），发给受赈灾户，灾民求生不得，饿殍塞路，

百姓悉之，于惠民局彩票台上悬联云：“惠而不知为政，民欲与之偕亡”。

吴佩孚属直系，其军队攻取岳州，得三十万元赏金，一直进兵衡阳。他不满意张敬尧所为，不愿为他捧场。吴部称第三师，下辖三旅，第一旅旅长王承斌，驻城内彭公祠；第二旅旅长肖耀南，驻江南会馆；第三旅旅长阎相文，驻城外。其时谭延闿在永州，程潜任郴州。岳州人葛豪、郭醉秋在吴师部办事，与永州方面相识之人甚多，说合吴派员到永州见谭，表示停兵不进之意。所派的人为白坚武。驻两日。谭延闿嘱我回访，随同白到衡阳，时为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吴嗜酒谈诗，意颇殷勤。有葛、郭两人在内周旋，余遂商请以永州新印湖南银行票币在衡阳行使，将市上旧币兑换，得吴许可。余租佃马嘶巷朱粥侯房屋为湖南银行新币发行处，任张清廷经理其事，余亦寄住其中。张系邵阳人，名毅，经理票币得法，又有吴师维持，信用渐著，商民称便。湘军驻在郴桂，常来者如赵恒惕、刘钊各部，均得以新币活动。不久张子武、岳森、谭道源都由永到衡接洽，吴均表欢迎。彼等亦多聚集于新币发行处。我们来衡的目的，在驱逐张敬尧。衡阳士绅如谢鹤晋、廖隽三、夏时济各家，皆与我同心。吴本人固反对皖系，故到衡即主停战，曾有诗云：“元首余威加海内，偏师直捣下衡阳。寄汝征南诸将士，此行关系国存亡。”酒间示余。余即和之云：“国家幸福荫衡湘，时雨行师过岳阳。和气南薰呈瑞气，弥天乖戾定消亡”。吴闻之一笑，强我干几杯。

次年八月，吴佩孚致电冯国璋，略谓：因约法问题，引起内战，分崩之势，即在目前。况年来外交紧急，国债繁兴，险象环生，皆因内争所致。恳请大总统根据约法，颁布通国罢战之明令，使南北双方军队皆有余力一致对外。尤望我经略使（曹錕）与长江

三督及各省军民长官，俯念生灵涂炭，群力赞助，协谋宁息，大局幸甚。此电系针对段祺瑞借债主战而发。以见电大为愤怒，严电中斥之。吴再发着、俭两电，对段极力攻击，段惶然不安，只得通过国务会议颁布命令，使前敌各军暂歇守势。吴的电稿系由葛、郭与内幕商拟，经张子武等详定。吴本是蓬莱县秀才，颇喜弄文，参加典故文句，自吧得意，遂使段祺瑞气沮。我们多次向吴谈及张敬尧的罪行，吴云：湘政仍应由湘人主治。其时上海各团体协谋逐张，毛泽东同志嘱何叔衡率学生多人到衡，向吴请愿。吴表示不必过急。我与何叔衡商谈，谓能使吴师撤防北旋最好。吴的三个旅长各有意见。第一旅旅长王承斌是第三师的重心，他为人狡黠，我常到彭公祠向他接洽，总是摸不到他的头脑。第二旅旅长肖耀南对我较亲切，在鸦片烟盘边谈无妨回，他总说有最后办法。我客衡阳两年多，和他们的军官往来应酬，热而挨冷面，颇感苦闷。在衡日久，郴永往来经过者逐日有之，或过马嘶巷相商，所以马嘶巷一时很为人所注目。段祺瑞遣吴佩孚反他，皖系党人设计倾吴，派陆詠霓持密函赴郴州，欲结合程潜倒吴，程潜实不知情。陆在途中栖风渡为桂系马济部下检查发觉，将他扣押（次年病逝于栖风渡）。湘军常来郴者却以此疑及程潜，程因而离开郴州。在郴人士以吴佩孚主湘人治湘，属意谭延闿，谓是“马嘶口”作阴谋。岳森、吕慈筹等本常到衡，寄迹马嘶巷，遂加以“团”的名称。余一笑置之。惟以驱张事难速成，吴师撤防有碍，耿耿于怀，寝食难安。有沈竹安者，湘乡人，因此事沉闷致病，由衡潜回湘乡自缢。葛豪、郭醉秋亦同此情绪（葛豪，江南浦师学堂学生，其兄葛应龙任柏文蔚部旅长，曾以三千元接济革命同志。豪字耀庭，任事慷慨，吴信任之，未展其才，抗日时病逝于华容注滋口。郭醉秋名观时，岳阳贡生，文行俱优，在吴部时，

劳瘁过甚，撤防后病逝省城)。两人实驱张运动中得力之人也。

直皖两系分裂益显，不免一散。吴想撤防北归，苦于经费支绌。谭延闿与陆荣廷商好，由桂省接济六十万元，一九二〇年派余道南往桂领取，在衡阳交妥。五月二十七日，吴即开始北撤，沿湘江顺流直下，过长沙径去武汉。北军李奎元、范国璋、张宗昌各部队皆按兵不动，或准备逃跑。吴军退一步，湘军即进一步。张敬尧的心腹大将吴新田在岳州不战而退。田树勋则为湘军击毙。张于六月七日勒令长沙商会缴银洋十一万元，将所住镇湘楼和军火库一炬焚毁。他在爆炸声中乘轮北走岳州，令手下残兵在岳州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以泄私忿。其第七师经过安化蓝田时，竟将该镇一千八百多家商店、二千多家民房一火烧光。其残暴可以概见。是年冬，直皖两系战于北京，皖系失败。吴师之踊跃撤防，于大局不无影响。兹仅记驱张之概略如上。惜我年衰，琐事多忘，未能详也。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原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史研究单位供稿)

湖南学界驱张运动前后

唐 耀 章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我担任长沙明德中学学生会会长和湖南学生联合会委员、会长等职，对湖南学界由响应“五四”到驱逐张敬尧运动身经目睹。兹就记忆所及，概述如后。

“五四”运动在湖南学界掀起的波澜

“五四”以前，湖南各中等学校都只有学生自治会的组织，它的职责无非是所谓敦品劝学、组织体育活动、联络同学感情等等，是完全脱离政治的，各校之间也没有联合的机构。但自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一九一五年日本诱迫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尔后又扶植段祺瑞政府，肆意侵占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狰狞面目日益暴露，于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救亡思想，逐渐形成青年思想的主流。一九一九年四月底，北京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名发出通知，号召全国青年和爱国人民提高觉悟，纪念“五七”国耻，一致奋起对外，以救危亡。这个通知促进了湖南学生的爱国觉醒和联合行动的强烈愿望。五月四日，北京五千多学生和市民群众的爱国示威运动爆发，揭开了伟大的革命新时代的序幕，十九日北京各校学生宣告总罢课，全国各省市青年无不热烈支持和响应。

毛泽东同志策划并领导了湖南广大青年的爱国政治运动。记得五月下旬的一天，身穿旧灰布长衫的毛泽东同志来到了明德中学，和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如柳厚民、左景奎、陈伟器、毕磊等，就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行动的问题进行谈话，我也是参加的一个。毛泽东同志称赞明德是具有革命历史的学校，黄兴曾在明德任教，也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在湖南的策源地。接着指示我们要明确认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迅速掀起罢课的斗争，一师和商专都已作好罢课的准备，明德更应带头行动，并发动组织湖南学联，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毛泽东同志充分估计到张敬尧对学生运动可能实行镇压，鼓励我们不畏强权，敢做打倒军阀的先锋。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当天课后就召集学生自治会各班代表开会，由我传达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并决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及派代表分赴还没有行动起来的全市各中等学校，策动举行总罢课。自此明德学生迈开了政治斗争的第一步。

总罢课的号角一响，校内的顽固势力就群起而攻之。中学部主事谢真（号祖尧，新化人，何键主湘时曾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兼第一师范校长）和训育主任张鹤仙，立即召集学生自治会各班代表到办公室训话，重弹救国不忘读书的老调，对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则加上“煽动学潮”的罪名，并盛气凌人地责成班代表将学校意旨转告各班学生，如有越轨行动，学校绝对不能容许。学生中也有一个思想反动的组织，名曰“同求会”，以李维湘、何涇渭为首，他们站在学校当局一边，反对罢课；李维湘甚至在同学中宣扬罢课是无代价的牺牲学业，是误人误己的绝大错误，说得痛哭流涕。在这种紧张的斗争形势下，我们加强了提前罢课的准备，于五月三十一日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进行动员。我被推为大会主席，在会上大声疾呼明德同学继承辛亥革命的传统，立即

勇敢行动，争做支援沪同学爱国行动的先锋，不打倒北京卖国政府，誓不铲除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誓不复课。义愤填膺的同学们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左景奎上台发言，他强调亡国惨祸，已迫眉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实行罢课一刻也不容再缓。杀猪，猪还会叫，难道我们同学甘愿做亡国奴，做临杀还不叫的猪吗？这几句话更鼓动了同学们激昂的情绪，当场一致举手通过，就从这一天起实行罢课，并改组学生自治会为明德学生会，推举我为会长。我们面对学校当局的威逼，毫不畏惧，并且正告谢祖尧、张鹤仙以及李维湘等人，如胆敢破坏罢课的爱国行动，便是全体同学的公敌。

会后，何顾曼、张耀奎、陈伟器及毕磊等代表明德学生会，分赴尚未发动罢课的中学如长郡、岳云、雅礼等校联络。六月三日，也就是北京卖国政府的高压政策使学生运动在全国沸腾起来的日子，长沙市中等以上学校，高举响应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大旗，开始了第一次总罢课。在这一天，各校推举代表，组织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内，商专同学彭璜（号殷柏）被选为会长。在学联组织、领导下，湖南学生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湖南学联成立以后种种

动员群众进行爱国演讲 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后，在学联组织、引导下，仿照北京学生的办法，组成“十人演讲团”，上街挨户作爱国宣传，并在各热闹街头和各大庙宇，作化装演讲。宣传题材广泛，鸦片战争及朝鲜亡国痛史均被列为重点。各校学生纷纷入“十人团”，炎天暑热，奔走呼号。不少家长也热心赞助，借服装，送暑药。听众反映也极其强烈。记得有一次我带领明德

两个“十人团”在北门玉皇殿裡演唱我编写的宣传朝鲜亡国惨痛的快板，当唱到“道为人莫当亡国奴，朝鲜榜样在前头。卡户人家共戮刀，要杀就杀烧就烧，挨打还要笑嘻嘻，不然抽筋又剥皮，堕落地狱十八层，亡国痛苦说不尽。我把警钟来敲响，大家齐心想一想。把人做牛又做马，你看可怕不可怕？同胞觉悟趁这时，祸到临头悔已迟。打倒日本救中国，一齐争作自由人”的时候，听众中喊出了“我们不当亡国奴”，“我们要打倒日本鬼子”等口号。演唱完毕，群众热情地围拢来，称赞我们唱得好，要我们多演唱几回，使人人都知道亡国的痛苦。附近的群众则争着要我们去他们家里喝茶洗脸。在任何讲演场所，都出现了这样热烈的情况，足见我们的宣传活动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不久由学界“十人讲演团”发展到各界“救国十人团”，并于十月下旬，组成“救国十人团联合会”，雅礼同学柳宜得任副总干事，成为爱国运动的支柱。

掀起抵制日货的高潮 湖南省教育会及长沙市商会等公法团体原有国货维持会的组织，但徒具虚名，甚至为奸商作掩护。学联以抵制日货为中心任务，参加国货维持会，设立日货检查股，派出调查员，分驻各行业公会及各大商号，实行没收偷运及暗售的日货，发挥了国货维持会的作用，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七月七日，学联和国货维持会举行焚烧日货的游行示威，我参加了这一活动。队伍从绸布公所出发，沿途高呼口号：“中国人要用中国货！”“不买日本货，不做亡国奴！”“废除卖国的二十一条！”到了教育会坪，将没收的日货堆积起来，浇上煤油，纵火焚烧，一时红光冲天，围观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正在这群情激昂的时

反动督军张敬尧因闹学潮，他竟传唤各校学生代表和一部分教员到省教育会训话“训话”，我也在参加之列。当时正是伏天，

张身着军装，背后站着几个卫兵轮流打扇。他恶狠狠地说：“学生只准读书，教员只准教课，如果不听本帅的话，还要闹事，本帅就要办人，决不容情！”这一番反动叫器，彻底暴露了北洋军阀的国贼面目，也使我们认清了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和艰巨性。

欢呼《湘江评论》的创刊 七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同志负责主编、以学联名义发行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了，这是湖南思想界升起的一面贯彻着“五四”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的鲜艳红旗，开辟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新纪元。《湘江评论》完全用白话，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示出崭新的战斗姿态。广大群众热烈欢呼《湘江评论》的创刊，各校青年争先购读，奔走相告。记得我当时从落星田学联领取五十份《湘江评论》到街头叫卖，刚走到东长街就抢购一空。在《湘江评论》创刊前后，传播新思潮的小型白话刊物纷纷出现，《明德旬刊》也紧接着出版，由我与何硕曼主编。我在旬刊第一期写了一篇《欢呼〈湘江评论〉出刊》的文章，开头有这样一段，“《湘江评论》出刊了，太阳升起来了，照亮了我们的眼睛；警钟响起来了，震动了我们的耳鼓；启声发聩，指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要向强权作斗争，我们要摔掉吃人的礼教的枷锁。奴隶般的教育，我们不要了。湖南的青年们站起来了，在《湘江评论》的启发下，做推动新文化、新思潮的先锋，一齐奔向反帝反封建的前线。”这番话应说是当时广大青年共同的心声。其他各校先后出版的刊物有十余种，以湘雅医专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为最特出，蔚成新风。《湘江评论》的发行部设在商专的三楼，由李凤池负责。各地读者争相订阅，每期份数在五千份以上。出到第五期，触怒了张敬尧，认为是宣传“过激主义”，大逆不道，并趁机大打出手，派武装军警到商专查封，同时封闭了湖南学联。各校学生会发行的周刊曾成立一个独立的联合会，各派代表一名

参加，我是《明德旬刊》的代表；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每周开会一次，安排内容，力求步调一致，以增加宣传的力量。不久，这些生气勃勃的周刊也陆续被张敬尧所扼杀。可是，这个凶恶的军阀统治者也就引火自焚了。

驱张运动的酝酿与爆发

：酝酿驱张的布置 张敬尧统治湖南，无恶不作，尤其是他的北军残民以逞，使湖南人民恨之入骨。张敬尧疯狂镇压湖南学生的爱国运动，更激怒了青年学生和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大家一致认为“张恶不除，湖南无望”。一九一九年九月，湖南学联开始了驱张的秘密活动。九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在商专召集学联干部谈话，就驱张的意义和行动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北洋军阀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当场决定了如下布置：一、尽可能策动教职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的驱张运动；二、指派学联会长彭璜及商专代表李凤池等人去上海，作反张的宣传，并联络省外的驱张力量（如旅沪同乡组织的“湖南善后协会”等），共同行动；三、积极恢复学联，作好由爱国运动转入驱张运动的准备。十一月中旬，学联重新组成，推选公立政法学校同学徐庆曾继任会长，恢复公开活动。在再组学联的宣言中有这样一些话：“政府麻木，措施乖方，刮削民财，草菅民命，牺牲民意，蹂躏民权，长此以往，后患何堪设想……”这一宣言显然是驱张的先声。

发动驱张的措施 为了对抗张敬尧的压力，学联坚持反日爱国运动，继续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照旧没收奸商的大批日货。十一月下旬，学联召开代表会议，决定于十二月二日联合各界在湖南省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并由各校代表转知各校参

加大会的同学，如开会时军警武装干涉，则严守秩序，坚强抵抗，不怕牺牲。二日上午九时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在教育会坪开幕，准备焚毁的日货堆积坪中，正当大会主席徐庆誉在台上向群众宣传抗日爱国的重要意义时，突然一阵马蹄和步伐声逼近会场，原来是所谓“张四帅”（张敬汤）骑着高头大马，率着一营枪兵和大刀队，杀气腾腾地闯来。当时我在演讲台上当记录，只见“四帅”命令枪兵把守会场四周，自己带着十多个背盒子炮的卫兵，冲入会场中心，怒气冲冲地大骂：“你们在这里胡闹什么，你们不象学生，是一群男女土匪，咱奉‘大帅’（指张敬尧）面谕，不准土匪聚众闹事；如果胆敢违抗，即依军法严办”。张敬汤一面指挥卫队，驱散台下的群众，搬走准备焚毁的日货，一面命令几个手持大刀的士兵将站在台上的学联代表驱赶下来；徐庆誉还挨了两个耳光。在这种暴力的威逼下，同学们强压住心头的怒火，排着整齐的队伍，昂首挺胸地步出会场，立即采取驱张的战斗行动。当晚，学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全体学生再次总罢课。从十二月六日起，首先由一师、商专、明德及周南等校发动，不到一星期，长沙市中等以上学校就再次全体一致罢课了。学联为此发表了有名的驱张宣言，提出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誓词。与此同时，又采取了更有力的战斗措施，组成“驱张代表团”和“驻省驱张团”。驱张代表团由每校选派代表二人至三人参加，也容纳一部分教职员。学生代表中，我还能记忆的，有商专的彭璜、易礼容、李凤池；湘雅的张维、高竟朗、李振翩；长郡的彭光球、汪剑余、吴长生；长师的伍钟山、陈健鼎、高标；公立法政的徐庆誉、邱维震；雅礼的柳直荀、陈纯粹；女蚕的李思安、徐英；一师仅记得有夏曦；周南仅记得有陶斯咏；明德则由我和柳厚民、左景銓为代表；其他各校代表的姓名已记不清了。

驱张代表团的任务是，利用驻在衡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驻在常德冯玉祥同属于皖系的张敬尧之间的尖锐矛盾，向吴、冯请愿驱张，对张施加军事压力；又分派代表赴京、沪、穗等地，联络驱张力量，扩大驱张声势。为了筹措代表的旅费，我向学联建议，将各校寄宿同学的膳费全部截旷，作为补充代表的旅费之用。这个建议得到各校同学的赞同。赴省外请愿驱张的代表，就都于一九二〇年一月间，顺利地由长沙陆续出发了。驻省驱张团由各校留校同学组成，推举湘雅医专的张维任团长，我任副团长。驻省驱张团的任务是与外埠代表互通声气，并组合留校学生及省内各界人士继续进行驱张活动。

三层楼上的驱张活动 驻省驱张团的团部设在周南女校三楼的一间小房子里。后来张维赴沪，团务由我主持。我们主要的工作首先是收集、转达各地驱张请愿的情报。当时通讯联络总站设在南门外白沙岭易培基家。易是一师的国文教师。我每周约集几个代表到易家汇报一次，由易将秘密通讯所得到的各地驱张情况转告我们，摘要抄记后编成《驱张通讯》，油印分发各校同学，并向新闻界发布。那时，易培基对青年的态度颇为热情、诚恳，经常娓娓不倦地谈上一两个钟头，他对学生驱张运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我们还汇编了《张敬尧祸湘罪状》，我自己也编写了《张毒祸湘快板》，都用油印誊写，并在每一份末尾，加印一行“阅后请互相传递”的字样，以广宣传。这些驱张宣传品，用报纸一份份裹好，由我和吴长生等人向各商店散发。经过这段时间的战斗努力，终于扩大了省内外驱张运动的声势。

驱张运动胜利以后

一九二〇年六月中旬，谭延闿和赵恒惕率领湘军，由衡阳紧

随吴佩孚以后，进逼长沙，张部望风披靡，张敬尧仓皇逃走，到六月下旬，张部完全撤出湖南境内。

湖南学生的驱张运动能够取得胜利，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驱张的胜利，更鼓舞和推动了湖南学生运动的前进。这时，学联已迁到省教育会内，各校发行的刊物，如《明德周刊》、《岳云周刊》等，又都相继出版。在这一阶段，我担任了一个短时期的学联会长，继续发行《学联周刊》，并代表学联参加了湖南报界协会。学联的活动，则仍以校刊日货为中心。这时我兼任张效敏主办的《民治日报》副刊编辑，副刊辟有“青年之页”的专栏，报道有关本省、市及各地学生活动的情况。一九二〇年九月，我去汉口明德大学工作，离开了长沙。在《民治日报》副刊上，我曾发表过一篇《湖南学生从五四运动到驱张》的纪略，回顾了湖南学生运动的这一段具有重大意义的大革命战斗生活。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

驱张运动在衡阳

丑伦杰

张敬尧在湖南作恶多端，湖南人民恨之入骨，特别是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摧残学生爱国运动，更激起学界的公愤。当时，湖南学生受五四运动思潮的激荡，一般都改变了读死书不问政治的倾向。许多人走出学校，站在民众运动的前列，对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军阀官僚进行斗争。一九一九年冬，湖南学生界为了抵制日货和日商戴生昌轮船公司的经济侵略而开展宣传、检查的群众运动，遇到张敬尧的压制和镇压，因而激起公愤，爆发了湖南学生驱张运动。学生代表组成“驱张请愿团”，分三路进行活动：一路去北京，一路去上海，一路去衡阳。我参加了去衡阳的代表团。

去衡阳的代表团和其他两个代表团一样，是在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下，由各中等以上学校推派代表组成的。其中有部分教职员参加，如易培基、何叔衡、蔡人龙、蒋育寰等。学生代表中有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陈宗汉和李才矩，法政专门学校的黎宗烈和邱继勋，商业专门学校的彭思黼，第一师范的蒋竹如和魏显烈，长郡中学的卢介一、丑伦杰和汤成衍，女子师范的李思安等。这些代表中，何叔衡是个中坚分子，他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直接领导代表团的活动。

代表团组成后，即赴衡阳进行活动。当时坐镇衡阳的直系军

吴佩孚，与皖系的张敬尧之间，由于权利之争，暗斗甚烈。吴入湘后没有攫得湖南督军的位置，很不得意，颇想收拾民心，为日后个人的事业打下基础，并利用机会对张敬尧和皖系进行报复。因此，他对学生的驱张运动，表示某种程度的“同情”和支持。他的这种态度，对代表团的活动，无疑是有利的。

代表团是一九二〇年初到衡阳的，住在市郊西湖一所单独的房屋里，首先和衡阳教育界取得联系。衡阳学生积极投入了这一运动，特别是第三师范和女子职业学校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援。我们的工作主要分两个方面进行：

一、展开宣传攻势，揭露张敬尧祸湘罪行，造成驱张的社会舆论。我们组织宣传队，上街下乡向老百姓宣传，由代表轮流演讲，历数张敬尧的罪恶，讲到慷慨激昂时，竟至声泪俱下，听众为之动容。又发行《湘潮》三日刊，报道代表团的活动和运动的进展情况，每期都刊载评论和各种宣传文字。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发刊，最初用油印，后来改用石印，分寄省内外。还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表通电等方式，呼吁全国同胞，大声援，拯救湘人，脱离水火。

二、向北京政府和衡阳驻军吴佩孚请愿。前者主要由赴北京代表团进行，我们仅发去请愿函电。后者由我们负责进行。目的在于表达湖南人民对张敬尧在湘的种种罪行的憎恨和百姓所受的痛苦，以“爱国护民”的大义，争取实力派的同情，加强运动的力量。我们代表团到吴佩孚的第三师司令部请愿共有十余次，其中有两三次系与衡阳的学生代表联合行动。头一二次，由吴亲自接见。我们递交了请愿书，并推出代表痛切陈词，声泪俱下。全体代表都十分激动，齐声痛哭。吴对我们表示同情，慰勉有加，允将湘人意见转达中央。我们怕他是应付态度，只说不做，每隔

几天又去一次，采取“申包胥哭秦庭”的办法，进行哭诉。后来都由吴的参谋长郭耀庭接见，他每次都是慰勉一番，没有具体答复。终于我们看到吴给曹锟要求将张敬尧调的一封密电，只记得其中几句是：“勋臣（张敬尧字）與情不渝，……青年学生数十人，每日齐来师部号泣，情殊可悯。”这时，我们方知吴对此事确实有所安排。因为当时国内形势是：北洋军阀中冯国璋的直系倾向于与南方言和，而段祺瑞的皖系则迷信武力统一。吴佩孚也不愿再与南方交恶，折损自己的实力，早与谭延闿、赵恒惕等湖南军政首领有所默契。他见时机成熟，便发表主和通电，随即率部由衡阳撤防。我们代表团在衡阳的活动，至此告一段落。

在吴佩孚撤防衡阳前夕，代表团已得到消息，便离开衡阳前往郴州，向进驻郴州的湘军首领谭延闿请愿，促其早日进驻长沙，驱逐张敬尧出境。我们当时对“湘人治湘”，是寄予了幻想的。此时湘军方面亦有准备，与吴佩孚配合行动。吴军撤出一地，湘军即进驻一地。张敬尧得到吴佩孚撤防的消息，急电段祺瑞，请调吴光新部入湘增援换防，但已来不及了。吴的地盘很快都落到湘军手中，张敬尧所部张敬汤、吴新田各旅在衡山一带大吃败仗，狼狈北逃。张见大势已去，在湘军节节进逼之下，只得率领残部离开湖南。

至此，驱张运动取得胜利，代表团结束回省。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日

驱张之役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战斗经过

谢慕韩

一九二〇年湖南的驱张之役，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学生驱张运动的推动下，以谭延闿统率的湘军为主力进行的。这一战役，固然有其进步的意义，但从谭延闿和张敬尧双方来说，实质上仍是一场南北军阀争夺地盘的内战。它打的招牌是继续“护法”，提出的口号是“湘人治湘”。由于皖系军阀张敬尧夺得湖南政权后，继承汤芗铭的残暴统治方法，湖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张恨之入骨；而对谭的反动本质一时尚认识不清，这些招牌和口号，在当时确实起了一定的欺骗作用。

笔者当时在湘军第一师第二旅第四团任少校参谋，参与了这一战役。现就回忆所及，将战斗经过叙述于后，供史学工作者和有关方面参考。

一、战前谭（延闿）、吴（佩孚）的互相拉拢和吴的撤兵

驱张之役，是以吴佩孚由衡阳撤兵为契机而揭开的。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中直、皖、奉三大派系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吴佩孚自恃侵湘作战功高于张，不甘居张之下，与张积不相容。谭延闿便乘机对吴进行拉拢，随派岳森、肖仲祁、吕慈德、王葆球等常川驻衡，专事联络，信使往返，不绝于道。岳森等在衡寄住和聚会地点为马嘶巷某号，后来湖南人把拥谭的政治集团称为“马嘶团”，

即源于此。由于“马嘶团”在衡活动的结果，吴渐次感到镇压护法不得人心，也想减低湖南人对他的敌意，乐于与谭接近。一九一九年湘军在郴州举行追悼刘建藩及阵亡将士大会，吴曾派专使吊唁，其挽刘的联语为：“首倡护法起偏师，百战捐躯，莫向湘流咽遗恨；为寝闾墙御外侮，两军携手，挽回劫运慰英灵。”“御外侮”固系托词，“两军携手”确已表明了他的心迹。由此，张、吴间的裂痕，亦即皖直两系的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最后，谭、吴谈到具体问题，谭要求吴撤兵，吴则索取撤兵费六十万元，双方同意，取得协议。但谭那时还未取得全湘政权，事实上无法筹措这笔巨款，只好求助于广西督军陆荣廷。陆系绿林出身，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也想找一个在他认为是政治家而又有实力的盟友，谭便成了他理想的对象。陆对谭的求助慨然允诺，并很快免了现。于是谭、吴的协议变成了现实。同时谭也作了陆、吴间互相谅解的中介人。一九二〇年春，吴履行诺言，撤兵北归。

谭在这一战役前的政治攻势，掌握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并部分地化敌为友，扩大了他们的矛盾，这是政略上的成功，从而开辟了军事胜利的坦途。谭、吴联系的事实，在谭逝世后，吴也曾致挽词，中有“衡阳归雁几封书”之句，可为证明。

二、双方军事部署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战斗经过

这次战争是分两期进行的。

第一期作战

吴佩孚撤兵后，张敬尧的军事部署大致分为三路：以田树勋担任长宝路，张敬汤担任长衡路，张宗昌担任醴攸路的攻防，各路均采纵深配备，而以宝庆、护湘关、黄土岭等处为重要据点，

在战略上形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攻势防御体系。另派赵春霆部接防衡阳。

湘军的攻略部署是：以主力转移到湘江左岸，分路攻略张军的重要据点，以小部活动于湘东地区，佯攻牵制。兵力区分为：独立第三旅（旅长鲁涤平）攻宝庆；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宋鹤庚）攻永丰，并策应左右两纵队作战；第一师第二旅（旅长廖家栋）攻衡阳，直薄护湘关。湘东地区的牵制作战，则以第一师骑兵团（团长何健）担任。

以上为双方作战部署概要。我对其他方面的作战情况不详，专就第二旅战斗经过叙述如下：

第二旅辖第二团（团长叶开鑫）及第四团（团长赵钺），并配属炮兵第三营（营长戴岳）及第二连，由原驻地永兴出发，经衡阳、耒阳县境在松柏上游渡过湘江向衡阳前进。前锋到达东阳渡附近，发现有北军据守，即展开攻击，北军略事抵抗，即行溃退，湘军尾追，当日迫近衡阳城郊前沿阵地，次日攻城。赵春霆本人虽依附北廷，但所部士兵均系湖湘子弟，不愿为虎作伥，稍事抵抗，即行溃退，并有士兵两连携械来降，湘军优予安抚，士兵皆欣然愿为前驱。因赵部官兵多系宝庆人，师部令归戴岳指挥（戴亦系宝庆人），参加作战，衡阳遂告收复。人民重见湘军旗帜，无不欢欣鼓舞。

湘军在衡阳稍事准备、补充，即布置下一步攻势，将第二旅分割为两个纵队，以第二团及第四团第二营（营长刘世涛）为基干，配属炮兵第三营（缺第八连）为前山纵队，向衡山护湘关攻击前进；以第四团（缺第二营）配属炮兵第二连为后山纵队，向衡阳通湘潭的大道前进，迎击北军第七七团和第七八团。此时护湘关之北军已侦知湘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战后湘军缴获北军作

战命令，其中有“有劣势之敌约千人，正向我前进中。本军有击灭该敌进占衡阳之任务”等语），乃大举反攻，于护湘关以南地区遭遇，战斗至为激烈。又因第二团第二营营长李秉煌作战不力，竟逃避到南岳山中深处，致北军长驱直入，直薄衡山县城，距城垣仅五、六里。北军在城内潜伏的间谍，在北门纵火策应。北军更以一连步兵由东岸在衡山上游强渡。此时湘军师部早到县城，即以师、旅部控制的少数部队凭河阻击，北军虽未得逞，但形势危险。幸得滇军鲁子丹部约四百人赶到增援得免全线崩溃（鲁子丹、朱培德两部共约千人，原驻郴州。初拟全部参加作战，因李烈钧令该两部开洪江，朱遵李令开走了。鲁感到驻郴以来，一切军需完全由湖南负担，面临大战，他适不义，因而仍随湘军进止）。此为前山当时战况。随后由李秉煌率领避入南岳山中的一营士兵又自动加入火线，团长叶开鑫即以朱耀华充任该营营长，士气复振，北军终未能越过衡山，两军成相持状态。

湘军后山纵队由衡阳出发，经过两日半行程到达白果附近，忽接到师部三道紧急命令，要该纵队由原道回援前山，同时指出前进道上之北军预期次日可能遭遇。湘军第二旅第四团团团长赵钺奉命后，便欲遵令行事。我当时考虑，由原路回援，在时间上已赶不及，且敌我兵力过于悬殊，以劣势兵力倾注于不利方面，亦无补大局。当前唯一合理处置即经福田铺绕攻敌后，明日便可收夹击敌人的效果。我根据这些理由提出建议，赵团长期期以为不可。他说：“违背命令是要杀头的！如果这样做，万一当面之敌也向福田铺攻击我军的后方，岂不陷入敌人包围中吗？”我说：“前方指挥官应有随机应变，独断专行之权，如能挽回战局，抗命罪是不会有的。当面之敌，系由北方新调来的拳军，人地两疏，行动迟缓，未必肯替张打硬仗，我军可以疑兵阻滞它的行动。”争论

多时，最后赵团长同意了。湘军后山纵队即于当晚三点钟出发，次日拂晓前抵达福田铺。据当地农民报告，北军的总指挥部在拓桥铺。农民并宣誓奋勇，愿作向导。后山纵队即展开步炮协同，向北军猛扑。北军总预备队不下一旅，因措手不及，未能展开，被后山纵队围歼，死伤极众。事后闻其副指挥官毛鸿恩也受重伤。张敬汤率部分幕僚及卫队突围向护湘关方向溃窜。后山纵队由散兵线上收集一个连，实行战场外追击，其余全部撤回，由北向南，攻击北军后面，北军全线动摇。此时前山纵队抓住战机，乘势猛烈反击，北军被湘军前后夹攻，其指挥系统又先被破坏，陷于极度混乱状态，只有沿湘江左岸小道溃窜。北军在江中又有装饰机枪的小火轮督战，互相射杀，死伤亦不少。其突围后未能逃脱的约一个旅，被湘军压迫于高桥盆地，全部缴械。至此，北军溃不成军，弃守护湘关，直窜长沙，沿途奸淫烧掠，被戡农民伤毙并缴获枪枝的亦难胜数。

这一战役的胜利，是由于湘军在战术上迂回成功，在战略上也实现了整个战局的中央突破。进攻永、宝的湘军部队听到行山大捷，勇气百倍，将当面的北军击破。张宗昌部仅经过小接触，闻败讯即向江西撤退。湘军各路兼程尾追，使北军无喘息之余暇。大约六月中旬，湘军各路会师长沙，第一期作战遂告终结。

第二期作战

北军退出长沙后，布置第二道防线于岳阳、西塘以及临湘县属的桃林一带，重点摆在岳阳。

湘军攻击部署为：以第一师第一旅为骨干，配属其他部队攻岳阳；以第二旅攻西塘；以独立第三旅攻桃林。

第二旅攻击西塘是采用两翼包围的战术。西塘正面均为水田，

平坦开阔，不易接近。经过一天的威力搜索，北军阵地完全暴露。第二旅即以小部兵力从正面佯攻，而以主力在北军火网以外绕到阵地两翼侧背。经过一天多的激战，北军大部被歼，小部溃逃，湘军占领了西塘。此时岳阳、桃林两方面正在激战相持中。湘军师部命令第二旅以第二团增援左纵队，第四团增援右纵队，企图两翼席卷，扩大战果。第二旅旅长拟遵令执行。此时第二团第一营营长刘重威提出直捣云溪，纵深突破，截断岳阳敌后交通，争取更大战果的建议。大家认为过于冒险，刘坚决表示愿独立走这一险着，群情激动，赞同者多。于是决定以第二团全部攻取云溪，第四团以两个营增援右纵队攻取桃林，一个营控制西塘为总预备队。次日各部即向目的地挺进。云溪北军未设防，湘军不费一弹即行占领。以后分工为：第一营对岳阳方面，第二营对五里牌方面严密警戒。两营奉令各在警戒线前约一公里处破坏或阻塞铁道。第一营采用的是堆石阻塞，第二营采用的是拔除道钉。可是第二营在执行任务时把破坏点错误地移到了警戒线后方。这一错误本来是坏事，却收到意外的战果，坏事变成了好事。因岳阳方面之北军，知道湘军已攻下西塘，不能不作撤退准备，但策未料到湘军已占领云溪，仍想利用铁道运输撤兵。当北军撤退的第一列车到达第一营的警戒线附近，开足马力往前冲，堆石阻塞无效，一直冲到第二营的后方破坏点，火车翻了。此时第二营正在和由五里牌向云溪反攻的北军激战中，接到第一营电话通知，本已难于应付，但因车翻，北军官兵多数伤亡，幸存的也丧失斗志，因而只抽出少数兵力，勉强应付了这一事变。事后查明，翻倒系北军兵站的列车，车长已被压死，在他身上搜获北军撤退命令，说明北军在后部已编成五个混成旅，除以一个旅任掩护外，其余陆续向云溪反攻。云溪成为第二期作战的主要阵地。湘军第

二旅也调集全部参加这一决战。接着北军第二列兵车又开到了，由于湘军第一营开枪过早，北军退回数里，部队下车对湘军展开猛攻，相持一昼夜，其续撤部队源源而来，湘军第二旅各营亦先后赶到，加入战斗。北军因无路可逃，豕突狼奔，死伤遍野，湘军伤亡亦大。湘军为避免敌军作困兽之斗，命令全线部队转移到铁道以南，占领侧击阵地。北军得此一条生路，纷纷沿长江右岸向湖北逃窜。在湘军阵地火力控制下，北军死亡枕藉。与此同时，湘军第二团第二营也将由五里牌进攻的北军击退，造成了整个战局对我更有利的态势。

此役湘军第二团苦战多日，官兵极度疲乏，必须稍事休整，故战场外的追击，完全由第四团担任。依当时情况判断，沿江逃窜的北军溃不成军，再无反攻能力，而沿铁道方面因桃林情况尚不明瞭，有再度发生激战的可能，因而决定以一个营沿江追击，而以主力沿铁道追击。次晨分头出动。沿江方面，因系隘路，北军掩护容易，逐渐转移阵地，湘军仅和北军保持接触，监视其行动而已，无多缴获。我随赵团长率主力沿铁道东进，也已无北军完整部队，仅有零星落伍士兵，在他们缴械后，即就地给资遣归。有已逃出的北军回头向湘军缴械的共计六百多人。湘军到达尖山铺即停止前进。赵团长派我单骑赴羊楼司和当地驻军（北军）洽商临时休战办法。对方派出和我谈判的为中校团附贺国光。他们对湘军全无敌意。谈判结果协议原则为：保境安民，互不侵犯。具体条文共六条（条文已忘）。双方签字后，即行生效。贺告诉我，张军残部已于先晚到达边境，他们为防止溃兵骚扰，已将其解除武装，收集后运。这一临时休战协定，以后即为湘鄂两省军政局正式谈判的基础。象这样的重大问题，竟轻易获得解决，在对张的政治攻势取得效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同时也反映出直

皖两系的矛盾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至此，湘皖无北军踪迹，湘军部队归还建制，驱张之役遂以全面胜利而告终。

一九六二年作

（原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关于张敬尧

许和钧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湖南在汤芑铭、傅良佐、张敬尧等相继统治下，备受摧残，尤以张敬尧为时较久，为祸最烈。笔者湘人，久欲撰写有关张敬尧事迹，借伸口诛笔伐，以见闻有限而未果。一九六二年夏，因病去北京就医，于友人家适晤民革成员、原籍安徽霍丘的薛光华老人，谈及张敬尧系他的小同乡，他由高等警官学校毕业后，与张同住北京。辛亥革命时，他任师、军长及江淮招抚使，北伐期间又被派往张敬尧部队做过策反工作，对张一生丑闻劣迹比较了解。笔者便请薛作了几次口述，记录经薛审阅后，再综合自己所知者略加补充，整理成篇，供有关方面参考。

张敬尧的出身

张敬尧，别名勋臣，安徽霍丘人。族人多务农，惟他一家自祖父以来专事缝纫，并迁往颍上县南照集营业。南照集位于淮河边，系大别山竹、木、茶、麻汇集之所，为颍上县西南乡第一市镇。他父亲也读过几年书，由于科场失意，就在颍上县衙门口当“代书”，即包揽词讼的讼棍。张敬尧十六七岁时，因无钱上学，家里送他到南照集族叔张鸿勋所开的粮食店作学徒。第二年，记偷了族叔十八串铜钱和五块大洋作旅费，跑到天津当兵去了。

张敬尧的升官图

张敬尧初入伍时，就闯了一桩大祸。一天，部队出操时，他的动作做得不对，又不服教官的纠正，还打了教官一下，按律应处死刑，次日由四个兵将他绑出去砍头处死，张痛哭流涕，哀求饶命。行刑者将他带到郊外，只用刀背在颈上按了一下，就这样嘴上不喘下的销差走了，因此他得以不死。他流浪天津街头，乞求一个说书老者收为徒弟。先是代收座价，后来也代老者说一段书。终因不能安分守己，又混进了北洋军队。不久，北洋武备学堂在各部队选兵入学，张被选中，受训一个时期后回部队当上排长，从此官运亨通，逐步爬上去，升到旅长时，便调驻北京。某日，张听到袁世凯要举行阅兵典礼，并将邀请各国公使观礼，意在炫耀军威，张心领神会，将部队装备整齐，伺机对袁世凯、段祺瑞摇尾献媚，博得了袁、段的好感。袁对张说：“你还不错，今后你要好好干，将来我把你这一旅扩编为师。”同年，张奉调驻防河南。这时他已有独当一面的权力，在驻地自行招兵，编成一个师，电告袁世凯说：“奉大总统面谕成师，现已成立第七师（按，当时正缺这个师的番号），请赐予任命，并发给装备及饷项”云云。张对袁世凯的皇帝梦早有觉察，便又对袁的亲信左右说：“袁大总统九五之象，龙兴有日，君无戏言，难道不给我一个师长吗？”袁正各方物色拥护帝制的走卒，听到这些话当然称心，哈哈大笑说：“这回我被张敬尧这小子讹上了！”于是，下令任命张为第七师师长，并给该师头等装备和甲级开支，表明他把张视为心腹。一九一六年，袁称帝时，蔡松坡自云南起兵进入四川讨袁，袁即派张等迎战，结果被击溃。

一九一八年秋，北洋政府派傅良佐（湖南乾城人）统军入湘任

督军，遭到湘人激烈反对。九月，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永间的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联名宣布独立，接着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和张学济、胡瑛、林德轩、周则范等部，也都宣告独立。他们的目的并不仅是倒傅，而是反对北洋军阀，拥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此同时，一些野心家争夺湖南地盘的斗争也在进行。谭延闿周旋于北洋军阀和桂系陆荣廷之间，冀图取得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宝座；赵恒惕托病居丧，暗中活动。驻扎武冈、宝庆一带的湘军第二区司令周伟及第三团团长宋鹤庚等亦响应独立，并联络所有独立部队兴师讨傅。在这一战役中，傅良佐部一败涂地，傅本人秘密乘火车逃往北方，溃军由程潜以护国军总司令名义协同刘建藩收集起来。这时，北洋军阀的另一爪牙、驻岳州等地的吴佩孚却挺军南进，一直打到衡阳，使湘南的倒傅部队不能和湘西的倒傅部队会合，以致湖南大片土地和军政大权仍然操在北洋军阀手里，谭延闿、赵恒惕等也不能继傅登台，这就为张敬尧督湘造成了机会。段祺瑞以同乡关系，视张为皖系亲信，派他为援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督军。两年以后，张因作恶多端，为湘人驱逐。当时任第三师师长兼援湘军前敌总指挥的吴佩孚虽奉命援张，却坐视不理，反而率部北归，这是吴佩孚未能达到督湘的目的，用这一行动来报复段祺瑞的。

一门七“帅”的丑闻

张敬尧督湘时三十六岁，到四十余岁在北京被刺身死的十多年里，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丑闻劣迹，传遍三湘。仅从一门七“帅”的丑闻，就可以看出他狂妄到了何等程度。

按照当时的习惯，统辖两、三个省以上的军事首领才得称“帅”，统辖更多的省份以至掌握全国军事大权的才称“大帅”。张

敬尧只是一个省的督军，居然命左右、部属称他为“大帅”。他既自称“大帅”，也就妄称他二弟敬舜为“二帅”，三弟敬禹为“三帅”，四弟敬汤为“四帅”。更可笑的是，连他的妹子也称“姑帅”，母舅到了长沙又称“舅帅”。这些“帅”仗着督军权势，目空一切，无恶不作。他们骄奢淫逸，狂嫖滥赌，贩烟吸毒，酒食徵逐，固属常事，甚且卖官鬻爵，朋比分肥，规定头、二、三等县长、局长需要多少现洋，简任、荐任、委任等官职又需要多少财物，按级需索，贿赂公行。他们公开标榜的用人标准，一是本家，二是亲戚，三是同乡。他们迷信看相算命。据说“四帅”敬汤在家放牛种地时，星相家说他的八字比“大帅”还好，张敬尧就叫这个二十二岁的娃娃来当旅长，还兼参谋长。张的妹子“姑帅”原已许配某杨姓官僚之子，张有个义子毛思忠，改姓张名继忠，年仅十多岁，长像还好，“姑帅”就和他姘居，并要大帅给他一个团长，于是人皆呼之为“少帅”。这便是一门七“帅”的由来。“姑帅”不久便和姓杨的丈夫脱离，“少帅”恢复毛姓，二人正式结婚了。当时流行一首歌谣，挖苦张敬尧：“儿作妹婿，妹充儿媳，一门七帅，不如狗屎。”“少帅”的团里收编不少巨匪大盗，如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主犯孙美瑶、孙美松部下就都被收罗在他的团里。这批匪徒到湘后，挂着军队的牌子，四处骚扰，明抢暗偷。据闻有个时候，湖南各县城乡人民忍无可忍，趁他们过道时，伪作杀猪宰羊请他们吃酒，待上席后就将其武器夺走，用刀斧乱砍，然后逃之夭夭。于此可见湘人对张部痛恨之深！

张敬尧的搜刮和勒索

张敬尧不择手段地搜刮民财。他的三个老婆，元配胖太太、次妻瘦太太，又收一个使女名大洪的称洪太太，都是贪赃敛财的

“扒钱手”。张在湖南除纵兵劫掠之外，又开设湖南的“裕湘银行”，发行害民的“惠民奖券”，强迫人民认购。又自兼湖田督办，盗卖滨湖垵田。更残酷剥削公营企业劳工，拖欠工资，以饱私囊，引起各业工友罢工抗议。他还盗卖矿权，摧残工矿事业，使之陷于绝境。并任意扣发各公私立学校教育经费，迫使学校停办。这类罄竹难书的罪恶，新闻界只要稍作揭露，报馆就有遭到封闭的危险。张敬尧搜刮、勒索，贪得无厌，又买田置地，盘剥农民，仅天津就有他的一千多顷水田，在颍上县又添了三百多顷好地。霍丘县西北乡，张敬尧有个堂叔叫张德行，由于“大帅”的关系，一县人都称之为“老太爷”，称其三个儿子为“大人”。张敬尧在霍丘又买了三百多顷肥田交这位堂叔管理。张买田是恶买强要，只要看中谁家的田，就必定要弄到手里。在霍丘一带只要说起“桑营孜”张将军府，没有不谈虎色变的。

张敬尧退出湖南的最后一幕

当谭延闿、赵恒惕的湖南反张部队打到长沙的时候，张敬尧的残部向岳阳败退，沿途烧杀掳掠，无所不为。岳州有个美国教士被乱兵打死。美教堂立即电告美国驻华使馆，从上海派遣一条兵舰向岳州疾驶，沿途撞翻我国若干民船，死人不少。此事固然是美帝横行无忌，草菅人命，但肇祸者还是张敬尧的部队。

张敬尧之死

张敬尧在湘失败后，曾到广东活动，后又到东北游说，都不得意，最后仍投奔吴佩孚。第二次奉直战争时，任吴部后援副总司令。一九二四年冯玉祥自南苑开向古北口途中，联合皖系、奉系向直系倒戈，号称国民军，把直系军阀曹錕、吴佩孚从北京驱

逐出去，张敬尧也因而被捕。冯玉祥把张同曹锟的收支处长、绰号李六的李彦青一起押在北京旂坛寺。当斩李时，故意将张一道绑去。张大哭大骂说：“冯玉祥不是人，咱们总算是同事兄弟，你今天杀我不打紧，但不应把我同李六一道杀呀！”一会来了一个副官，将张松了绑，说是冯总司令不杀“大帅”，这回不过和“大帅”开开玩笑，试试你的胆量罢了。张敬尧死里逃生，可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一九二六年，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这时张宗昌据有直、鲁两省地盘，又用张敬尧作他的第一军军长（实际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先是与袁家骥军同驻安徽六安一带，失败后又北撤亳县。到了那里，张因国民革命军派员向他策反，竟伪装邀袁家骥一同投效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一军军长马祥斌部。马、张、袁三人并已结盟拜把，不料张、袁二人反复成性，竟乘机将马出卖，掳往北方。马见了张宗昌愤然大骂，终于遭到杀害。国民革命军赦免了张敬尧这个刀下鬼，张敬尧却反而谋害国民革命军的重要将领，这不又提供了一个怜惜毒蛇反被蛇咬的严峻的历史教训吗？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张敬尧这条丧家犬走投无路，终于无耻地投入伪满的怀抱，充当伪满的暗探，潜入北京活动。不久，张在北京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临死时手上还戴着两只金戒指和一只汉玉镯。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回忆父亲杨昌济先生

杨开智

我的父亲杨昌济先生，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长沙县东乡板仓。原字华生，后于一九〇三年二月赴日留学途中改名怀中。祖父书祥公，一生以授徒为业。我父幼年在家读书，凡经史词章等学问，都是书祥公亲自教诲，管束极严。因此，他青年时代就熟读经史，对旧学颇有根基，受到当时湖南学政的赏识，不到二十岁入县学为秀才。

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一般读书人都把八股文作为“进学”做官的工具，他却极端鄙视清朝这种科举取士制度，在日记中写道：“闻墨不记，以其为俗学也。”一八九八年，戊戌维新运动兴起，在湖南开南学会。那时他正在岳麓书院求学，有一次，他听讲发问，主要说救国救民的道理。当时维新主将浏阳谭嗣同非常欣赏地说：“于圣贤微言大义晦盲否塞之秋，独能发为如此奇伟精深之问，此岂秦汉以下之学者胸中所能有哉？兹事体大，余亦何敢论断。总之，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论皆通矣。”他对我父的发问，评价很高，以圣贤事业誉之。

戊戌变法时期的南学会课卷中，尚存有我父一篇名列第三的论文《论湖南省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他写道：“振兴商务固为今日之要图，而商务之本源，尤在于农工之学，其必先振

兴夫二者，而后商务可得而言也。”

戊戌维新后不久，我父不屑于学政张亨嘉的赏识，决不再参加科举，而潜居长沙东乡影储山麓，闭门读书。在学习过程中，他“严立课程，力戒涉猎，强记故实，务别去取”。他十分敬佩王船山之为人，认为“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

一九〇二年冬，湖南地方当局招考官费留日学生，我父怀着寻求真理、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报考，并获取录。翌年二月初一，自长沙起程赴日留学。这次同路去的三十多人中，以他的年龄最大。二月初十路过岳阳，与同行者登岳阳楼，题壁一首，抒发了他当时眷怀祖国的无限感慨和出国深造的宏伟抱负。

我父到东京后，进了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专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普通班，普通班按地区分班，他编在湖南班。结业后，即考入东京高等师范继续深造。

我父初进弘文学院时，黄克强也在这里学习，他们时常交谈，互相切磋。不久，黄克强由军国民教育会派遣回国，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于一九〇三年秋在长沙建立了华兴会。和我父一道赴日留学的同学刘揆一、陈天华、仇亮，后来都成为华兴会的骨干分子。翌年甲辰起义失败后，黄克强、刘揆一等又出走到东京，继续从事反清斗争。我父和他们有密切的交往。可惜对这段历史我不甚了解，只知道在东京期间，他对孙中山、黄克强的革命活动，是持极端赞助态度的。

我父在东京高师毕业后，又升入日本帝国大学进修两年。犹以为未足，再远游西欧，于一九〇九年入苏格兰厄北浞大学文科肄业。两年后得文学士学位。继赴德、法考察教育数月，始于一九一一年夏回国。回国后，曾去北京与在京老同学叙旧，交谈对

国内形势的看法。当时，清廷有所谓留学生考试，经北京廷试后赏给进士、举人等名目。我父薄此不为，未曾赴试。辛亥革命后，谭延闿当了湖南都督，一九一二年曾拉他担任教育司长，他没有答应，而乐意就任湖南高师教员。民国初年，他一度被推举为长沙县教育局会长，也辞而不就，表示不愿插身这一时代的党会。

一九一八年秋，他写信给一位在北洋军阀政府中居高位的留英同学，劝其退隐，说：“政治漩涡中诚非吾辈所应托足，无补国事，徒有堕落人格之忧。谓宜飘然远引，以求自立之道。”又说：“今日之事，当从底下做起，当与大多国民为友”。一九一八年，我父初到北京，杨度、章士钊等怂恿其活动出任教育总长，我父坚决不答应，说：“我决不做官，我要教教书，著书立说。在北大教课，可常与蔡元培、李大钊、周树人等学者交谈，岂不更好！”又曾对家中人表态说：“我国正处于内则危亡腐化，外则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因此我坚决不做官，要实现我的理想！”

我父律己甚严。早年授徒于乡，自署其书斋曰“达化斋”，每天必写日记，题为《达化斋日记》。内容有读书札记、教学计划、师友交往、中外时势以及对伦理道德观念的叙述等等，特别是后者所占份量较多。《达化斋日记》实际是他的一部学术著作，我父在教学中多次用这份日记作补充教材。原稿于我父生前被人取去，部份曾以《达化斋日记》为题，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在日记中，可以看出他许多严于解剖自己的记述，如：“数日间疚心之事有二：未能寡言一也，曾乱定课二也。戒之，戒之！”“宾客稍众，便有厌烦之心，此是涵养有未至处。”“予恒有自满之处，形于辞色，二三益友，往往微示风旨以警劝之，此大病痛，宜痛加克治者也。”我个人体会，不自满是他一生治学最得力之处。

辛亥以前，我父留学日本、英国达九年之久，在治学方面，确实下了一番功夫。一九一二年，湖南高等师范请我父为文科教授，他欣然乐从。刚到学校不久，就开始编辑讲义，翻译东西文伦理学。他的一些教育著作如《伦理学原理》、《西洋伦理学史》、《论语类抄》等书，都是在湖南高师讲学中所著译。湖南的师范教育，自高师成立后才开设有西洋伦理学、教育学及哲学等课程，我父在这方面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其所著《伦理学之根本问题》，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北大出版上卷，次年三月出版下卷，共九万余字。《西洋伦理学史》于一九一九年在北大出版，次年九月他去世后再版，全书共十四万多字。在这些著作和《达化斋日记》中，体现了他的基本思想和做人的道德，其要点是：劳动神圣，勤工俭学，科学救国等思想。

一九一三年，我父兼任湖南第一师范教员。一师当时是长沙一所极有朝气的学校，所收学生，多为贫苦出身。而他生平正乐于培养清贫学生。当时在第一师范攻读的毛泽东同志和在高师肄业的邓中夏、蔡和森等人，均耳濡目染，深受其影响。毛泽东同志后来曾说：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强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且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这段话见之于毛泽东同志与美国进步作家斯诺的谈话。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毛主席在延安各界为徐特立同志六十寿辰庆祝会上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在《达化斋日记》中，我父有这样一段记述：“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官则往

湘乡买田。风俗淳朴，烟赌甚稀。渠之父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可见我父当年对毛泽东同志的器重。他非常告诉家人：毛、蔡二生将来必然是中国的栋梁。

当时，毛泽东同志在一师为反对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引起反动校长怀恨于心，要开除他的学籍。我父和徐特立老师等出面力保，不同意把毛泽东同志开除出校。他当时特地用粉笔书写诗句于黑板上：“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借此表达对学校当局的愤慨和对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

由于毛泽东同志和我父有非比寻常的师生情谊，因此，每逢星期假日，他总要邀几位有志同学来我家探讨学问，各抒己见，竟日不休。经常应邀来我家的，有蔡和森、陈昌、张昆弟、邓中夏、肖子璋、罗学瓚等人。在第一次讨论中，首先谈到读书的目的，大家争相发言，情绪十分热烈。最后由毛泽东同志作了总结：“我们读书的目的，是为救中国，求真理，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时我父亦点头称是，并勉励他们救国救民，追求真理。一星期之后，大家又聚会一起，继续讨论。在明确了读书目的以后，下一步应如何身体力行？大家表示：首先，必须好好锻炼身体和意志，不说空话，注重实践。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个说法很对，并提出：“我们以后每早洗冷水澡，并搞其他体育活动。首先把身体锻炼好，象怀中先生那样，一年四季冷水浴，冬天下雪也要洗。”

我父常以“不死、求己、猛进、坚忍”八字教导学生，并解释说，所谓“不死”，就是要炼身，要讲究卫生，锻炼身体。从《达化斋日记》中看到，我父注意于锻炼身体。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起，“每早起厉行运动与深呼吸”，九月二十八日起，每天

坚持厉行冷水浴。一九一七年上学期，他应聘到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主持教务和讲课。参加过华兴会同黄克强一起反清革命的校长汤松，是我父的留日同学，他最尊敬我父，常来往我家。他知道我父有洗冷水浴的习惯，吩咐事务人员特制一只很深的圆型大木盆，供我父洗冷水浴用。在父亲的带动下，我和开慧姊也不间断，坚持洗冷水澡。以后在长沙家里做了一只大木盆，供我兄妹洗冷水浴用。后来我在长沙雅礼学校读书，跟柳近荀烈士同住一寝室时，我们相约早上洗冷水澡，一年四季，习以为常，作为锻炼身体的一种途径。

一九一八年上学期，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毕业。我父于下学期应聘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是年六月，全家迁到北京，住前门后豆腐池胡同九号。这时候，毛泽东同志发起组织并领导的新民学会刚建立不久，蔡子民先生在北京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号召有志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我父听到这个消息，特意写信告诉毛泽东同志。据何长工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接到我父来信后，便在他担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召集新民学会会员讨论赴法勤工俭学问题，热情地鼓励大家到国外去寻求知识。同年八月，毛泽东同志带领罗学谦、张昆弟等二十多人初次去北京。在我父的协助下，留法勤工俭学会蔡子民先生答应开办预备班，让已经到京的青年学生边劳动边学习法语，为出国留学作准备。毛泽东同志还在我父的协助下，把控制在湖籍大官僚熊希龄、范源源手中的一笔前清户部应退还湖南的粮盐两税的超额余款的利息，提取出来作为湖南勤工俭学青年的赴法旅费。毛泽东同志为湖南留法勤工俭学青年出力最多，但他自己认为在国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并不打算到法国去。因此，他没有进预备班，就住在我们家里。毛泽东同志由我父介绍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每月薪金是

仅大洋八元，但他十分高兴：一因北大图书馆收藏古今中外名著很多，可以随意阅读；二是图书馆长李大钊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就住在图书馆隔壁房间，可以经常去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后来，毛泽东同志回忆在北大图书馆的这段生活经历时，说：“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形成的。”

邓中夏那时也在北大读书，后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活动家，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和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进步同学，也和过去在长沙一样，每逢星期日必来豆腐池胡同九号我家，大家展开讨论。我和开慧妹有时在座旁听。我父在这样的场合中，以他长期订阅的专论外国“波日西维克”（即布尔什维克）消息的英文杂志《Out Look》作为资料，共同研讨。他有时翻译过这个英文杂志所发表的文章，我手边还保存了一篇他所译的《本体论》。还记得有一次，母亲问什么是“波日西维克”？父亲说：“将来波日西维克来了，会象蚂蚁出洞一样，一队队、一排排直冲过来，连门板也挡不住。因为他们有高尚的理想，坚强的意志，能抵抗反动社会的势力，且有牺牲自己的精神。”

一九一八年在北京豆腐池胡同九号住家时，我父于后院中挂一黑板，并设桌椅，为子女（子珍、一纯、开慧等）每天上课听讲之用。那时我家请了厨工和女工各一名，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余欲每月教厨工李炳卿读新出之报章杂志，余欲买国语教科书以教女工。”可见他是一心想把全家教育好的，不仅教育子女，还要教育别人。

一九一六年，原来设在岳麓山的高等师范结束，我父呈文湘省当局，请于高师校址创办省立大学。他在呈文中指出：“或曰，北京、天津等处既有大学，学者不妨前往就学，何必设之于湖南？此乃迁于事情之说也。湖南学生因本省无大学，不得不负笈远游，

非无求进之志，然既惮道途之远，又苦经费之多，因而裹足者比比矣。近日中学及初级师范卒业者日众，群众无升学之地，坐耗居诸，销磨志气，倘非设立大学以收容之，则游手日多，人才日绌，其事有可为寒心者。”“夫高师校址，固前日岳麓书院之旧址也。岳麓书院，自赵宋建设以来，千有余年，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朱张讲学，流风余韵，千古犹新。且地居长沙对河，远隔尘嚣，有山水林园之胜，斯固文人学士修学练神绝好之境地也。”呈文送出后，得到湖南教育界人士的支持，省政当局批准立案，是年除高师财产、图书、仪器已派员保管，留供省立大学使用外，并设立湖南大学筹备处，聘请我父主办其事。这个筹备处最初就设在我家，一九一八年他去北京大学任教后，由当时担任一师校长的易培基接办。今天，湖大仍在岳麓山，并另兴办了好几所高等院校，为祖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乐育英才，弦歌不辍，远远超出了我父当年的理想。

五四时期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新青年》创刊后，我父十分重视，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我手边还保存有第二卷四期上发表的《治生篇》，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欲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必使一家之人，咸勤厥职。”“第一则不可使子弟起依赖父兄之心”，“第二则为父兄者，亦不可有倚赖子弟之心”，“第三则兄弟不可互相倚赖”，“第四则女子亦不可急于治生之天职”。同时指出：“欲求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不可不戒早婚。”父亲这些关于治生之道的论述，在今天看来，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新青年》是五四时期广大青年争相阅读的进步杂志，我父除买来让我们兄妹阅读外，还寄给在长沙的子侄辈阅读。记得在五四运动前夕，上海出版的《国民快览》上发表过我父所写的一篇文章《论谋生之职业》，抨击官吏之争权夺利，

提出了民主政治，民族自觉问题。此文在五卅运动中曾发生过一定的影响。

父亲逝世六十年了，他平时教导我们和学生们，要求非常严格，有些事至今记忆犹新。他在湖南教授伦理学，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五年。《达化斋日记》中写道：“我首先时时默想，所想的就是：‘劳动神圣，勤工俭学’。开慧妹后来对我说：‘我们的父亲是追求真理的学者，他的思想是随时代进步的。’”

父亲经常教导我们要有人格，有骨气，也要谦虚谨慎。他曾以“打金枝”的典故告诫我们，在日常待人接物中要谦虚知礼。

他生平洁身自爱，不屑于求人。一九一四年，我投考长郡中学，那时长郡是比较有名气的学校，投考人数很多，而主试者多为我父相知之人。但他未曾开口求人，结果没有取录。他认为学校能秉公办事，不以为意（后来我还是补习了半年，进了长郡，与李富春同志同班）。在另一方面，别人有求于他，他也有所不为。有一年，中华书局为了同业竞争，扩张教科书销路，敬请学界名人签名介绍。别人有求必应，他以未见其书，不肯贸然许诺。

我父经常教导我们兄妹的，还有这么几件事：一、肯替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凡是广大穷苦人，总要尽力帮助他们，总要替他们想一想；二、凡事应当与群众商榷，要从最大长久利益着想；三、反对封建，反对迷信，先从我家做起。这些教导，我们铭记心中，并身体力行。如近六十年来，我家死了人，从不烧香设纸，也没有其他迷信行为。

他反对封建的家族主义。乡间族人倡办族学，他并不与闻，而对普及教育事，则赞助不遗余力。

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时期，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张敬尧伙同他的老弟敬舜、敬禹、敬汤荼毒湖南，搞得暗无天日，

人民恨之入骨。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磨牙吮血，湖南遭殃。”“我父对军阀当道的残酷现实极为不满，常常形之于辞色。特别是对张敬尧摧残志士，钳制舆论的罪行，非常愤慨。一九一九年秋，毛泽东同志以学联为基础，开始了秘密的驱张运动。当时湖南教育界、新闻界许多人写信给我父，揭露张敬尧的祸湘罪恶。我记得蔡畅同志也从长沙来过信，控诉这个倒戈军阀的昏庸横暴。同年冬，到北京请愿驱张的代表来到我家时，他无不热情接待，侃侃而谈。毛泽东同志第二次到北京，有段时间又住在我家。在我父的支持下，毛泽东同志在北京起草驱张宣言，通告全国，得到各方面的响应。就在这年冬季，我父开始患重病，住进德国医院。在住院期间，除由我们夫妇轮流守护外，开慧还日夜陪伴在侧，照料一切。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等虽忙于驱张运动而奔走，也时常去医院探视，关切备至。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七日，我父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他在逝世前，仍然念念不忘救国救民，念念不忘毛泽东、蔡和森这样的青年。在写信给一位留英同学的情中，他称道毛泽东和蔡和森的学行：“吾郑重语君，二子实为人才，前途远大。君不若救国则已，救国必须重二子”。

我父的一生，为探索真理，培养人才，立志救国救民的一生。他逝世后三十年，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得到解放，祖国全体劳动人民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终于实现了我父“救大木植参天”的愿望，实现了他为救国救民而一生追求真理的崇高理想。

一九七九年三月

回忆杨昌济先生

郭之奇

杨昌济（怀中）先生世居长沙县东乡板仓杨家老屋，我家世居距板仓五华里之巷子山。山势至此，成巷子形，郭、陈两家于东西山口构屋，依山形之曲折，筑墙栽树为园圃，规模可观。

怀中先生于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授徒于巷子山陈家，陈氏子侄数人，从之受业。

先生在陈家教书时，夏日夜间在外乘凉，常迎风弄笛，以自娱乐。此乃寻常塾师所不敢为，而禁制于弟子者也。

先生馆于陈宅似仅一年，其最赏识之弟子为陈光孚，号同季。《达化斋日记》中有：“看陈同季之文，慨然有悟。信乎文字乃宇宙灵气，可以通天下之志。”同季后为梁启超门生，与蔡松坡为同辈人。据闻梁启超批同季文章：“有如此才，中国不亡矣。”其为良师所叹赏如此。

先生勤求新知，自课有英文一项。犹忆庚子岁即一九〇〇年，我方十二岁，依从兄秀樾就读于家塾，秀樾亦先生之门生也。某日，先生来访，留宿塾中。秀樾引我进谒，过蒙奖饰。早起，见先生手持书一本，口中有所吟念。我问先生曰：“先生顷所念之英国字，是我心里想象之某一中国字否？”先生答云：“不是。”现在事隔八十年，犹偶忆及之也。

一九〇三年春，先生赴日本留学。后二年，我亦由经正学堂

保送留學日本，春夏之交抵東京。行裝甫卸，先生即與柳午亭聯袂見臨，殷勤慰勉。時先生已由弘文學院師範班卒業，負笈東京高師。方先生在東京高師時，我常晉謁求教。時有梁启超《明儒學案》印本便于攜帶，我逐章細閱，圈點其精到之處，就正于先生。先生謂：“所圈之句皆精要之語。我不知道你到底懂不懂？”因此，每以王船山之《談西學論》等書，擇其立論博大精深，而條理可繕者，令我熟讀默忖。我之得益于晉國學問之指歸者，全賴先生启发教誨也。

前清末造，外患日深，瓜分之禍，迫于眉睫。留學生盛倡反清革命之說，聲勢越來越大。清廷挑選學者宿儒、名動一時者為留學生監督。猶記派往英國者，為旧學著名之蒯光典。蒯于一九〇九年赴倫敦，隨從者數人，李驥丞其一也。并遴選知名之士如楊懷中、章士釗、楊篤生諸人，前往英國留學。懷中先生抵英後，入蘇格蘭厄北淀大學習哲學。後數年，我亦就讀厄北淀，所居宿舍即先生前此旧游之地也。頃閱《達化齋日記》載：“接厄北淀中國學生會來信非規則，舉李驥丞為會長，郭之奇為華文書記員”。先生為厄北淀校友，照規則當然為名譽會員。此不過例行故事，无可追憶。驥丞字寅恭，安徽合肥人，在厄北淀習農林學。拙戔期間任中央大學教授，我在重慶曾一見之，不知尚在人世否？

我在厄北淀時，先生來信中有“博飲嬉娛，適困勞檢。習習成風，學者不免”之語，至今未忘，亦不能忘也。回首曠昔，渺若雲烟，泐筆書此，用誌感懷。

一九七九年三月，時年九十有一。

杨昌济先生在湖南商专

李 凤 池

杨昌济先生，号怀中。世居在长沙县东乡的板仓，因又称板仓先生。他是中国近代具有进步思想的伟大学者和教育家，对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有巨大的影响。一九一七年上期，我到湖南商业专门学校读书，这时校址已由荷花池迁到落星田。校长汤松和杨先生在留学期间，是最相契的朋友，深知杨先生的道德学问。在担任商专校长以后，特聘请杨先生任教务主任，并兼国际商法及伦理学教授。杨先生于一九一七年上期应聘到校，即住在商专，并在第一师范任课。他是一个追求新思想，积极倡导社会革命的人，因而对于学校课程的布置以及日常生活方面，都与一般的情况不同。我因当时经常接近杨先生，对他在商专的言行，迄今尚留有鲜明的印象。兹就回忆所及，分述于下：

(一)

汤校长介绍杨先生初次和我们见面的时候，在教室黑板上，写了八个很大的字：“学通中外，道冠古今”。接着介绍说：“杨先生在英国和日本留学九年，对于中国固有的学问，也有很深的研究，真可说得上是学通中外。而且具有崇高的品德，和社会革命的伟大精神，秉公持正，实践躬行，说他是道冠古今，确非谀词。杨先生今天能到商专来主持教务和讲课，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了我的愿望。你们能亲受杨先生的教诲，一定能有很好的成就，更是莫大的幸运。”因此，我们同学都很尊敬杨先生。汤校长的介绍词，和在黑板上写的八个大字，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忘记。

(二)

杨先生的生活是很严谨、很简朴，也是很特殊的。当他来到商专的时候，学校为他做了一个很深的腰圆形的大木盆，放在他住室的外边，可以装二十担水。我们看到很不理解，就去问汤校长，这是做什么用的？汤校长说：“杨先生最注重身体的锻炼和卫生，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天天要用冷水洗澡，不怕落雪下凌，也不间断。他特嘱预备这一大木盆，以便每天洗个游泳式的冷水澡。”后来杨先生在和我们课余谈话时，经常说到洗冷水澡的好处，最主要的是能加强皮肤的抵抗力，预防伤风感冒。还有一种作用，是可以锻炼坚强的性格。他鼓励我们向他学习，坚持不懈。后来毛主席和第一师范及商专的很多同学，都锻炼用冷水沐浴，不问寒暑，就是受到了杨先生的启示。杨先生还提倡长途步行和劳动，对青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

杨先生勤学不倦的精神，是青年学生的最好榜样。他所住的房间，除了卧铺以外，桌上、凳上，通通摆的是书，古典的线装书和外文的洋装书，随处杂陈。他在讲课的余暇，从不参加无谓的应酬，总坐在桌中打圈圈，想看什么书，就拿什么书。我们进去问课的时候，总看见他手执一卷，好象时时都在图书室里一样。晚间写读书笔记，经常到深夜。杨先生不仅对英文和日文有深刻的钻研，对中国的经学与史学，更有深奥的造诣。他以“寄迹”

与“博览”，作为治学的方法，做到了融合中西，贯通今古。虽也推崇儒家的学说，但能突破封建思想的框框。曾记得他在讲课时，对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认为是求学和做人的规则。但坚决反对把穿长衫的所谓“士大夫”，誉为“君子”，将穿短衣的劳动者，称作“小人”。从而主张“劳工神圣”，要彻底消除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谬误观点。他启发学生对东方文化的吸收，必须采取严格的批判态度，撇其精华，去其糟粕。

(四)

对于中国的古琴学，杨先生富有研究的兴趣。他认为中国古代七弦琴的特点很多，最主要的有下列几种：一、七弦琴在世界音乐中发明最早，具有崇高的评价和悠久的历史。二、后来中西用手指弹奏的丝弦乐器，都是渊源于七弦琴，而逐渐演变仿制的。三、七弦琴悠扬的乐曲，可以陶冶性情，高亢的音调，可以激发志气，技艺精深的，还可以从弹曲中，表现特殊的思想感情，乐理中寓有哲理。四、熟练弹七弦琴的指法，再学习其它中西丝弦乐器，都容易运指自如。因此，应提倡继续发扬光大，而不能任其失传。解放前，长沙文庙祀孔时，必须聘请浏阳的古乐专家，演奏古乐。当杨先生于一九一七年上期，来高专讲学，就由校中特聘浏阳古乐名家邱谷住到校，充古琴学教师。除他自己和邱谷住相对研究弹琴，钻研有关古琴学史的资料外，并在学校专列古琴一科，作为一门正式功课记分，因之弹琴在商专蔚为一种风气。杨先生并精于弹琴，回忆听他弹奏“出塞曲”，很清晰地弹出一个一个马蹄落地的声音，犹如万马奔腾，直奔杀敌，令听者如置身战场，顿时鼓动了雄心壮志。再如弹“平沙落雁”一曲，好象数千

百只瓶子，从万里晴空，扑扑地飞落沙洲，弹到暴雨狂风，就如冲击屋瓦，震撼山林。弹到最低的音调，几乎听不出声息，只觉心弦震荡，悠然神往。杨先生倡导古乐，确有保存国粹的价值，他的这种作风，使我至今难忘。

(五)

要精通专门的学问和技能，必须将书本上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这是杨先生经常对学生的训示，也就是杨先生教学的主旨。他所给排的功课，上半日是按照课表上课，下半日完全是实习。实行的方法，是假设一个银行或一个公司，分课做事，如同现实的银行或公司一样，所有办公桌椅等的布置，都由学生自己动手。按日互相轮值，练习做会计、出纳等各项业务，并书面汇报实习的心得。如不做实习时，即每人在教室内做一篇英文的订货合同，或是一封致某公司购买物件的英文信，或是做一份英文的公司广告。这样，我们的学习都能得到实际的收获，而毫不感觉枯燥。

(六)

杨先生所编订的功课，除上课以外，主张触类旁通，多阅读课外的书籍，他号召我们多去图书室读书。上课时图书室关门了，下课时无论早晚，图书室都是开放的，架上的书，可以随意取看。他说，要做到学生在图书室，如同在他自己房里看书一样。他还经常到图书室引导学生阅读，要学生每人准备一本读书笔记，将不了解的疑点写上，向他提出问题，他可以随时解答。同学们受到杨先生好学深思精神的感染，进到图书室，都异常勤学，从未听到一点嘈杂的声音，读书的风气，特别浓厚。就是在星期日，

大多数的同学，也都在图书室阅览书报，很少出校外闲荡的。

(七)

每个青年对任何问题，都要能够独立思考，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和远大的理想，终身奋斗，为社会的事業，及国家的前途，竭尽一番责任，绝对不可只为个人打算。这段话，杨先生除经常在课堂向学生阐释外，并于每周星期六晚上，集合全校甲乙两班的同学（当时商专只办有两班，约共八十余人），开个同乐晚会，学校备有茶点招待。同学们可以对坐畅谈，互相讨论将来立志要做的事业，社会革命的问题，及以后怎样求得深造的准备。当时在商专的同学中，有研究各种主义与学说的书籍，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在同乐晚会的讨论中，有时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将装点心的盘子，也打得稀烂。第二天向杨先生诉说，杨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风气，一笑置之。

(八)

杨先生学贯中西，非常渊博。记得有一次，商专为迎接一位教授举行欢迎会，杨先生在欢迎会上演说时，介绍外国人入中国和中国人去外国的情况，从张骞说起，一气列举了二十余人。杨先生在教室讲课的时候，常常围绕着一个主题，旁征博引古今中外一切有关的历史事实，作为考证，说得滔滔不绝，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得津津有味。杨先生除在教课的时间以外，学生随时都可到他房中去质疑回难，他与学生经常打成一片。谈到文学，即拿文学书示范，谈到哲学，即详述有关的理论。记得有一次，我请教杨先生关于诗的格律问题，他从“诗经”、“楚词”一直讲到唐宋的绝律，历举诗体的演变，以及古韵与今韵的区别，

常详尽。还记得有一次，有位同学请杨先生分析西洋哲学的派别，他由康德、黑格尔谈到斯宾塞尔的“道德原理”及达尔文的“进化论”、勾元提要，具体介绍了各派的特征以及“唯心”与“唯物”的异同。有时研讨学习古琴，便即邀请邱老师弹奏一曲，并指点如何用指，怎样谱曲，从实践中来证实理论，大家都非常感到兴趣。

(九)

一贯用启发式的教育，处处指导学生自动学习，这是杨先生教学的主要方法。在学生中如有不愿读商品学的，即可改学其它的科目。对于个人的思想，完全可以敞开谈论。只要学生爱谈什么，他就乐意和你谈什么。尤其是对革命的观点，绝对不采取主观的态度，任何主义都可讨论。就是抨击当时反动统治的贪污腐化或揭发封建社会的罪恶，皆可以畅所欲言。因此，很多同学都受到他房间里去，自由发表意见，而获得杨先生的正确指导，常常谈到吃饭或夜深的时候，还不想出房门。杨先生诲人不倦的精神，在一般教师中是突出的。他不仅热爱和青年学生在一起，并能够识拔勤奋向学、志大才高、发奋有为的青年人才。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肄业时，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他经常介绍给商专的同学，赞扬毛泽东同志刻苦自励的勤学精神及所作文章的内容，具有改造社会的伟大抱负，和对问题的精深观察，是青年学习的模范。后来他的女儿杨开慧和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一年在长沙结婚。记得杨先生早年曾在黑板上写过这样的两句诗：“可有风雷惊宇宙，欲栽大木柱长天。”这是他生前的愿望。

(十)

旧社会对于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是杨先生最愤恨的。曾忆

有一次，他在学生的集会上演说，讲述在海滨盐厂做盐的工人，生活极为痛苦，无论下雪落雨，每天都在水深数尺的盐田里工作，每人每年仅吃到三几块钱的咸菜，就是萝卜上市的时候，买两三元萝卜，放在盐内，每餐即以咸萝卜送饭，从未吃过其它的蔬菜。盐的成本，每担只花两元，政府卖出，每担达到二十元，其剥削之重，骇人听闻。讲到盐工的痛苦时，同学们皆为之泪下。所以“五四运动”爆发后，商专的同学，大部分都参加了学生运动和初期革命的组织。

杨先生于一九一八年下期去北京，应北京大学之聘，担任伦理学教授，至一九一九年下期，因病住西山卧佛寺养病。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七日逝世。遗著有《论语类钞》、《达化斋读书录》。长沙李肖聃悼唁杨先生文中，有这样的几句话：“好学之笃，立志之坚，诲人之勤，堪为师表”，确系定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唐锦章记）

我们所知道的杨度

杨友鸾 杨友鸿

杨友龙 杨友麒

杨度，名哲子，湖南湘潭县人，是我们的祖父。作为杨度的孙儿女，我们对他的事迹知道得太少。这里写的点滴资料，部分是从家父杨公庶口中听到的，部分是其他同志提供的，或家叔祖父等记载的。拉杂写出，仅供参考。

清末，庚子之乱以后，民众奋起要求废除八股，推行新政，清廷被迫举办经济特科考试。杨度、梁士诒都入京应试，成绩特别优异。但满人庆宽逢迎西太后，说：“这次新旧派人物掺杂，梁士诒就是梁启超家人，不可不防。”（据梁启超后代云，梁士诒与梁启超根本无关系，更不是一家人）。于是，考试草草收场，梁士诒与杨度均落第。且非止于此，还要把杨度也作为新派余党而诱捕。杨度得知此事后，乃身着和服，化装逃往日本。因此，他不仅亲眼见到清朝统治集团祸国殃民，卖国求荣，使国家民族濒于覆灭的边缘，而且切身感受到政治上的迫害，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国外。他是怀着一定要把中国从腐败的清政权统治下挽救出来的决心，流亡到日本去的。这种救国家民族于危亡的思想，在他的早期作品《湖南少年歌》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他还作过一首《黄河歌》，被编为中学音乐教材。歌词是这样的：“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

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马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听歌凯旋。”当时有不少反抗清朝政权的仁人志士都聚集在日本，议论救国之策。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时，曾与杨度长谈数日，并邀他参加酝酿中的同盟会。但杨度觉得中山先生的想法与自己的不同，却与同乡黄兴的救国之道很相似。因此，就将黄兴介绍与中山先生相识。嗣后，黄兴一直在中山先生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成为亲密战友。

杨度在日本时，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家日益强盛，成为世界列强之一。他当时拿中国的情况与日本对比，产生了要在政治上统一强大，经济上进化发达，就必须走日本君主立宪、大兴实业的道路的想法。回国后，他看到疮痍满目，民不聊生，清政权已腐败到了无法收拾的局面，就更加坚定了他对君主立宪、实业救国的信心。他很想推举一个有“权威”的政界人物做皇帝，把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统一起来，以实行改革，发展实业，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为此，他把两个儿子（杨公庶、杨公兆）都送往工业先进的德国学习科学技术，期望他们学成归国后，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直接出把力。杨度本人则认为中国在当时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只有袁世凯还有足够的实力统一天下，因而力促袁世凯复辟称帝。他积极地为实现君主立宪而大造舆论，成为当时有名的保皇组织“筹安会”六君子中的第一名。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反动派相勾结，争地盘，打内战，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受到了残酷的镇压。这一切事实，使杨度亲身体会到了自己的救国之道是行不通的。救国的理想被无情的历史所粉碎后，他寻不到真理，看不到中国的出路何在，一度情绪消沉，曾自称“虎

头禅师”，研究起佛学来，著有《虎头禅师诗集》问世。

在此时期，他与湖南同乡中的地下党员有接触，开始接受到马列主义的教育，对如何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彻底地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有了新的认识，就象在茫茫的黑夜中，见到了光明的灯塔。他总结了自己大半生的痛苦经历，决心选择这条艰险的新生之路，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因而能在白色恐怖下，经地下党的指引，由敬爱的周总理介绍，置个人生死及家庭安危于不顾，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杨度自日本回国后，活跃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对那个历史时期中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都有些来往。这也是他晚年能为中共地下党做点工作的有利之处。有一天晚上，他在汪大燮家赴宴，席间听说由荷兰公使建议，各帝国主义已与北洋军阀达成协议，同意北洋军阀进入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去逮捕为当时的苏联公使所保护的中国共产党人。杨度连夜将此紧急情况告知地下党联系人胡省三，因而使许多共产党员都及早转移了，免遭反动派之捕害。同时，杨度还派长子公庶去东交民巷使馆区查看情况，探听虚实。杨公庶去时，只见军警林立，气氛森严，帝国主义果然已和军阀勾结起来向中国共产党人下毒手了。沿着苏联公使馆围墙下，停放了一些人力车，其实都是便衣特务，准备抓捕从使馆内逃出的共产党人。但由于李大钊同志已于事先得知消息，设法转移了全部地下工作人员，而他自己知道反动派早已在使馆区周围布满了密探，无法脱身了，就在这次不幸被捕，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牺牲。

此后，杨度将家搬往上海。他那时以作杜月笙的幕僚为掩护，靠卖字为生，家里全部值钱之物都变卖了，交了党费。当时中国

共产党的地下刊物《红旗》二字就是杨度写的。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就是在他临终前，在没有得到地下党的许可下，也没有向他的任何亲人暴露过自己的身份。只对儿女们说：“以后任何时候都不能反对共产党。”杨度逝世时，中共中央曾秘密送了一个花圈，家人始知祖父生前曾与中国共产党有过联系，但并不知他本人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解放后，家父母曾听章士钊说过，他在解放区见到毛主席，谈及湖南近代知名人士提到杨度时，毛主席曾说：“杨度也是我们的人啊！”

家父杨公庶不幸于今年七月病故。去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有几位同志来采访他，搜集有关杨度的资料。当时家父曾与他们谈了整整一上午。因此，一些较详细的资料，近代史研究所是应该有记录可查的。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朱师晦的《癸卯日记》

朱鹤皋

最近，周治平同志给我送来一本湘潭人朱葵（师晦）写的《癸卯日记》，并说这本日记是去年暑假在长沙市三中图书室清理古旧书籍时，无意中发现的。我认为，其中有些记载，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有价值的罕见史料。现在分述如下：

（一）这本日记系朱师晦于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农历二月初一到三月初一整一个月的记事。所记为从长沙启程赴日本留学，经上海乘海轮到东京的一段经历。原记月日均系农历，今附注公历，以备查考。

日记将首载：“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为日本之行，屏挡家事，检点行装，朝勤而暮不休，一食犹三起焉！同行者为家弟鲤庭（德葵）、姻家弟张竹谿（潜六）、吴子昂（家驹）、子骏（家骏）、梁和甫（煥均）、顾甫（煥庭）、范穆生（大备）、黄稚彝（筠恺）、王文郁（代懿）、李佩君（佩）、胡彦适（秉适）、罗子明（宜照）、杨仲子（政），以上湘潭十四人，长沙一人，为杨华生（昌济）。新化三人，为刘耕石（頌庭）、王俊声（儒宪）、陈子美（家璜）。湘阴侯蕙存（武垣），宁乡廖允升（承昭），……湘乡二人，陈玉林（尔弼）、萧澹竹（仲祁）。安化一人，陶叔晦（思曾）。宝庆府三人，为邵昭石潜六（陶钧）、为新化曹凤冈（继祖）、陈星台（天华）。岳州府为巴陵吴森初（友炎）、森初之弟友松。常德府为武陵戴豹珍（修礼）。辰州府为

溆浦舒子彝(和钧)。沅州府为芷江廖笏堂(名缙)。常德府自备生一人，为龙阳俞(余)松云(焕东)。衡州府自备生一人，为衡山刘铃生(揆一)。”这次赴日留学者共三十五人，其中近代史上知名人士有杨昌济、仇蕴存、萧仲祁、石醉六、曾继哲、陈天华、廖名缙、余焕东、刘揆一。仇蕴存后易名仇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部军衡司长。一九一五年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杀害于北京。

近阅《六十年的我》(石醉六先生自述)，有一段相关的叙述，可资印证。石醉六是这次赴日留学同行者之一，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毕业，加入了同盟会。他在《六十年的我》中，对于一九〇三年春赴日留学，有如下的叙述：“……这次东行，同伴三十余人，年龄大的如杨昌济，将近四十岁；小的如梁焕廷，不过十二岁。到了东京，都在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学生所特设的弘文学院住下来，受预备功课一连几个月”。“陈天华(他因满面天花痕，故自名天华)是此次东行同伴中，感受风气最深之一人。他因口吃，半年还不能说一句倭语。也正因如此，他的工作全用在写《敬告湖南人》、《混沌国》、《猛回头》、《黄帝魂》一类的小册子上。”按：《黄帝魂》的作者并不是陈天华。这本书的编辑者号为“黄帝子孙之一个人”据章士钊考证，为长沙人黄藻，字菊人^①。

(二)日记记有在长沙钱行时杨度(哲子)的一席话：

二十四日(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席少保祠大会宾客。是日为黄策翁、罗训翁、俞稚翁、胡子翁、周印翁辈十六人钱行公局。酒数行，同县杨哲子孝廉出席演说，其言曰：“今日大饗会，诸君，诸君亦知此饗会为寻常之饗会乎？盖特别之饗会也。今日之饗会，为诸

① 章士钊，《疏(黄帝魂)》，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

君立一纪念碑耳。诸君卒業归国时，湖南无恙，此席少保祠无恙，同席诸君无恙，则中国幸甚！虽然，未敢必也。自甲申至甲午，十年一大变；自甲午至今日，未十年经三大变。甲午割台湾，赔二百兆；戊戌割胶州湾，割旅顺口、大连湾，割威海卫，庚子之变，京师陷没，两宫西狩，立新约数百条，赔兵费四百五十兆，仅乃回銮。甲午以后，西人日言瓜分中国，绘图设色，遍传五洲。庚子以来，西人见拳匪尚有国民性质，知中国未易骤亡也。必先亡其政，亡其教，亡其财，然后亡其国。政亡教亡财亡，国亦随之亡矣。此灭国之新法然也。于是，前之瓜分主义，一变而为保全主义。诸君，诸君，亦知保全为无形之瓜分乎？亦知施行瓜分政策为无有愈于保全者乎？譬之犬马，其豢养之而保全之者，僮仆也。其足以制其死命者，亦僮仆也。譬之奴隶，其豢养之而保全之者，主人也。其足以制其死命者，亦主人也。使犬有噬人之凶，马具不羁之性，奴隶能自食其力，则主人与僮仆其势力不足以范围之，何死命之足制焉！夫西人何爱于中国而欲保全之？中国而听其保全也，则命悬于西人之手矣。羊豕同牢，随时宰割，微乎危！夫中国之亡，甚于累卵。诸君，诸君，独且奈何哉！且粤西势亦警矣，粤西之匪，虽不足言革命军，充其力量亦足以乱中国。彼时西人以剿匪为名，收其土地，实行瓜分政策，诸君，诸君，其谓之何？吾敢为诸君一言以蔽之曰：勉强学问而已。昔者，法之蹶于普也，毛奇指学生而言曰：今日之功，学生之力也。夫以如锦如荼之军，沐日浴月之业，毛奇不自有，不归功于他人，而归功于学生，

然则学生之足以左右世界也明矣。诸君，诸君，离乡井，辞父母，弃妻子，出国门而东，其富于国民思想也，不待问可知也，是仆辈所东望顶礼者也。然则诸君之竭其材力聪明，讲求科学，以新吾中国，救吾中国者，其主义当早自定之，无待仆言。以度之顽愚，更不知所言。然而不能已于言者，以度一得之愚，为人群谋公益，而诸君者，又度所东望顶礼者也，度又何能已于言。科学之中，以自然科学为要。自然科学者，科学之大乘也。夫不能为自然科学，则一切种种，皆留声机器耳。度敢为诸君谋。自然科学，则个人学问、团体利益是也。无个人，无团体；无团体，无个人。此又诸君自知之，无俟度言。度敢为诸君进一义曰：不为团体谋公益，则个人学问何足贵哉！是则度所东望顶礼，不能不有厚望于诸君者耳。言毕，鞠躬而退。”

又，二月初八(三月六日)条有关于杨度的记载，“阅《支那教育问题》，此杨度与嘉纳问答之词，至为透辟。怀中先生推许备至。”

(三)日记记录了二月初十(三月八日)杨怀中先生登岳阳楼题壁五律一首，朱师晦誉为同行者中所作诗之“绝佳”者。诗云：

大地龙争日，英雄虎变时。

苍凉万里感，浩荡百年思。

日月自光曜，江山孰主持？

登楼一凭眺，此意竟谁知！

杨怀中先生这首诗，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我也没有见人引用过。这次偶然在一本旧日记中发现，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朱师晦自己也有登岳阳楼题壁七绝一首，颇佳。诗云：

与君携手登楼日，正是长歌去国时。

歌到北门门外柳，春风二月绿丝丝。

(四)日记中好些天记有朱师晦在旅途中向杨怀中先生请教受益，如：“与杨华生讲求东文字母，颇有所悟”(二月初六)，“与怀中即华生先生讲求西文字母”(二月初七)，“与怀中先生讲求文字”(二月初八)，“与怀中先生讲求西文”(二月初九)，“与怀中先生讲求拼音之法”(二月初十)，“往与怀中谈学，甚畅。约在东京除上课堂外，以译书为私课。”(二月十四)，“与怀老习英文课”，“怀老规余以二字，曰：久，敬。甚哉！此老之爱我以德也。”(二月十七)，又记有杨怀中先生论学一条，朱师晦称其“笃信好学”，“论积份之理，尤为精绝”。读此，可见杨怀中先生当时已于东西方文字之学造诣极深，确属同行人之佼佼者，受到尊敬是必然的。

回忆一九一六年前后，我与杨开智同志在长沙雅礼中学为同班同学，因而常有机会见到怀中先生，亲聆教诲。今天看到这部旧日记，想起六十多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使我萦回于怀，不能自己！

(五)朱师晦在日记卷首同行人名单中称“杨华生昌济”，二月初六(是日发三汊矶至樟树港)仍称“杨华生”，初七(是日泊乔口)称“怀中即华生先生”。自此以后皆称“怀中”。可见杨昌济先生于离乡赴日留学时，十分怀念祖国，故改华生名为怀中。此一资料，极可重视。

关于朱师晦的生平事迹，我一无所知。承马文仁先生惠告：“辛亥革命前，湘潭一般旧思想的人鄙视闹新思想的人。那时有易殿楼、曹基及朱师晦三个人，都富于新思想，一般思想顽固的人讽刺他们，呼之为‘一槽猪’，实为可笑。三人之中，朱的文学突

出，又曾留学日本，因而最闻名。他曾写过一本几万字的《中国魂》，内容大意谓中国地大物博，力量无穷，但不能因循守旧，非实行革命，改弦更张不可。辛亥革命后，他在长沙、北京一带活动时间多。晚年由北京回湘潭居住，于解放前去世。”马老所说的“曹某”，我知道是曹典植，别号衲安。他一贯主张男女读书平等，反对重男轻女，反对女子缠足，在湘潭曾创办女子师范、女子职业学校。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柳直荀烈士在湖南

李淑一

直荀牺牲于一九三二年九月，离开人间已四十七年了。直荀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一生，但却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凡是和他相处过的同志，都对他有无限的怀念。

直荀从学生时代起，就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受到革命的教育，经常参加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在杨怀中先生家的聚会，讨论治学、做人的道理，评述天下大事，探求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

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运动的风暴很快席卷全国。消息传到湖南，直荀和各校进步同学在毛泽东同志和新民学会的推动下，走出课堂，奔走呼号，号召各界同胞投入反帝爱国斗争。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直荀是省学联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学联的组织领导下，长沙各校成立了几十个讲演团，广泛进行爱国宣传。并进一步开展了“救国十人团”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在驱张运动中，直荀同志等雅礼同学举办的《救国周刊》最早揭露了张敬尧出卖湖南第一纱厂的罪行。

一九二〇年，直荀考入雅礼大学，我和杨开慧在湘湖女中读书，形影不离，相处极好。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我们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运动，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一九二三年，日本军舰“伏见号”水兵枪杀长沙工人王昭元和小学生黄汉卿的“六一惨案”发生后，直荀和郭亮等同志一起组织指挥了著名的抬尸游行。外交后援会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罢工、罢市、罢课，迫使赵恒惕同意对日交涉的八项条件。就在这一年，直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常到小吴门外清水塘访问毛泽东同志。

一九二四年在雅礼大学毕业前，直荀和同学陈纯粹、李至哲等创办了协均中学。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杨东莼同志，当时也在协均教课。直荀一边担任校长，主持教务，一边开展革命斗争。这年，在开慧的关怀和帮助下，我摆脱了家庭的封建束缚，同直荀结了婚。婚后，党内同志常来家密谈，有时终夜不去，谈个通宵。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十分愤慨。直荀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并直接参加“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的工作。这年底，长沙各界人民掀起收回日本帝国主义租用的大金码头的斗争，直荀又是组织领导者之一。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湖南后，成立湖南省政府。直荀被任为省政府委员，并当选为省农民协会筹备会秘书长，积极进行接收团防局，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等斗争。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召开，毛泽东同志从武汉到长沙参加大会，作了重要讲话。他精辟地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严厉驳斥了各种对工农运动的污蔑。在这次大会上，直荀正式当选为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在农协的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推进到一个广泛深入发展的新阶段。这年十一月九日，我生了晓昂。直荀参加秘密会议，深夜始归，第二天生一男孩，高兴地说：“好了，你有了安慰了！”他舍小家为大家，无

时不在准备献身革命。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湖南的反革命分子遥相呼应。他们张贴反动标语，杀害农会干部，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打击反革命气焰，直荀和省工会、省农协等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决定，逮捕并镇压了全国闻名的大劣绅叶德辉，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为了对付反革命的进攻，直荀坚决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积极创办工农自卫军训练班，训练自卫军干部，同时成立省农民自卫总队。五月十九日，他叫我准备搬家，因为情势越来越紧张了。次日上午，我搬回顺星桥父亲的住所。当天下午，他来和我告别。想不到这一次见面后，我就和他永诀了。

五月二十一日夜，在何键的唆使下，许克祥率一千多人叛变（“马日事变”），向省市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特别法庭等机关进攻。直荀临危不惧，沉着地组织反击，他设法找到郭亮同志，商定以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的名义，通知长沙周围各县，迅即组织工农武装，并在湘潭建立了农军总指挥部。在郭亮、直荀等同志的领导下，十多万武装工农大军，浩浩荡荡向长沙进军。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壮举，虽被陈独秀的“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的命令中途断绝了，但是它以共产党人领导农民进行大规模武装起义的英勇尝试而光荣地载入史册。

直荀离开湖南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此后被党派在上海、南京、沈阳、天津、北京及河南、湖北各地从事革命工作。一九二九年，他由天津来信说，无家眷不便租住房屋，希望我能到天津去。随后又由他的弟弟转寄我一张相片，上题：“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发觉了，将我逮捕下狱，

后经双方家长极力营救，才得以交保开释。从这以后，直荀和我就再无联系了。

解放后，经过谢觉哉等同志介绍，才知道他确实是在洪湖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杀害了。一九五七年国务院为了纪念湘鄂西人民的伟大功绩和悼念英勇牺牲的烈士，建立洪湖革命烈士纪念碑，提名悼念了直荀等二十五位先烈。毛泽东同志对直荀的牺牲寄予了无限的哀悼与高度的颂扬，写下了著名的光辉词章“蝶恋花”。

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前夕，特写下这篇短文，以表深切的悼念。

一九七九年四月于北京。

回忆柳直荀同学

袁鹤皋

柳直荀烈士在洪湖革命根据地牺牲四十七年了。作为他的青年时代的同学、同事，我总想写点东西寄托自己的哀思。但是年老记忆力差，许多事情依稀仿佛，记不起了；现在就记得起的写出来，借此了却一个心愿。

（一）

柳直荀，又名柳克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十一月初三）出生于长沙县东乡高桥方塘冲。方塘冲邻近平江县境，离长沙百多里，是个山青水秀、风俗淳朴的农村。

直荀的祖父柳正荣，是个读书人，旧学很有根底，曾在乡里的蒙童馆教书多年。直荀幼时随侍在侧，得到教育。

父亲柳午亭，名大謐。清末与杨怀中同时留学日本，交往密切，回国后长期在教育界工作，对子女管教很严。解放后，受聘为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病故于长沙。

直荀幼时在家里发蒙读书，接受能力很强。由于家境并不宽裕，有时还得上山下田参加整土锄草之类的辅助劳动。但是毕竟是个读书人家子弟，乡里人叫他“明少爷”。后来进了长沙广益中

学读书，同学们叫他“柳长子”。

一九一六年秋，直荀由广益中学转到雅礼大学预科。当时雅礼按甲乙丙丁戊分为五个班，甲班就是大学一年级。直荀编在戊班，我和他一度同班同学，这是我们最初的相识。

雅礼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学会办的学校，同其他教会学校一样，规定学生要读《新旧约全书》，做礼拜。直荀在这里读书，却一直不信教，他也不信神，我听到跟他进城的农民说过：“明少爷一切都好，就是一桩事不好：读了洋书把家里的门神、灶神都取消了。”有一次，雅礼同学雷强约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到湘雅医院院长颜福庆家开茶话会，到会的还有直荀和张维。颜福庆的女儿颜雅清带着她的弟弟唱了歌以后，才开始漫谈。雷强谈到基督教的精神时，说：“上帝信则有，不信则无，我是信上帝的，喜欢基督教。”直荀反驳说：“有则信，无则不信，我就不信有上帝。”他从不到城里各教会的礼拜堂做礼拜。同学们读《圣经》课时，他看《新青年》或其他进步书籍。有时在自习时间看，熄灯以后，又在路灯下看。《新青年》成了他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有时外出，也把一本《新青年》卷在袖子里，真可谓爱不释手。常到潮宗街文化书社陈显庄处借阅进步书刊。在直荀的影响下，同班同学和同寝室同学争看进步书籍，蔚为风气。他这样刻苦学习，追求真理，则是由于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他很早就结识了毛泽东同志，在一起从事学术讨论和社会活动。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

(二)

直荀最初转学到雅礼时，我记得他的身体还是比较瘦弱的，而且多病。但是，他有坚强的毅力，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起

后，他总是用冷水洗澡，无论寒暑，从不间断。即使是在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的时候，他还是洗他的冷水澡，因而闻名全校。我有一段时间跟他一样洗冷水澡，借此锻炼身体，但是我没有他那样的恒心，感到有些勉强，不能坚持下去。我也跟他在操场跑道上跑过圈子，其他同学跟他跑的还多着，大家感到对身体的锻炼确实有益。

直荀还有一个锻炼身体的方法，就是睡在学生东寝室二楼外面的阳台上，多年没有间断过。当时同他经常一起睡过阳台上的，还有我和杨定安、陈预芬，可是我们虽同在一起经历了几个寒暑，但并没有一直坚持下去。

直荀跟父亲学过体操和拳术，从多方面注意身体的锻炼。在几年之中，慢慢地由初来时的文弱书生，转变成成为爱好体育的活动分子。他在雅礼大学时，同学们选举他当体育会长。我那时是篮球队长，和他接触多。他办事认真，很有组织能力，无论是球类、田径、拳术、体操、游泳等等，都搞得很活跃。早晨有早操，上午有课间操，每天下课以后，还有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直荀规定把教室自习室的门锁上，寝室不开门，强迫同学到操坪球场活动，锻炼身体。雅礼体育运动的普及，是和直荀的努力分不开的。

后来同学选我担任体育会长，我不愿干，直荀对我说，体育锻炼很重要，鼓励我大胆干下去，不要怕困难。他自己喜欢的是拳术和游泳。当时学生组织了三个游泳队，由直荀、谭伟和我分任队长，每逢星期二、五下午，整队到新河去游泳，参加这项活动的有五六十人，会游泳的和刚学的各占半数，最后都能游过新河了。

(三)

直荀无论在校内校外，都喜欢与劳动人民接近。学校里的工友，都很亲近他。

有一次晚自习时，几个江西工友在我们自修室旁边工人住的小屋侧树下煮狗肉和蛇肉吃。他们自己吃，也卖给同学们，每碗十枚铜元。直荀那时是雅礼学生会会长，他也碰上了，站在旁边看，和工人们谈话。一个姓王的江西工友说：“柳会长吃一碗，不算钱！”另一个工友说：“柳会长是学生少爷，怎会吃我们煮的东西！”直荀就站在树底下同他们讲了一阵话，直到打就寝铃还没离开。他对工友们说：“工人、学生都是人，你们吃得的我也吃得，有什么不同呢？”

直荀和学校里的工友们相处得很好。每逢星期五、六晚间，就主动地去教他们学文化，谈时事，讲故事。厨房里的工友也常来参加，直荀要我教他们的笔算和打算盘，他自己教他们写信、看地图。直荀不顾自己身体的疲劳，总是想方设法满足工友们强烈的求知渴望。有一次，挑粪工友周思山听直荀讲美国是在我们的脚下，就说：“我不信。”第二天，直荀从地理教师那里借来一架地球仪，指着它讲解一遍。周思山说：“我本来不信的，这样说我就信了。”这些寻常的事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当年工友们学文化的地点，在东寝室外面的洗衣室，或在工友的寝室里。有时人数到得多，就在学生食堂。学习的时间没有一定，一般是星期五六晚上或星期天下午。学习内容包括记帐打算盘、习字、讲故事、讲时事。教师也没有一定，直荀花费的时间精力最多。我经常看到他一群工友围绕在一起热情地谈话，对工友们提出的问题，总是耐心解答，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

担任数学教员，是他邀去的。

雅礼学生会和基督教青年会在北门外文昌阁大学宿舍创联合主办了儿童识字班和工友识字班，不收学费，发给书纸课本。直苟是识字班最认真负责的教师之一。他从不缺课，我教识字班的算术，经常看见学生拉着他的手问这问那，他有问必答，从不厌烦。

虽然在文昌阁办了成人和儿童识字班，占去直苟一些时间，但他跟学校里的工友仍是经常接触，工友们乐于向他问疑难，谈家常，他利用各种机会向工友们灌输一些新知识。

有一次，洗衣工友唐老馆问直苟：“外国人到中国来，自己拿出钱来起房屋办学校，办医院，办教堂传耶稣教，他们为什么这样好，要这样做呢？”当时，直苟要他们自己想一想，说一说。有人说：“外国人有钱。”有人说：“外国人喜欢做好事。”有的说：“这是宣扬基督精神，劝人为善。”有的说是“讲和平博爱”，如此等等。但是有少数几个人反对这种说法。这时，唐老馆自己说：“外国人拿这样多的钱来中国办学校，办医院，还送药把没有钱的人吃。我曾看见过这样好的人，我想他肯定没有好心眼。总有他们的打算。”打扫教室的工友、湘潭籍有人接着说：“外国传教的外国人恶狠狠的。我看见湘潭富安县富安镇的人民不信天主教，外国传教收师总是带不讲理打人的兵。”我问传教的外国人不是劝人为善，而是教人为恶。”王友说：“我见帮教外国人到教室上课的，翻译人（特尔辉）因为我的课没有带笔给他，就骂我恶我。外国人有学校，有些看我们工人……有些只看得起教徒，他们并不平等。”直苟听了他们争辩后，肯定了唐老馆等人的想法和见解。直苟用湖南话告诉外国人借办学校办医院传教搞文化侵略，云云。直苟又告诉很多。我们要提高警惕，

不要上当。

(四)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长沙各学校虽没有立即公开响应，但是暗中进行很激烈，有山雨欲来之势。张敬尧以督军兼省长身份发出布告，胡说“我国与日本同属友邦”，为北京卖国政府进行无耻辩护，告诫各校学生“安心向学，蔚为国材，不得妄干政治，废时荒学”。随后又召集各校校长开会，要校长告诫学生“力持镇静”，不准罢课，企图消灭学生群众的反日爱国运动。

在毛泽东同志的组织和领导下，省学联不听张敬尧这一套，发动各学校进行罢课斗争。雅礼、明德、岳云、长郡、周南等校都罢了课，参加游行示威。先天晚上，学监王海环同学校当局商定，不准学生参加示威游行，说什么“雅礼是外国人办的学校，学联管不着！”柳直荀从省学联开会回来，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召集学生会干事开会商讨对策。决定由各班干事通知同学，第二天上午开始罢课，准时参加，整队出校门。

六月三日上午，当学生队伍走出校门时，王海环站在校门口威胁学生，说：“谁不去读书，我就开除你！”直荀义愤填膺，对王海环严词驳斥：“我们今天罢课，是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当亡国奴。如果不斗争，岂止是开除学籍，我们就要当亡国奴了。”说罢，领着同学们一排排昂首挺胸地走出校门，王海环瞠目结舌，束手无策。

长沙各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后，随即展开各项爱国宣传活动。六月五日，湘雅、雅礼、明德、岳云、长郡、周南等校学生组织“救国十人团”，发起爱国储金运动，学生们减餐捐款，成立“十

人储金会”，从经济上积蓄力量进行反日爱国斗争。在学生会的发起和领导下，雅礼组织了二十多个“救国十人团”，各班都有，老师、工友也有参加的。并组织演讲团，到校外宣传“毋忘国耻”、“收复青岛”、“抵制日货”，唤醒市民群众，奋起救亡图存。

到七月下旬，省会各界共成立了“救国十人团”四百多个，其中各学校成立的有二百五十多个。在这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直荀被选为该会的副总干事。

“救国十人团”的主要任务是调查抵制日货，宣传雪耻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

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直荀和学生们来到了一家百货店，这家店子名义上是“国货号”，实际上仍在贩卖日货。他了解到这个情况，就组织了一伙学生来检查，发现了日本出产的搪瓷脸盆，他随手拿起一只，斥责老板阳奉阴违的行为，并要老板拿出全部日货当众销毁。老板爱财如命，死也不肯，说什么：“买卖人只管买卖，日货不日货，爱国不爱国，管不得那么多！”直荀看到这个奸商不服教育，气极了，说，“你们不管我们管；你不爱国，我们爱国！”说罢飞起一脚，把那只脸盆踢到街上去了。跟随前来的学生跑上去踩了几脚，脸盆凹下去了，白瓷片落了一地。接着又发现一批日本香粉，直荀又随手拿了几瓶丢了出去，香粉散了一地。

当时学联决定，组织各校学生救国宣传队，到乡下宣传反日救国。雅礼的宣传队是直荀为首组织的，他自己也带领一队到长沙东乡一带去宣传。我班几十个同学，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靖港、铜官、沱市、益阳等地进行宣传，群众反应很好。

(五)

在雅礼半 期间，直荀就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参加了学

生驱张运动。张敬尧担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纵兵殃民，直接掠夺，又借口整顿金融和实业，以各种方法进行搜括，饱其私囊。设在长沙银盆岭的第一纱厂，是当时湖南一个农商合办的企业，因连年军阀混战，一直没有修好开工。张敬尧丧心病狂，企图全部变卖，大发横财。

直荀得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慨，便在雅礼出版的《救国周刊》把这件事揭发出来，号召湖南人民起来反对张敬尧的盗卖纱厂行为。当时，全省学联以及湘雅、明德等校学生，到处演讲发传单，揭发张敬尧的祸湘罪恶。在各界人士及广大人民群众们的激烈反对下，才制止了张敬尧的盗卖活动。

《救国周刊》是雅礼学生会出版的刊物，由直荀担任总经理，各班都有同学担任经理员。记得直荀告诉过我，《救国周刊》的刊名，是请毛泽东同志写的。周刊是在南门织机街湘鄂印刷公司印的，每出一期，大家就带到沿湘江河边和城内小吴门、天心阁、南门口、走马楼、四方塘、府正街、北正街、湘春街一带去叫卖，售价每份是铜元二枚。经费不足，由学生会补贴一部分。

有一次，就是揭露张敬尧盗卖纱厂的这一期周刊出版后，直荀同大家一道出去分路叫卖。刚回宿舍后门不久，就有人来会他。当时有个姓陈的同学和我正由河边回来，直荀对传达室工友说：“有人来会我，只说到新河卖报去了。”说罢，他就朝湘雅医院走去。随后果然来了两个穿便衣的人到雅礼传达室，声称要会柳直荀。我们答复说，他与另一个同学往新河卖《救国周刊》去了。后来知道，那两个人就是张敬尧派来捉柳直荀的特务，当时他们怕洋人，不能直接到学校里来抓人。直荀在湘雅同学张维那里住了几天才回校。有一次，直荀还护送毛泽东同志到湘雅医院，躲避张敬尧特务的捉拿。他和张维、龙伯坚商量，得到院方的同意，毛泽东

同志住进了病室，几天之后才设法离开，到外地去了。从这些事看出，直荀在反军阀斗争中，非常机警，胆大不怕事。

《救国周刊》只办了四期，就被张敬尧禁止发行，其他学校的周刊也都禁止发行了。

(六)

一九二三年五月下旬，全国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深入开展，湖南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达到了高潮。六月一日，日本武装水兵开枪直向长沙示威群众射击，并用刺刀刺杀，当场杀死某糟房挑水工人王绍元和小学生黄汉卿（进医院后死的），伤者数十人。

六一惨案发生后，郭亮当时是外交后援会主席，马上召开各校学生会负责人紧急会议，决定举行罢市罢工罢课。直荀是外交后援会的领导人之一，他领导各校学生举行抬尸游行示威，自己抬着王绍元的尸体，边走边呼口号。沿途军警林立，如临大敌，特别是小西门一带日本人开的洋行门前，军警戒备森严，铁门紧闭。学生游行示威后，继续严查日货，要求当时的省政当局向日方交涉：撤换日领事，惩办肇事日军官，惩办杀手，抚恤死者，赔偿伤者保险费及医药费。赵恒惕假惺惺地表示向日方交涉到底。

直荀还动员各学校组织演讲团，到处演讲这次惨案发生经过，鼓动群众抵制日货，不坐日本船。他自己曾在长沙小西门日本码头上进行宣传，劝阻旅客不坐日清公司、戴生昌公司的轮船。这次宣传，收效很大。有一段时间，戴生昌往老湘潭的船根本没人坐。任凭日本船以高价招揽旅客，仍然没人去坐。最后采取坐船不要钱这一招，才勉强招来旅客，也未发生多大作用，受骗的只是少数人。我记得许多来往湘潭、湘乡的学生，都是走路或乘轿的。我同巧定安及另一个湘乡

同学，就是走一天路到湘潭去的。回校时，又与湘潭、湘乡的同学同路走回长沙。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人心愤慨，罢工罢课表示抗议。但长沙各学校迟迟不动，上海派来代表，催促即日罢课，以壮声势。当时雅礼、湘雅两校当局都是美国人，他们是坚决反对罢课的。但又不敢公开反对，只说这样一件大事，要由全体同学和家长来作决定，提出召开一个全校学生大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阴谋。他们暗中布置，对胆小信教的学生施加压力；对那些想去美国留学的甜言引诱；对即将毕业的同学说，如果罢课，毕业可能无限期推迟。他们满以为这样一来，赞成罢课的，将会是少数了。可是，大多数同学都是满腔热情，希望即日开始罢课。在直荷的发动和鼓励下，赞成罢课的队伍渐渐扩大，决心一致行动，粉碎学校当局的阴谋。

一天晚上，全校学生开大会，礼堂里灯火辉煌，挤得水泄不通。不仅教师全部到了，有些家长、家属也来了，也有外校的来宾。情势紧张，壁垒森严。开始双方展开了辩论，唇枪舌剑，慷慨激昂，互不相下。最后双方宣布停止辩论，进行表决。校方大声一再宣布：“凡是赞成罢课的，请站起来！”满以为在学校当局和家长的严密监视下，大家有所畏惧，不敢站起来。忽然一阵信号，许多同学昂首挺胸怒目举手站起来，那些原先犹疑不决的，看到这个样子，也跟着站起来了。罢课的决议以大多数入学通过了。学校负责人看到这个场面，吓得张皇失措，面如土色。于是，同学们蜂拥而出，大喊大叫：“多数，多数！罢课，罢课！”雅礼罢课的消息，马上传遍了长沙市，引起很大的反响。接着湘雅也罢课了，全长沙各学校纷纷罢课了。

这场同帝国主义势力作斗争的爱国运动，是由直荷，

省学联组织和领导起来的。从这次斗争中看出，他的组织能力很强，斗争艺术很高超，是学生中极孚众望的人物。

(七)

一九二三年，直荀与雅礼同学陈虔僧、杨笔钩、李至哲等创办了协均补习学校，以后改为协均中学。他在这个学校担任教职。

协均补习班最初开办时，地址在现在大寨路桃源旧里。后来迁到北门外福寿桥附近的枫树坪，扩充为中学，规模渐渐扩大了，直荀担任总务主任，兼教学工作，我任代数教员兼教篮球，杨人杞教历史，易礼容教语文，他们都住在协均。

每逢星期或假日，直荀和少数教师带领学生游朱家花园，或到岳麓山远足登高，锻炼身体。记得有一次，我们瞻仰黄兴、蔡锷墓，直荀对学生讲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壮烈牺牲和护国战争的故事，学生有感动得流泪的。

直荀在协均，薪俸收入不多，生活相当清苦，但是他乐于资助贫学生的书籍笔墨费，这方面的开支，毫不吝惜。

直荀是个从不偷闲、不知疲倦的人。他总是那么勤勉地工作，总觉得在他面前有许多的事要做，充满着青年人的活力和热情。

大革命以前，柳午亭先生担任长沙师范校长时，直荀任学校的总务主任，杨笔钩任教务主任，徐毅（正心）任训育主任。我和杨笔钩都是因与直荀同学的关系，由直荀邀约去的，他要我担任英语教师兼教球术。

直荀任总务主任时，办事认真，坚持原则，廉洁奉公，一丝不苟。他非常爱惜公家财物，从不滥用公家的一文钱、一张纸。

当时，一般学校的经费都是比较困难的，长沙师范也不例外。但是，直荀处理经济问题很有办法，老师们的薪俸能够按月致送，

而他自己总是最后一个领薪的。这种公而忘私的好作风，博得老师们的赞扬。

(八)

一九二四年，直荀在雅礼大学毕业，经杨开慧介绍，和李淑一结婚。他们结婚时的媒人就是陈虔僧、姜慎非夫妇。一九七八年，姜慎非找到了当年的结婚照片，寄给在北京的淑一。我看到这张照片，感慨思念之情，油然而增。

直荀和淑一结婚后，在协均中学任总务主任，学校事情很忙，但他更为重视的是革命工作。他经常在外面开会，工作十分忙碌。淑一就在家等门到深夜，还要准备夜餐茶水。有时在他家里楼上开会，淑一就负责看门把风。直荀曾经满意地对我说过：“我现在回家只管吃饭、穿衣、休息，其余都是淑一管了。”可见直荀得到淑一的帮助不少，无愧为革命的伴侣。

去年我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往访淑一，承蒙款以盛筵。席间，见到了直荀的儿子晓昂。孙辈有的正在深造。祖国大展四化宏图，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直荀可以含笑于九原了。

(九)

一九二七年长沙“马日事变”前，直荀任省农会秘书长，易礼容任委员长。后来易去武汉筹备全国农协代表会，直荀在长沙实际主持农会的工作。

在“马日事变”发生前十几天的一个下午，我到设在现在中山路船山学社的省农会去找直荀，当我走到船山学社门口时，他正同徐特立、肖望茹等在门前谈话。他问我：“学校里有事找我吗？”我说没有什么大事。他说：“这几天我有事，不得空，过两天。”

和你谈！”就这么匆匆交谈几句后，我们就分手了。那里知道，这是我同他的最后一面啊！听说事变发生后，他由船山学社跳楼上屋顶，逃到附近小巷子里公祠旁一户人家，在一位老矮叻的指引下逃奔城外，到枫树坪改装后，乘人力车到南门外歇子石，以后到湘潭，准备集结农民武装反攻长沙，因被人发觉，未能成事，转辗逃往武汉。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直荀为革命而牺牲四十七年了，他那刚毅的性恪，朴实的风度，谦虚的品质，不屈不挠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的。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回忆大革命时期的柳直荀同志

陈 新 宪

我初次见到柳直荀同志，是在一九二四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兑泽中学同学田波扬陪同他到我们寝室来，找我们同寝室的陈子厚（湘乡人）、陈寅（邵阳人）、李熙（新宁人）及查夷平（长沙人）等。这些同学都是老班生（除陈子厚一人是三年一期外，其他都是旧制四年一期的），据说他们应黄埔军校第一期在长沙秘密招考被录取了。柳直荀同志就是来通知他们并找他们谈话的。兑泽中学被取录六名，大都表示高兴，只有查夷平好象在谈什么困难。我和几位同学在旁边听着，都没说什么。但柳直荀同志瘦长的身材，娓娓动听的言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的父兄在这一年也都到广东去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哥哥考入第二军军官学校，他和陈寅常给我寄来一些广东出版的报刊杂志。由于家里人都到广东去了，我每年寒暑假就在荷花池兑泽中学留校度假，经常得到进步同学田波扬、段消等的帮助，使我在大革命时期先后参加了国民党、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春，列宁逝世周年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会，我在长沙教育会幻灯堂听过柳直荀同志代表教联的讲演。他还和周以栗、肖述凡同志等领导我们与西山会议派和孙文主义学会派进行斗争，如在教育会驱逐了西山会议派破坏灵堂的捣乱，在伍家井捣毁了国民党右派所组织的临时省党部。

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省会各界正联合举行“六一惨案”两周年纪念大会时，传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群情鼎沸。这时，省工团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省女界联合会及省教育界联合会等单位联合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接连组织群众大示威，罢工、罢课、罢市，实行对英口经济绝交，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这时，柳直荀同志是省雪耻会、反帝大同盟、非基督教大同盟等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成员，常亲自站在斗争的前面。如次年十月长沙市民收回大金码头的斗争，特别是十二月长沙各界人民举行反关税会议示威大游行，柳直荀、周以栗、肖述凡、张汉藩、向钧以及杜修经等分别带领群众火烧大金码头的趸船及日商戴生昌轮船，并先后冲入日本领事馆，扯下太阳旗。接着，柳直荀同志又率领游行队伍捣毁为赵恒惕御用的《湖南通俗日报》和拒登爱国运动消息的《大公报》，启封了被赵恒惕封闭了的铅印工会。当时群众的革命行动，不但使赵恒惕所派的军警束手退避，就是停泊在湘江河中外国兵舰上的水兵也都躲入舱内不敢露面。

这年冬季，接连发生反动军阀枪杀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和株洲农民协会委员长汪先宗两件惨案。冬初的一个晚上，柳直荀同志偕同郭亮、张汉藩、周以栗、肖述凡等同志领导省会各界群众数千人到小吴门火车站迎接安源工人运动领袖黄静源烈士的遗骸，在车站举行祭奠讲演后，各领导人亲自抬柩游行。冬末，长沙市各界人民为抗议赵恒惕、叶开鑫杀害株洲农民运动领袖汪先宗开了追悼会。大会出了特刊，柳直荀同志不但在特刊上写了悼念文章，而且亲自主持这次追悼会。他悲愤地介绍了汪先宗的一生及牺牲经过，并愤怒控诉军阀赵恒惕、叶开鑫镇压革命运动和屠杀工运农运领袖的罪行。自此，湖南工农革命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紧密结合，一浪逐一浪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一九二六年春节前后，湘区委在长沙党校（当时设在乐古道巷，现湘江宾馆后面）召集各地方党团员积极分子办了为期月余的学习班，除了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斗争史外，还部署了今后的战斗任务。罗迈、夏曦、郭亮、易礼容、曾觉哉、周以栗、夏明翰、肖述凡、柳直荀同志都来讲过课。

一九二六年三月初，湖南省会各界在湘区委领导下于长沙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平民大会，提出对湘局的主张，并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宣布反英、驱赵、讨吴。由于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高涨，加速了反动的赵政权内部的分化。这时，驻湘南的赵部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趁机进军长沙，赵恒惕于三月十二日凌晨逃走。唐生智进驻长沙后，先以代省长名义布告安民，旋称临时省长。这时中共湘区委领导人罗迈同志曾先后派夏曦、谢觉哉、王基永、夏明翰、柳直荀同志去争取唐生智接受广东革命政府的任命。正当此时，吴佩孚以大兵盘据鄂边境相威胁，并派蒋百里携带北京政府的任命书（委唐为湖南省长兼讨赤前敌总指挥）来引诱唐生智就范。广东革命政府则派白崇禧和陈铭枢携带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湖南省长的任命书来劝唐参加革命行列。唐生智这时的处境是：既要毕恭毕敬地接待他的老师蒋百里（唐在保定军校时，蒋是校长），又要热情欢迎老同学白崇禧和陈铭枢（白、陈在保定是唐的同期同学）。南北双方都许他以对等的官衔，何去何从，决定他未来的政治前途。湖南在军事上也是南北双方必争之地，唐生智的偏袒对北伐军出师北伐和北洋军阀的灭亡命运，都是举足轻重的。鉴于这种形势，中共湘区委便决定组织长沙城乡十万工农学生召开一个湖南各界欢迎广东代表和驱逐蒋百里的群众示威游行。上午，各界领导人在省教育会坪举行大会仪式后，选举请愿代表，由周以栗、柳直荀、肖述

凡、张汉济、向钧等率领工农学生群众往藩后街当时省政府（现长沙市革委所在处）。当时长沙市区有上万工人学生参加外，近郊区农民则有近十万人分别由中门、浏阳门、小吴门，经武门、兴武门、北门涌进长沙市区，他们手持鸟铳、三眼铳、梭镖、马刀、米色旗，高呼“打倒吴佩孚”、“驱逐蒋百里”等口号，鸟铳、三眼铳沿途鸣放不停，市内主要街道都为人流所阻塞。当大队群众将临时省长公署围住时，柳直荀等领导人率领各界代表冲在头头，与唐生智所布置的警卫防线相持约一小时后，始冲破三道武装防线，到达唐生智所住前厅。唐出来接见了各界代表。这时，柳直荀同志向唐生智转达了群众大会通过的湖南人民对湘省施政的主张，同时提出，要求他立即驱逐蒋百里出境，并接受广东政府的任命。唐生智起初说：“蒋先生这次来湘，纯系私人交往，并无任何政治使命。”柳直荀同志立即向唐说：京口决堤，蒋百里是罪魁祸首，两湖有数百万人生命财产遭淹没，湖南三千万人民要求公审蒋百里（在南北军阀混战时，即所谓援鄂之役，蒋百里为北军策，决湖当京口大堤，结果两湖人民被淹死和流离失所的近百万，损失财产无数，并造成尔后湖区水患）。这时，唐生智面露窘色而不能对答，外面三眼铳鸣放不停，驱逐蒋百里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柳直荀同志很严肃地说：“蒋百里插翅难逃！”唐生智低头沉思，仍保持镇静。周以栗、肖述凡、向钧及其他代表一个接一个地紧逼。坐在唐身旁的一位姓邓的幕僚满面笑容对我们的代表说，这件事我们慢慢来商量，孟公爱国爱乡素不后人，此次来省，也为请省府所知，云云。最后，代表中有人提出质问，说：“你到湘，愿意当湖南三千万人民所支持的省长，还是甘当吴佩孚一个走狗的省长？”当时抬起头来说：“孟湘陵各位错爱，刚才郭先生代表说了，事关大局，我们好好商议，商议！”接着邓某也附和

着，还说了些诸君辛苦了，劝大家回去休息之类的话。代表们临行时要求唐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出决断。当天晚上唐生智便偷偷地将蒋百里礼送走了。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唐生智即公开倒向革命方面，这就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广东北伐军建立了先头阵地。当时湖南革命群众组织和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组织，随着形势的发展也由秘密而公开。柳直荀同志和易礼容同志领导省农民协会的筹建工作，并派滕代远同志担任长沙近郊农协会的委员长。唐生智这时正部署进取岳阳以北地区的战斗，据区委便派柳直荀、袁福清、田波扬、向钧、杜修经等分头组织农民、工人、学生担任向导、输送和宣传慰劳等支援前线的工作。唐部向岳阳进攻，叶开鑫即向鄂南通城一带撤退。四月中旬以后，吴佩孚又调集北军精锐部队倾巢南下进犯湖南，又委派叶开鑫为讨赤联军前敌指挥，纠集原赵恒惕残部向长岳一带唐部反攻。唐生智因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被逼放弃长沙，退至衡阳，以待广东援军。

五月初，叶开鑫进驻长沙，省城即被白色恐怖所笼罩。这时柳直荀同志和滕代远同志积极秘密组织长沙四乡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准备武装斗争。市区工人在郭亮、张汉藩、杨福森、袁福清等同志领导下成立秘密纠察队，学联也在田波扬、向钧等同志领导下组织各校同学担任宣传联络工作，开展反叶斗争。

七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柳直荀同志担任省农民协会秘书长，除主持省农会日常事务外，还兼任了省政府委员及省会各界欢迎北伐军大会的筹备组织工作。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湖南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在长沙召开了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这是当时湖南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柳直荀同志事前是筹备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在第一次大会上被选为主席团执行主席之一，兼任大会秘书长。十

二月三日，他亲自草拟电文邀请毛泽东同志回湖南来指导大会工作。毛泽东同志于十二月中旬来长沙，柳直荀同志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下，草拟了大会宣言和大会有关决议案四十多件，交大会一致通过。特别是十二月下旬，他每天都是废寝忘餐地坚持工作，通宵达旦。二十八日大会结束后，柳直荀同志秉承毛泽东同志和湘区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召集各地农运代表和干部（均系党团员）于党校举办两天学习班，请毛泽东同志做了两次有关农运的报告。一九二七年二月初，毛泽东同志从醴陵和株洲考察农运回到长沙，柳直荀同志和滕代远同志陪同毛泽东同志考察了长沙近郊区农运工作。湘区委这时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在一月份的工作报告中检查了过去某些错误措施，并及时纠正了这些错误，从而使湖南的农民运动得沿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引的路线向前发展。

一九二七年五月，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何键指使他的部下许克祥、王东原等举行军事叛变，围攻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机关团体，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三湘。这时，在湖南撑持艰难局面的就只有郭亮、柳直荀同志等，他们挺身而出，组织领导革命群众继续战斗。

大约是五月二十三日，我在衡山地方委员会接到柳直荀同志从湘潭发来的一封简短的电报：长沙发生军事叛变，希各地严加防范。随即又接到以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省农民协会委员长易礼容领衔的通电，报告五月二十一日晚许克祥的叛军袭击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机关团体的经过和屠杀革命群众的真象，号召各地加强防范，共同声讨。接着又以省工会和省农民协会临时办事处负责人的名义，由郭亮同志领衔、柳直荀同志以省农协秘书长名义副署，通电各地革命机关团体，命令工农武装立即集

中待命。柳直荀同志这时还派专人持其亲笔信来衡山，通知工农武装集中的时间和地点，随又以十万火急的密件通知各地方，告以反攻长沙的军事计划和各地的具体任务。当时要求衡山的工农武装除留一部分控制县城外，均调赴湘潭姜畲一带，与湘乡、宁乡、湘潭的工农武装汇合作总预备队。旋因情况变化（许克祥部队向湘潭方面移动），改为左翼进攻部队。衡山地委当时决定派贺尔康同志率领农民自卫军三个中队赴湘潭。五月二十九日，集中湘潭姜畲一带的农民自卫军，在柳直荀同志直接领导下给来犯的许克祥部队以迎头痛击，揭开了十万工农大军围攻长沙的序幕。三十日，安源、株洲的工人纠察队和株萍沿线醴陵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到达易家湾至大托铺一带，与敌展开激烈的战斗。三十一日，浏阳的工农武装分两路直扑长沙城：第一路敢死队于中午占领韭菜园、识字岭、攻入小吴门；第二路农民自卫军于下午杀入南门口。宁乡的农民自卫军也汇合长沙河西的农民自卫军逼近岳麓山。城内叛军因腹背受攻，纷纷弃城逃命。正当英勇战士们高呼：“梭镖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紧要关头，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下令停止进攻，说什么湖南问题须静候国民政府派员来解决。这时担任中路主攻的指挥同志亦以不明情况、受其迷惑而遵令停止前进。这就使轰轰烈烈的围攻长沙的壮举，遭到痛心的失败。

围攻长沙的主攻部队虽然停止进攻而自动撤退。但其他各地的工农武装仍继续在集结。毛泽东同志这时在武汉主持全国农协会议，发出重要指示，指出：蒋介石、许克祥的叛变及土豪劣绅的反攻倒算，迫使农民“不能不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以谋反抗，而图自存”。当听到陈独秀下令制止湖南工农武装反攻的消息后，便自愿回湖南来再任省委书记。

毛泽东同志顶住逆风，冒着敌人屠刀满天飞的白色恐怖回到湖南，立即直奔湘潭、株洲一带，先后与柳直荀、郭亮等同志会晤，沿途视察了集结待命的工农武装，这时，柳直荀同志陪同毛泽东同志一行来到尚完全控制在我们手里的衡山县城，召集附近地区仍坚持战斗的负责干部会商。柳直荀同志到衡山，曾对大家讲了“马日事变”的经过和反攻长沙的情况。毛泽东同志也对我们作了详细的指示，着重分析了蒋介石公开叛变后，国内外局势的演变，特别是两湖形势的发展及国民革命阵营的分化，我们如何重新组织革命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恰在这时，陈独秀接连派人，携带密札，催毛泽东同志返回武汉。接着湖南的反动派举行全面清乡，地委决定要我率领一部分工农武装随同柳直荀同志向衡山、湘潭边境转移。我们到达福田铺一带后，随又奉令向岳北白果一带移动，柳直荀同志是与我在此分手，谁知这一别就成为永诀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四日于邵阳市

留法老学生之自述

徐特立

我是湖南长沙人，姓徐名特立，今年四十三岁。英文只能拼音，法文一字不识。我到马赛上岸时，向季坚先生问我是他们学生一起的不是，我将护照拿与他看，他看得护照是一个学生，觉得年纪太大了。我在长沙动身时，有人劝我莫来，说是四十几岁的人，还学得甚么；我看向先生问我的话，恐怕也有这种意思。十一月十四日到华侨协社，遇着编印《华工杂志》的肖子升先生，肖先生说是明日八点钟李石曾先生到华侨协社对同我来的学生演说。他说我年纪太大，又在湖南当教员一二十年，于今来法作工，这种精神是很难得的，但李先生或者会要与先生特别谈话，愿先生一定愿意一同听李先生演说罢。我听了肖先生的话，觉得他很爱我；但我本是来当学生的，怎么不同年少的学生一般听讲？并且进学校的时候，同班听讲的日子很多，今日怎么要拿出从前在湖南当先生的样子来？到了十五日八点钟，李先生演说完了，单喊我出来，要我说来留学的意见。我当时也说了几句话，但是意见还没有尽。空了两三日，肖子升先生要我自己说到法国求学之意思，登在《华工杂志》。我素来不会做文章，登在杂志上，岂不见笑？但是我有些意思，不说出来，一般的都说年老者不能求学，并且年老的人，多半在社会上有些权柄的人，倘若全不求学，社会上受害就不小，所以我不怕人家笑，定要说出我的意思。

我今年四十三岁，不觉得就四十四、四十五一混六十岁来了。

到六十岁，还同四十三岁时一样无学问，这一十七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一十七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六十岁时来悔，那就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我想今年学起，到五十岁还有七年，一天学一字，一年可学三百六十五字，七年可学二千五百五十五字，到了五十岁时，岂不是一个通了的人吗？若一天学二字，就四十六岁半可以读通。我纵愚蠢，断没有一天学一字学两字也不能的；所以我决志求学，不怕法语难学，也不怕学校规则太严。

又有一些人要我另外请人教法文，或者比学校要自由些；并且湖南有学生一百人，不久还有人来，华法教育会正要明白湖南情形的人，做湖南学生的事情，何不在外面住，为公为私，两两便当。我听了这段话，很以为然。但是我到法国来，原要学法国学校的规则，好回国用，不住在学校受先生管束，未必学得好。并且我的年纪太大，人家对我有尊敬的意思，不好的习惯，大家都不肯当面说，住在学校中，或者可以慢慢学好。因为这样，我就进了法国木兰省立的公学，同学的均是少年有造的，并且有在湖南时的旧学生，内中有熊信吾君，须臾我做太老师。今日与他同学，岂不是降了两级，又还要向他们学法文，变太老师做学生，不可耻吗？但我想一想，从前没有学问的时候，当了老师同太老师，自高自大，还要得人家的学费，这真是可耻；如今到了法国，法文一字不识，还要自高自大，怕失了旧资格，不更加一层可耻吗？今日只要学生不嫌我老大，肯教我的法文，我就算年老，也是一个进化的老人，五十年后，我也是一个有学问的新人物，到死的时候，学问还没有老朽，还同有学问的少年讲得来，那时候的畅快，都要从今日耐烦耐苦做起。肖先生问我将来学甚么，我说我要学农业，暂且进工厂做工，有得闲的日子，并要学法国的家事学，好回去自己谋生活。单学法文回去当法文教员，还同从

前一样靠口舌赚钱，何必几万里到法国呢？我前年在湖南高等师范讲教育，一点钟银洋三元，一日可赚十八元，折成佛郎，一日可得百二三十佛郎；今年在省立第一师范，也有一元一点钟，何必到法国每日八时赚四五佛郎呢？我今又想起，从前所赚的钱，真是冤枉，日日讲空文章，耽搁青年光阴，使一些学生都要学先生讲空文章，赚大钱。听得作工的劳苦，又没有讲空文章的赚得多，大家都不愿作工，使国家工业不发达，都是我们当教员讲文章的罪过。今日当悔从前之过错，不可再作赚冤枉钱的思想。

须知世界上第一等人，都是作工的人，从前孔夫子赶马车，上论里孔夫子有一句话，说是我“执御乎？”御就是赶马车。他的学生樊迟也会赶马车，上论上头有“樊迟御”一句话，就是樊迟赶马车的事。孔夫子从前也替人家看牛羊，孟夫子的书上有“孔子尝为乘田矣，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两句话，就是说孔夫子看牛羊的事情。《汉书》上头说古时候的人，读书要兼种田，半读书，半种田，三年可以读得一册书，从十五岁起，读到三十岁，可以读得五册书，古时候的五经，到三十岁可以读完。上论有“三十而立”一句话，《汉书》上说就是三十岁而五经读完了。古时候没有一年一日一季专读书不作工的，日中作工，晚上读书，天晴作工，落雨读书，春夏秋三季作工，冬季读书。只要读了幼学记，就晓得这件事。幼学不说了“学足三余”一句话吗？正是晚上是日中多余的时候，落雨落雪是天晴多余的时候，冬季是春夏秋三季多余的时候；平日都要作工，只有得闲多余的时候读书。古时候皇帝、皇后都要作工，神农种田，轩辕做农，舜帝烧窑，禹祖养蚕，书上都说他是好人。我们当教员的学生的能作工，岂不更贵重吗？我所以愿学农工，不愿专学法文。

肖先生要我说我的出身，我不能细说，暂且说个大略。我十

九岁就教蒙童馆，到如今教了二十四年书。日中间总是替学生做事；自己读书，要到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每日只读三点钟的书。平日走路，同晚上睡醒了天没有明的时候，就读书。口袋常装一本表解，我的代数、几何、三角，都是走路时看表解学的。心理学、伦理学，都是选出中间的术语，抄成小本子，放在口袋中读熟的。中国的旧书，总是选出要紧的，用本子抄。我学说文，不晓得写篆文，晚上睡不着及走路时用手指在手掌中写来写去。我读说文部首五百四十字，一年读完，每日只读二字。我在修业中学教学生学说文部首，要他们每日记一字，做两年学完，他们偏要星期六日同同学六个字。我要他们背写，多半不能写出，正是不分开少学要一时多学之害。我读书总是以少为主。

我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我在长沙师范学校当校长，收了一个打铁的学生，姓黎名升洲，毕业后在浏阳高等小学校当教员，极能耐苦。又收了一个退伍的兵，姓廖名奔，进学校时，只能够写信，读一年书，就有点明白样子；如今当了小学教员二三年，在长沙县当庶务一年，现在我已写信要他到法国来。我还有一个朋友姓熊，名慎德，浏阳县人，他早年考试虽然没有进学，也常常取在前头，他教书种田两项均能做。他三十岁后，因家中吃饭的人太多，丢书不教，去做线香；一家男女大小都能做香，比教书活动得多。我很佩服他本是一个穿长衫教书的先生，改穿短衣，学作手艺的香匠，见识比人家高些，故不把念书的看得高，作工的看得低。可惜他现在有五十多岁，不然，我也要劝他到法国来一同作工。我生平把求学交朋友看作两件大事。承肖先生好意，要我说我的出身，我实在没有可说的，勉强说了二三件，很觉得不安，又何能多说呢？

（原载一九一九年法国《华工杂志》）

夏曦同志牺牲的经过

袁福生

夏曦同志吃过面包(去过苏联)，是六大中央委员。后来，被派到湘鄂西（洪湖）苏区担任党的领导工作。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六军团与贺龙同志的红三军（二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会师后，在永顺县龙家寨打敗了国民党匪军陈渠珍、皮德培、杨其昌三个师，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一九三五年冬，大庸丁家湾和永顺塔子会议后，夏曦同志被分配到红六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对同志要求严，对工作认真负责。

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贵州，在大定县将军山打了一个大胜仗，随后又攻占了毕节县城，使驻在贵州的蒋介石和王家烈的军队心惊胆颤，吓破了狗胆，不敢轻易向我军进攻。因此，我部队在毕节城等地得到了十余天休整。在休整期间，我们在当地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救国宣传，执行了毛主席的统战政策，因此，有几股土匪部队和地方保安部队向我军投降，被我们收编为抗日救国军，但是其中有一股是伪降，企图骗取我们发给他们武器弹药和被服，然后仍然拉队为匪。这股土匪驻在离毕节城二三十里的一个山坡上。有一天，夏曦同志带了两个警卫员去给这股土匪作报告，刚走到半山腰，这股土匪就向夏曦同志开枪射击，夏曦同志立即带领两个警卫员往回返，下山一看，河口渡船不见了，

于是两个警卫员保护着夏曦同志泅水渡河，但因夏曦同志不会游泳，结果被淹死，一个警卫员为了抢救首长也被淹死。另一个警卫员游泳渡过河后，回来报告。当时，我们军团保卫局得此不幸消息后，迅速派去了二十余人(我是其中之一)，赶到河边，土匪已经逃走了。我们在河里找到了夏曦同志和警卫员的尸首。夏曦同志的尸首，抬着随部队走了两三天后，才安葬在贵州和云南交界的一个山坡上，旁边有一座石桥，现在我已记不清是什么地名。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罗宗翰先生生平事略

李维汉 易北客

罗宗翰先生是大革命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共产党的同情者，为党做过不少工作。

罗宗翰(耻迂)先生，湖南安化人。生于一八九七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时间大致一九一九年夏)。新民学会会员。与毛泽东同志在此校毕业迟一年。毛泽东同志在学校办夜校时，他也是教员。一九一九年夏，湖南督军张敬尧残酷镇压湖南爱国学生，威吓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停发教育经费，湖南各界大举驱张，学生情绪最为激烈。毛泽东同志于当年十二月初由湘赴北京主持驱张运动，罗宗翰先生同在北京参加工作，十分努力。驱张后，毛泽东同志回湘于一九二〇年秋季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并曾在湖南通俗报馆任编辑(何叔衡同志任馆长)。他和毛泽东同志同学同事，感情极相得。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很强，是有用的人才。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在两湖胜利后，唐生智的代表人物邓寿荃任湖南省建设厅长，罗宗翰先生在该厅任秘书，对革命工作有便利。深惜不久即因病逝世，我们都曾参与送殓，为党悼念他！

一九七九年四月于北京

